

军队的崛起和国家的崛起，不是两层皮，不是两条道，
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

心 胜

III

尊严与正义 关乎国运

军人强则军队强 军队强则国运兴

金一南★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威慑有三要素：一是要有实力，二是要有
使用实力的决心和勇气，三是要让竞争对手认
识和相信以上两点。**

——亨利·基辛格



更多图书信息
请扫描二维码
关注@长江文
艺新书速递

ISBN 978-7-5354-9590-7



9 787535 495907 >

定价：39.80 元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陈曦
助理编辑：杨翠翠
装帧设计：郭璐

金一南★著

尊严与正义 关乎国运

心胜

III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心胜 .3/ 金一南 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354-9590-7

I. ①心… II. ①金… III. ①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8844 号

心胜 3

金一南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 陈曦

装帧设计 | 郭璐

媒体运营 | 刘冲

助理编辑 | 杨翠翠

内文制作 | 张景莹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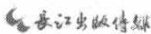
法律顾问 | 张艳萍

总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 100028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编 | 430070

印刷 |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 14

版次 | 2017 年 07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7 年 0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210 千字

定价 | 39.80 元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目 录

民族命运，在危难中奠基

胜利并非神赋与天赐	002
播种，但不参与收获的人	004
精神力量的来源：苦难与胜利	006
挺直长期弯曲的民族脊梁	009

精神气质，因“斗争”而铸就

城乡两军，间隙终冰释	014
留守进击，歧义化玉帛	016
“分权”、“集权”，非意气之见	019
领袖集团，“斗争”中成熟	024
古田深意，锻造新军队	027

西征作战，白骨永筑青山

为什么要渡河？	038
为什么要“孤军深入”？	041
为什么没有东返？	043
为什么损失惨重？	047
悲壮牺牲，浴血为使命	061

国家尊严，用胜利来捍卫

百年中国，何处不沧桑 068

共产党人，铁肩担大任 070

国家制造战争，战争也制造国家 079

小成功需要朋友，大成功需要敌人 086

强劲发展，倚重创新推进

创新是民族发展的能力 090

创新，基于对本质的认识 093

支撑创新思维的主体——大脑 096

支撑创新思维的环境要素 099

抑制创新思维的枷锁 100

思想落后于实践，不是真正的创新 103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创新动力 107

在节制和约束中爆发能量 110

安全稳固，善对危机处理

善对危机，方可止戈为武 116

看清特点，力争化有为无 117

常怀危机，方能避免危机 122

危机处理的“四个能力” 126

危机处理的时机决定成本 129

事态控制是当务之急 135

强制敌手，营造安全范围

为了夺取优势，为了取得胜利 145

大国关系就是做交易 151

无战将无威慑，无威慑无战略 153

统一大计，国之永恒基业

社会规律必须通过人的努力去实现 168

“战场上得不到的，不要期望在谈判桌上得到” ... 174

“人民”整体走向误区，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177

旧理论不再适用，则必须创造新理论 180

台湾的根本价值，涉及国家安全战略 182

有理无力，妄谈走遍天下

“国际生活的武力化” 189

“有庇护的战争”不复存在 192

新军事革命产生全新战争能量 197

有力量不使用，又有什么用？ 199

伊拉克并非全无“胜算” 202

内因导致雪崩式垮台 205

仅剩一张嘴在抵抗 211

军官培养，是最为艰巨的战争准备 214

锻造一支真正枕戈待旦的军队 215



民族命运，在危难中奠基

我们的思维、认知、理论，应该跟上波澜壮阔的实践。

没有思想的力度，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

没有力度的思想，每经剧变，都不由自主要否定过去，企图推倒重来。

胜利并非神赋与天赐

长久以来，一个问题盘旋于我脑中：一个 1921 年成立的政党，一支 1927 年创建的军队，二十多年时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夺取全国政权；而其对手，掌握全国资源，掌握国外援助，掌握一切执政者所能掌握的优势，竟然二十多年后全盘崩溃、灰飞烟灭。这个党和这支军队的力量真谛在哪里？在了解和研究中，我越加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来自神的赋予，而是来自人的奋斗。不是来自天赐机缘，而是来自千千万万人的英勇献身。

1956 年 9 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描述了一生中打过的四次败仗，两次就发生在被描述为“用兵如神”的四渡赤水。真正了解了那段经历就会明白：历史从来都是在挫折中轰隆前进的，伟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及时纠正的人。

遵义会议请回来的毛泽东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回来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发出神一般的预言，而在于是否能够迅速修正自己的失误，然后迅速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以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

那个年代毛泽东同志最伟大之处在哪里？我认为在于那种极为珍贵的历史自觉。所谓“历史自觉”既包含对历史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更包含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工农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毋庸讳言，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接受过共产国际和苏俄援助，国民党得到的比共产党要多得多。而毛泽东开创的广大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一个没有被揭示出来的重大意义就是使中国共产党不但获得了政治独立，更获得了经济独立。

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不但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毛泽东在最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在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之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使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获得自主的基础。

所以中国革命具有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发达富裕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如果不产生在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可能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而如果不分散到贫困落后的边远山区，红色政权便无法获得充足的给养，红色武装也无法获得坚忍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历史自觉，就是从来不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也从来不将自身经验绝对化，而是立足中国大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用中国的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这个党能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取得种种成功的最大优势所在。在这一基础上，才真正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播种，但不参与收获的人

近代历史中，国共双方的众多将领，都在历史舞台上表演了威武雄壮的话剧。有这样两位今天已经鲜为人知的红军战将：一位是红十军团第21师师长胡天桃，另一位是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王开湘。

1935年年初，由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在浙江怀玉山失败，胡天桃负伤被俘，蒋军悍将王耀武负责审讯。第一次见面王耀武就惊呆了。他回忆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他人指认出来，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与他多次交手的红军师长胡天桃。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王耀武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在文史资料中，他一笔一笔地记录下当年与胡天桃那场令他震惊不已的谈话。

王：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国民党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你知道方志敏现在在什么地点？

胡：不知道。

王：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胡：不知道。

王：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我没有家，没有家人，不要保护。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俞济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胡天桃虽然被枪杀了，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王耀武当年一身将校戎装，在寒冬中与衣衫褴褛、脚穿两只各异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瓷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利者。

另一位是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王开湘。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2师第4团则是主力中的主力。王开湘当年34岁，是中央红军中一员猛将，遵义会议前后任第4团团长，在艰难曲折的长征途中一路先锋一路烈火，飞夺泸定桥，强攻腊子口，为红色铁流斩关夺隘，使红4团威上加威。即使过去多少年，今天到泸定桥头驻足参观的人们，看着那惊心动魄的13根铁索，依然能感觉到“大渡桥横铁索寒”的氛围。而另一处天险腊子口，山口仅宽30余米，两边全是悬崖绝壁，周围尽为崇山峻岭，除此口便无路可走。

当时第4团担任主攻，团长王开湘亲率两个连从右侧攀登悬崖绝壁，向敌后迂回。黑夜中正面拼杀正酣，一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王开湘迂回成功！三颗信号弹又腾空而起，红军部队发起总攻！与冲锋号声、机关枪声和呐喊声伴随的，是王开湘在拂晓晨曦中的大声呼唤：“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第二天，彭德怀经过战场，见50米的一段崖路上，手榴弹弹片铺了满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这位久经沙场的红军宿将连声感叹：“不知昨天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是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

能闯过这样天险的队伍，怎能不是真老虎！当时离王开湘告别这个世界只差两个月。没有纪念碑的他披着硝烟立在那里，钢浇铁铸，像一尊永远矗立的战神。

人类在繁衍，英雄却不能复制。像胡天桃、王开湘这样的战将，在那支翻越万水千山的队伍中难以计数。他们没有活到胜利那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没来得及给自己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返回家乡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带着满身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壮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

精神力量的来源：苦难与胜利

今天，针对那段历史的回顾，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有利机缘。持这些说法的人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1927年“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贺治华出卖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仅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抓捕罗亦农时，她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

在这种空前的白色恐怖和空前的投敌叛变浪潮中，蒋介石信心十足地认定：共产党垮了。随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一些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经不足为患了。

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最严峻的考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这样的考验再次出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军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捕被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前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接着出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磨难，超过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说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依靠运气和机缘的人，怎么解释30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足3万，却将长征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实现惊天地泣鬼神的凤凰涅槃？不是靠运气和机缘，而是靠不屈不挠的奋斗，才使中国革命最终获得了最为稳固的胜利基础。其成功不像“十月革命”来自一夜暴动，而是数十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党员人数440万，牺牲的党员烈士也将近400万，世界上哪个政治团体曾经付出过如此惨重的代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资格，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而中国社会主义岿然不动的基础。

在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宣称能够对国家发展、对民族命运负责的政治团体，如果不能集合、产生、拥有这样一批为其宣称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而义无反顾的先驱者，就不能赢得随之而来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的追随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一纸空言。

还有一种说法，主张中国要“告别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早已繁荣富强了。

持这种说法的人至少有三个失误。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孙中山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宣称这一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不过是在扮演立于岸边长吁短叹的无聊看客。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从物质到精神莫不如此，不但塑成了自身“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娇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癫狂。以为君主立宪是直达国家富强捷径的人，从其创始者康有为先生“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语中，也能悟出在这一体制下，中华民族是否能够挺直长期弯曲的脊梁。最后，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

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试看胜利对美利坚民族、俄罗斯民族、大不列颠民族、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养育的作用，就知其至关重要。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是苦涩萎靡的。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纵使“戊戌变法”成功，国家从此“告别革命”，按照君主立宪方式走下来，今天除去低眉顺眼地加入别人的集团，做人家听话的好伙计，又有什么资格奢谈独立自主。用拜金主义、温情主义和虚无主义诠释历史不难，想挥动自己的手臂书写历史却绝非那样容易。靠忍耐忍出一个优秀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无此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所以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意致电：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挺直长期弯曲的民族脊梁

我们所处的是否是大时代？

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1840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1949年到2050年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没有中国共产党诞生，没有八一“南昌起义”，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可能至今还得按照别人的喜好选择，还得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就像鲁迅描绘的阿Q和毛泽东嘲讽的贾桂，至今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没有这一切，从湖南湘潭走出来的毛泽东，从四川仪陇走出来的朱德，从江苏淮安走出来的周恩来，生命轨迹也会向其他方向延伸。他们可能务农、经商、执教、从政，平平淡淡直到生命的终结。

但是有了这一切，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民族命运空前危急的时刻，一批又一批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空前奋起。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行列之中，随之也就失去了务农、经商、执教、从政的可能。最终成为震惊中外的革命者，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成为新中国空前的民族英雄。

中华民族也从此挺直了长期弯曲的脊梁。

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奋斗的年代。

又是一个胜利的年代、非凡的年代。

没有苦难，就没有坚忍，没有积聚。

没有胜利，就没有激情，没有尊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洗礼。这一洗礼不仅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中国人民不但站了起来，而且也富了起来。今天这一现实，让“社会主义不能消灭贫困，只能使贫困普遍化”的西方经典论断黯然失色。今天的中国人，不论是国家拥有的财富还是个人拥有的财富，皆为五千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中国模式”正成为全球议论的话题。

这样的时代，能说不是大时代吗？大时代提供了大作品产生的客观条件。剩下的就是主观条件了，能否真正地感受它、领悟它、描绘它、表现它。奥地利学者斯蒂芬·茨威格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要想去超过它。”

却有人以为自己已经超过，不承认曾经是奴隶，也不屑于承认曾经有过英雄。热衷于以“个人野心”或“个人苦难”图解历史，将时代描绘为个人意志的产物、苦难堆积的产物；还有人以“揭秘”“回归真实”为旗号，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将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进而提出“告别革命”。历史命运蜕变为个人命运，众生便只有在周易八卦面前诚惶诚恐了。

精神有高地，也有低地。如果无法认清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用“告别革命”来否定这部历史，用“个人阴谋野心”来糟蹋这部历史，只能证明我们处于以小胸襟、小视野、小利害、小恩怨构成的精神低地，证明我们无能力触及这部历史的时代深度，更无资格探究它的时代宽度。

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灾难深重的民族苦难史，更是一部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的辉煌奋斗史。这个民族在空前的灾难面前空前觉醒，发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万众一心的呼声。无论东西南北，无论贫富贵贱，无论尊卑长幼，搭建起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放眼全球，哪个国家有过这样跌宕起伏的命运？哪个政党付出过这样重大的牺牲？哪支军队像这样在围追堵截的血战和万水千山的阻隔中凤凰涅槃？哪个团队曾以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成为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的中流砥柱？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为理想与信仰献身的真人。如果说真理是一支燃烧的火炬，那么率先举起这支火炬的，是真人的手臂。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没有一批又一批真人前仆后继、追寻真理、救国救民，我们很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正是他们点燃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之火，才使我们至今未曾堕落，未曾被黑暗吞没。

真正认识与对待这部惊天动地的救亡史、复兴史，我们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没有思想的力度，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没有力度的思想，每经剧变，都不由自主地否定过去，企图推倒重来。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就成了一部不断从这个极端跳向那个极端、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抛弃的历史，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种只见细节不见总体、只见断层不见积累的思维方式，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成熟。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已经使得我们居于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从1840年到2050年，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200年内，发生了和将要发生何等波澜壮阔的变化，这一伟大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拼搏和牺牲奋斗的积累成果。

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理论，应该跟上我们波澜壮阔的实践。我们拥有巨大宝贵的历史财富。真正善于认识、善于总结、善于积累，就一定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避免幼稚、浮躁与浅薄，走向沉稳、厚重与成熟。

中国在高速发展，社会在日益进步，一代代人在迅速成长。一位战友曾说：“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位置、我们的工作都要转让给今天的‘80后’和‘90后’，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把我党、我军历史上那些最有价值的部分、最有感召力的部分，最能凝聚我们党、凝聚我们国家、凝聚我们民族的强大精神元素传下去，使我们的事业永葆青春活力，是我们今天这一代人的责任。”他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我们因这个时代而激动，因这份责任而效力！

心胜 Ⅲ

精神气质，因“斗争”而铸就

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在于锻造了一支新型军队。

斗争现实和革命思想，开始重塑这支参加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没有步历史上那些失败的农民起义之后尘。

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古田会议”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绝不只是通过了一个《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正确路线，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最为关键的是领导人的成熟。

城乡两军，间隙终冰释

了解古田会议的来龙去脉，要从朱德、毛泽东红军会师谈起。

朱、毛红军 1928 年 4 月会师。4 月 28 日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 月底根据中央的要求，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是朱、毛会师的重大成果，没有这样一个会师，红军的战斗力不可能得到空前提升。

红四军的组成：第 28 团，南昌起义的部队；第 29 团，湘南起义的农军；第 31 团，秋收起义的部队；第 32 团，井冈山原来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第 30 团、第 33 团，也是湘南的农军。其中主要的力量是第 28 团、第 31 团，也就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支队伍；第 29 团、第 30 团和第 33 团在 8 月失败以后溃散了；第 32 团在井冈山根据地丢失的时候也基本上损失了。第 28 团和第 31 团就成为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家底。

南昌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朱德，秋收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事力量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副总理、参加秋收起义的谭震林同志回忆说：

假若朱老总不能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这一点儿力量，很难维持下去。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战斗力很弱。部队上了井冈山，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会师，战斗力依然很弱。当年我们在井冈山，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朱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了，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清一色北伐铁军的队伍，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

这就是朱、毛会师之后，红军两支最重要的脉络之一的第28团南昌起义部队所起的作用，它奠定了朱德在工农红军中的地位。

后来很多人评论朱、毛之争，说朱德跟毛泽东有什么可争的？持这种说法的人是不知道朱德的历史地位。当时不叫“毛、朱红军”，而叫“朱、毛红军”，朱排在前，毛排在后，因为朱掌握着红军最主要的战斗力量——第28团，这支部队毛泽东当时难以涉足。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第一个是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二个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三个就是红四军军委，毛泽东、朱德、陈毅都当过书记。根据1928年6月的中央来信，指示红四军的前委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的秘书长，后来前委、军委之争就此开始。

南昌起义的第28团和秋收起义的第31团有何不同？

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了“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而南昌起义的部队只在连一级设立了党代表。毛泽东后来曾说：“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政府军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一个支部，故经不起考验。”所谓的叶挺部就是南昌起义部队，每个团一个支部。毛泽东讲经得住或经不住考验，就是指在党的领导的绝对化方面，秋收起义部队强于南昌起义部队。

南昌起义部队当时又参加了湘南起义，由湘南的红军进一步加入，第29团就是湘南的农军。所以后来呈现这样一种状况：第29团的官兵打散了，

回家的时候枪杆子上、腰窝里夹着许多带给老婆和娃娃的物件；第28团一些铁军老兵打仗不错，但是长久地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加上对“打土豪分浮财”、对“共产”的误解，把战场纪律、群众纪律变成了耳边风。

这样两支部队的作风完全不一样，矛盾也由此而起。

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嫌“农军”土气，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没有打过硬仗。秋收起义的“农军”看不惯南昌起义的“铁军”，认为流气、有兵痞、军阀主义等等。南昌起义铁军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但不愿意把枪支拿出来支援农军。秋收起义部队占据乡村，收入多，财政状况比较好，也不愿意拿出来资助铁军。这是两支基本力量之间一直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同志曾回忆说：朱德到第31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第28团去讲话。现在看到井冈山朱、毛会师的大油画，其实朱、毛会师后形成一体化的坚强红军力量，是古田会议之后的事。古田会议以前的状况是两支部队，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差别巨大，争论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这之前的争论斗争也是难以避免的。

留守进击，歧义化玉帛

斗争最初由柏露会议开始。会议议题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出击赣南之争。在柏露会议上，朱、毛争执不下。

当时的大背景是：1929年1月，蒋介石开始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调集了8个旅3万多兵力，井冈山承受了巨大压力。这时候双方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要坚守井冈山，因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朱德则认为要外线游击，放弃井冈山。朱德讲，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出去远道游击，光守井冈山守不住。

当时还有一个现实情况，两军会师之后，井冈山一时兵力大增，而当

地的住户农家并不多，养活这么多红军部队在经济上很困难。毛泽东认为朱德要放弃井冈山下去游击，是“游击主义”。朱德则认为毛泽东守住井冈山不放是“保守主义”。我们今天看这个争论，毛泽东也并非都是对的。

毛泽东后来被迫同意了朱德的意见，出击赣南。这之后他才发现，赣南、闽西空间很大，而井冈山的地域较小，其发展空间确实有限。最后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就定在了赣南、闽西。

粟裕当时是红军中的一名基层干部，时任第28团连长。粟裕曾讲过：“井冈山作为一个防守的要地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战略出发地不行。”所以，最初的出击赣南之争，朱德的意见相对比较合理。

朱、毛两人的争论，意见不一，观点相持不下。陈毅出来做调和工作。陈毅认为朱、毛各有道理，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难得的好地方。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敌人还在搞经济封锁，如不分兵远离游击，很难破敌第三次“围剿”，到时红军就会陷入困境。

柏露会议最终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率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出击赣南，外线作战，引开敌军，打破经济封锁。当时还没有想到建立广大的苏区，本想引开敌军，最后再回来。结果一去不返，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回去。就是这次出击，发现了赣南、闽西这块更好的根据地，证明朱德指的游击方向是对的。毛泽东发现了这点，最后着力开发赣南和闽西，古田就在这个区域以内。

当时红军刚刚下山，连续打败仗，被敌人追击。而所谓的“敌人”就是民团，非正规部队。加上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个团紧随其后，红军非常被动。那段时间的困境导致了后来的争论。

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觉得两支部队不能在一起，第28团、第31团应该各干各的。朱德带一部分力量，毛泽东带一部分力量，分兵作战。这就是所谓“集权、分权之争”。

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面临很多困难，后来的罗福嶂会议商讨的重点就是分兵问题。罗福嶂会议前，部队做的改编就是为朱、毛分兵行动做

准备。部队改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由第28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第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

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他认为，应该集中力量一起行动，所以在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朱、毛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第28团大多数人主张分兵，所以毛泽东坚决压下了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

最后，毛泽东在罗福嶂会议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朱德的决策权力就没有了。

取消军委之后，毛泽东一度很顺利，大多战斗指挥得心应手，相当于集指挥权于一身，很快歼灭了敌人两个团，取得了红军下井冈山之后的第一次胜利。

这边仗打胜了，那边中央的“二月来信”也来了。中央的“二月来信”针对的是已经滞后的情况。因为此前毛泽东、朱德都反映，脱离井冈山之后红军非常困难。根据这个情况，结合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央在“二月来信”中提出：朱、毛脱离部队，分散游击，在一起目标太大。

“二月来信”到前线时已经是1929年4月，当时形势已经缓过来了，不再被动。所以朱、毛共同反对中央“二月来信”的意见就可以理解了。

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批评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过于悲观，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尽管朱德也不同意“二月来信”的观点，但他认为不应该这样批评中央。

今天看来，大家可能会认为毛泽东当时批评“二月来信”、批评中央很平常。但是不要忘记，当时毛泽东是下级，上海的中央是上级。后来红四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二月来信”为借口，批评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无须合在一起。

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正当此时，来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刘安恭。

刘安恭的到来直接使朱、毛斗争白热化。他没来以前，毛泽东和朱德

之间还是语言上的过往，当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军委的时候，朱德没有任何意见。

但刘安恭一来，却挑起了很多事端。

“分权”、“集权”，非意气之见

1929年5月，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

刘安恭的身份很特别，早年留学德国，参加了“南昌起义”，又到苏联学习军事。但他的背景有些复杂，在苏联学习期间，因为“托派”嫌疑而被苏方遣回，上海的中央也因为他是“托派”嫌疑而把他放到苏区去了。消息闭塞的苏区同志并不知道这一背景，因为他是从革命圣地苏联回来的，还认为是中央派来的大员。所以红四军内部争论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支持，毛泽东、朱德都如此。

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建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为刘安恭设一个位置。军委是毛泽东提议撤销的，现在又提议要恢复。刘安恭被任命为军委临时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当时军队政治部权力很大，政治部管财务，因为打土豪分田地或筹款的钱由政治部分配，这是重大的资源分配。毛泽东把这个权力让给了刘安恭，希望在这个斗争中争取主动。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刘安恭却是支持朱德的。不仅因为他们是四川老乡，也不仅因为他与朱德曾同时留学德国，而是因为刘安恭看不惯毛泽东那一套做法。

在前委会上，刘安恭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都没有记载，一个字都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废除。”刘安恭这种“言必称希腊”的态度是毛泽东最为反对的。

毛泽东忍不住回应：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做，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毛

泽东的观点刘安恭听了不高兴，于是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本来朱、毛之间的斗争温度不是很高，毛泽东主导，朱德虽然内心不服，但是没有激烈动作。但刘安恭这么一挑，朱、毛之间的斗争被激化了。

陈毅和林彪特别看不上刘安恭。陈毅后来到上海向周恩来报告时讲，以刘安恭之偏见，群众对他还有相当信仰，完全是因为上级的关系，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他还讲，在红四军中，一般同志工作日久，相处极密，彼此长短都知道，外边初去的人，至少他们不知道他的短处，同时也没有什么成见横亘于胸，工作就容易了。刘安恭为什么获得那么大的权力？陈毅只想让刘安恭当副营长，最后却让他当了纵队司令。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

刚开始毛泽东赋予刘安恭权力，是想把他拉过来。后来朱德赋予刘安恭权力，是认为刘安恭和自己观点一样。所以当时的刘安恭在朱、毛之间的分歧中起了不好的作用，加剧了党内斗争。

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两人联手上报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没有让前委书记毛泽东署名。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刘安恭，两人签了就送过去了。本来红四军的报告都是朱、毛会签后一并发送。刘安恭来了，取代了毛泽东政治部主任职务，这是毛泽东让给他的。

毛泽东后来专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署名“前委书记毛泽东”。以前署名都是“前委”，朱、毛都包括在内。现在朱和刘单独报告了，毛泽东不得不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了“前委书记毛泽东”。他说党内现在发生一些毛病，正在“改进中”。当然这个“改进中”不像毛泽东想的那么乐观，已经出现失控态势。

6月18日，红四军小池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竟然也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谭震林向毛泽东传达，劝毛泽东参加会议，毛泽东只好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呢？

文件不让联署了，开会不让参加了。刘安恭来了以后，斗争升温了。

无法与会的毛泽东必然会产生“枪要指挥党”这样的危机感。

矛盾激化后，召开了湖雷会议。会议对党的工作范围发生了激烈争论，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围？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宽，权力太过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无家长制倾向？矛头全部指向毛泽东。湖雷会议成为红四军内部的矛盾爆发点。

会议结束几天之后，刘安恭作为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提出了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的请求。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都是毛泽东让给他当的，现在他提出要恢复正式军委，还做出决定：规定毛泽东任书记的前委不管地方工作，只讨论行动问题，其他的决策毛泽东不要管。

湖雷会议上要求限制前委权力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附和。毛泽东只获得林彪、谭震林、江华、蔡协民等少数人的支持，连参加秋收起义的许多干部都没有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带的第31团的很多干部也觉得毛泽东权力太大，太过专权。毛泽东当时的处境空前困难和孤立。

湖雷会议的结果，或者说矛盾爆发的结果，就是导致双方摊牌的白砂会议。毛泽东看到湖雷会议出现了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下级规定上级的工作范围。刘安恭作为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规定毛泽东的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就出现了一种倾向，下级党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职权，这种不正常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认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白砂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召开的。

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则坚持要保留。最后表决，以“36票对5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临时军委被取消了，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被免去。但取消临时军委以后，刘安恭还在各处活动，坚持取消临时军委后前委只管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毛泽东后来感到问题没有解决，矛盾还在继续扩大。他已经无法继续工作，干脆提出辞职，请求让他离开前委，去苏联学习兼休息。

当时因为毛泽东辞职，陈毅被推选出来，代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令毛泽东没想到的是，林彪此时给毛泽东写了信，观点鲜明，但措辞激烈。

林彪在信中写道：“现在四军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在群众中又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为一种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信中还写道：“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的现象。”林彪在信的最后写道：“你今天提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内有错误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来信非常兴奋，并给林彪回了6700多字的信。毛泽东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做斗争。”林彪的支持给毛泽东很大的鼓励，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是关键的力量。

毛泽东给林彪回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封信。因为毛泽东接到林彪的信后，把林彪的信公布在《前委通讯》上，全体官兵都看到了。林彪在信中指责朱德，有些很过分的言辞。一方面因为朱德很宽厚，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党内很民主。朱德不反对林彪的批评，但朱德反对林彪的悲观。党内的争论是正常的，我们要争出正确的意见、正确的道路来，而不是你要弄掉我、我要弄掉你。朱德认为林彪的理解偏颇了。两封信都刊登在红军的《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官兵都能读到。

朱、毛矛盾公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召开红四军“七大”解决矛盾，陈毅主持了红四军“七大”。

陈毅后来回忆，他采取的办法是“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也批，朱德也批，刘安恭也批，凡是争论的全批。当然他的全批分量不一样，陈毅

批毛泽东多，列了七条错误，包括个人专权、家长制等等。陈毅批朱德两条，比较缓和。

会议最后的结论是：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泽东同志因负责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会议最后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毛、朱虽然被选进前委，但在前委书记选举中，毛泽东、朱德双双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陈毅不想当书记，想找别人来当，但“七大”选了他，他只好当了。

对于这次选举，毛泽东终生不忘。前委书记落选成为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自下而上被罢免。

毛泽东一生好几次被罢免，1927年带队伍上井冈山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赣南会议被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前委书记；1932年宁都会议被解除红军总政委。几次被罢免、被撤职，都是上级的处理决定，是中央撤了他的职。这次是自下而上被颠覆的。毛泽东历来认为自己的力量来源于基层，来源于群众，来源于士兵，结果这次被基层和士兵颠覆了。

“七大”开完后，毛泽东病了，到蛟洋养病去了。

“七大”后，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没有了毛泽东所谓的“专断、一言堂、家长制”，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很快变成了纵队长联席会议。各纵队长为各纵队的观点、各纵队的发展方向、各纵队的利益争来吵去，大民主、小民主十分热闹，工作根本无法进行。

朱德忠厚，没有私心，在觉得搞不下去时，与部分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工作。毛泽东复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面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和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陈毅主义”，后来毛泽东承认用词过分，但一定要辩出个道理是非。毛泽东没有回来，他坚持要打倒陈毅主义。

陈毅这时在什么地方？在上海。陈毅在上海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历史和

党内争论，上海中央周恩来、李立三鉴于陈毅反映的问题极为重要，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周恩来负责召集，专门讨论研究解决红四军内部的矛盾问题和红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

领袖集团，“斗争”中成熟

就在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七大”之后，周恩来进入到其中。周恩来的加入，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接触军事、最早组织部队抓枪杆子的；周恩来又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军事部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更是奠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基础的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不要误以为周恩来是地方过来的，其实周恩来与军队渊源深厚。周恩来在认识军事问题、观察军事问题时，眼光为什么这么独到，这么老辣，这么超越个人利害？这与他本身的军事实践紧密相关。

周恩来与陈毅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俩是老熟人，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南昌起义时陈毅的职务、后来任党代表，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分配的。

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矛盾的时候，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中央如能委派，朱、毛都可离开。第二，如不能委派，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军长无人替代。毛走可以，减少矛盾。

周恩来与朱德的关系更不一般，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南昌起义时又是朱德的直接领导者，而且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用了非常激烈的言辞，坚决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要求朱、毛脱离红军的中央“二月来信”。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没有深度地接触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今天的领导，会怎么处理？你信任的，你熟悉的，跟那个你不信任、不熟悉的人发生矛盾，而那个不信任、不熟悉的人还反对了你，怎么处理？

此时的周恩来要用“非凡”来评价。对朱、毛的争论，周恩来不偏袒

任何一方。他在处理朱、毛分歧的时候不是改组，不是更换领导人，而是一再强调前委领导，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威信。

凭什么？他知道毛泽东将来就是共和国的领袖吗？不知道。他知道革命能胜利吗？不知道。周恩来当时处理此事，没有一点从个人关系或个人好恶出发，全是凭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关于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周恩来说：

“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敏捷，步调一致，便于行军作战。你们（朱德、陈毅）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群众自由讨论有关。”周恩来指出29团在湘南溃散，就是分权和极端民主化的结果，所以实践证明毛泽东那一套是对的，军队只能集权，才能夺取胜利。

周恩来的地位，周恩来的决策，不是建立在个人感情、个人恩怨、个人利益上的，而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建立起来的。在关于红四军的争论中，最后形成的中央“九月来信”，就是周恩来多次与陈毅谈话的结果，他通过做陈毅的工作，把陈毅的思想转了过来。最后陈毅按照周恩来的精神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

周恩来让陈毅回去后坚决请回毛泽东。他特别肯定毛泽东的大权集中要在前委，前委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府工作，以及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做法。周恩来说，虽然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时人事关系紧张，但大政方针是对的，而且创造出了不仅属于闽西、更属于全国的创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这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周恩来说：“一个党、一支军队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红四军中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周恩来比较了朱德、陈毅、毛泽东，强调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周恩来专门嘱咐陈毅，回去以后请毛泽东复职。当时周恩来就是中央，是中央主要领导者，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

1929年9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陈毅返回后，按照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请毛泽东回来。在古田会议之前两个月，陈毅带着信，10月离开上海，10月22日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及

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

这时，作为二纵队司令的刘安恭已经壮烈牺牲了，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击中头部。刘安恭有错误、有缺点，在红四军党内斗争中起到了不好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无法否认：他也是个实心实意投身革命的忠诚的共产党人。

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将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陈毅在信中写道：

“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心意，我们两个人都要求你回来。

毛泽东回来了，回到长汀，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说了一些伤害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共产党的力量是斗争的力量，通过斗争发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策略，而不是调和、不是妥协。现在来看，没有朱、毛的斗争，没有前委、军委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他们为什么斗？他们不是个人权力之争，而是要争出一条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革命途径来。

1958年，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对当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江华谈起这段历史，比较公正地评价了当时的陈毅。他说：“‘七大’不怪陈毅，那时候就那个气氛，已经形成了那种形势，有关这事后来都释怀了。”

毛泽东被请回来以后给中共中央写信，就是给周恩来、李立三写信。信中写道：

中央，我病已好。10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长江，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一到，中央的意思已

完全达到。

对周恩来的处置，毛泽东表示心悦诚服。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这就是红四军“九大”。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做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再度当选为前委书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时两天的古田会议。

朱德与毛泽东从井冈山会师到古田会议，他们刚刚相处了一年半多一点，即一年零七八个月时间。通过争论，朱德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才干，心悦诚服。朱德后来说：“我一生中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护国军第一军司令蔡锷，另一位是毛泽东。”正是通过斗争和争论，他们才相互发现对方的不可替代。

古田深意，锻造新军队

古田会议的成果不只是通过了一个“古田会议决议”，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口号，更关键的是领导人的成熟。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班子成熟了，这是古田会议非常大的成果。

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九条，核心的第一条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这一条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是决议的核心部分，深刻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和具体表现，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决议中心内容是强调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

把军队建设成为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这就是在斗争中、在失败的教训中和成功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支队伍要寻找胜利途径，必须这么做。

从走过来的道路看到，没有朱、毛的分歧，没有朱、毛的斗争，可能就不会有古田会议。没有古田会议，我们“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样一个基础理论就难以得出。这是古田会议的最大成果。而在其中，作为争论的一方，朱德同志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朱德同志讲：红四军的“七大”，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是放大炮、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斗志向前看、向远看，对革命前途要充满信心；又有人说我拉拢下级，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这不是拉拢下级，搞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下面的情况；还有人说我有游击习气，不像个官样，穿的和士兵一样破破烂烂。这并不是游击习气，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等各方面条件还很差，是为了群众化，不脱离群众。

现在来看，“七大”、“九大”对朱德的一些批评，有些也不尽合理。因为当时朱德毕竟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人，而朱、毛接触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需要这样一个磨合期。随着时间推移，对朱德真正了解后，他的忠诚成了非常耀眼的特点。

为红四军“七大”、“九大”做出很大贡献的不仅是朱德，还包括争论一方的陈毅。陈毅一会儿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一会儿不同意朱德的想法，在中间调和，被毛泽东说了个“陈毅主义”。

陈毅当时在朱、毛之间的分歧中，他是偏向朱德多一些的。陈毅后来也讲了感受：“不上高山难见平地。”人们往往需要突然登上一个高得多的视点，才能看清自己走过的道路。

陈毅讲，长期在红四军战斗生活，总觉得内部的毛病不少、纠纷很多。到了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从大城市、从全国斗争高度回头一看，

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然是那么坚定正确地走着胜利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宝贵经验。

陈毅是当局者迷，在红四军干的时候，整天在那儿争吵，感觉不出来。到了中央，周恩来向他介绍全国的形势，介绍了红四军经验的推广对各个根据地的示范作用，陈毅当时大吃一惊。

陈毅后来讲，在上海进了两个多月的训练班，才真正领悟到红四军奋斗的伟大，毛泽东实践的伟大。从对立，从争吵，从斗争中，最后真正地看出伟大来。

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周恩来同志。周恩来最早起草了要求朱、毛离队的中央“二月来信”，遭到毛泽东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发现自己判断错误，迅速纠正，马上复信不再要求分散，同意朱、毛暂时不来中央。下级直接批判你，首先不怕被伤面子，而是看你对不对——你对，则我改。

8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建军主张，提出“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这样一个鲜明的口号，要求绝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政治建军，绝不单单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认识。周恩来与陈毅多次交谈，后来形成了明确肯定和维护毛泽东主张的中央“九月来信”。

红四军领导层能够最终化解矛盾，走向团结，毛泽东能够进一步崭露头角，施展才华，成长为全党领袖，与周恩来的坚定果断支持密不可分。周恩来作为中央领导人，那时候如果对其打压，我们很难设想毛泽东将来的发展，很难设想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

我们看争论的各方，都有问题，都有缺点。共产党的力量就在于把各方面正确的东西综合起来，把各方面错误的东西加以排除。

整个红四军的争论过程，红四军“九大”争论的过程，最直接的参与者是毛泽东、朱德，然后是支持朱德的陈毅、把局面搅乱的刘安恭和支持毛泽东的林彪，以及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

今天看，他们都是领袖，地位崇高。其实，设身处地想一想，那时的他们都是一伙年轻人。当年，毛泽东 36 岁，朱德岁数大一些，43 岁，周恩来 31 岁，陈毅 28 岁，刘安恭 30 岁，林彪 22 岁。就是这伙年轻人，矛盾、斗争、分歧、争论，革命怎么搞？红军怎么建设？胜利怎么夺取？

在这一进程中，他们都是杰出的、勇敢的探索者。绝不仅是一个人正确，其他人都错误，大家在相互促进。在此过程中，尽管代价巨大，他们最终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成为这个党、这支军队不可替代的中坚。

这是古田会议重大的意义。

古田会议绝不仅仅是制定一条正确路线，所有成就最终体现在人身上。这样一个领袖集团，这样一个指挥班子，这样一支队伍，锻炼出来了，最后使胜利成为必然。

我认为，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这些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完成了对一个传统的农民军队的改造，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这支武装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没有成为“李自成第二”。所有农民起义的失败，包括陈胜、吴广，进了城夺了权，最后都垮掉了。共产党没有走入农民起义的另一次困境，这种斗争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不得不突破教条主义的框框，立足中国国情，把中国革命明确定位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革命，开始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农民大量加入，使党和红军的成分结构迅速发生了质的变化。

当时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统计，南昌起义部队，叶挺部、贺龙部的人员，大部分成了干部，占全军 20%；湖南农民约占 40%；历次俘虏改编的约占 20%；赣南、闽西新招募的占 20%。农民成了这支队伍的主要力量，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理论完全相悖的，所以不得不带有很多农业社会的特点。

根据创建初期，存在于农村中的浓厚宗族观念、地方观念、排外观念、

太平享乐观念等，与以农民为主的革命主体地位严重不相适应，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产生了诸多有悖于革命宗旨的倾向。

改造一支军队非常难，比如顽固的宗族观念，这在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曾姓农民怀恨朱姓农民，借着打土豪之机就在宗族之间干开了，模糊了阶级意识。

比如仇视城市的观念。中央的报告描述：“笼统地反对城市，斗争一起来便要攻城，便要杀尽城里人，倾向于大烧、大杀、大抢的途径，导致城乡的对立。革命武装攻入城市时，一般商人都拿出枪来向我们扫射。”

比如严重的地方观念。第28团想去赣南，该团赣南人多；第31团想回浏阳平江，老乡想回家；第29团想去湘南，湘赣边界的同志主张在边界游击，都不愿意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仗，致使初期红军部队指挥调动困难。

比如组织纪律观念淡薄。长期的小农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很难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队伍刚刚组织起来，很快又散掉了。中央报告说，今天50个人，明天是否还有50个人都成问题，有的来了，有的又走了。贺龙元帅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这些都能看出红四军这支部队，不管是28团还是31团，是一支农民的队伍。它本身具有的痼疾都和农民的小生产方式紧密相连。

后来中央在报告中分析讲，浴血奋战打下汀州城后，见稻谷正值成熟期，士兵便纷纷脱离队伍回家割稻，城防无人顾及，在豪绅地主的反扑下城池得而复失。这是非常典型的农民队伍，该割稻子了，回家收稻子去了。

中央的报告分析说，“本来是贫农，一旦选为苏维埃执委，就要千方百计去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要当富人，当人上人。以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不是地主了，我就是；他不当豪绅了，我来当。这与革命的观念相去甚远。毛泽东描述当时的队伍说：他们是大烧、大杀、大抢的，他们是大嫖、大赌、大吃、大喝的，他们是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他们忙的不是建设政权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红旗到处乱跑。这是当时非常典型的现象。

在这样一支队伍之中，农民成为革命主体，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可能导致中共丧失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出现农民的意识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

线，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尾巴主义的危险。这都是当时中央所提出的警告。

当时，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中央“八月来信”里讲：“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富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周恩来的概括同样是很尖锐的。

后来曾流传着这样一个事：毛泽东打他弟弟毛泽覃，毛泽覃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毛泽覃打土豪，把一个猪贩子当土豪打，把他的猪全没收，因为好多红军战士想吃猪肉。毛泽东知道后发了很大的火，还想打毛泽覃，被周围人劝住了，没有打成。毛泽覃也急了，说你凭什么打我？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后来在朱、毛之间的分歧斗争中，很多人举这个例子，拿这个反对毛泽东，说毛泽东专断、专权。

我们可以设想，当时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内心非常着急，眼看这支队伍要滑向一边去了。要改造这样一支农民队伍，极其艰苦。不是大多数人在做少数人的工作，是毛泽东等几个先进分子慢慢地让大家觉悟，少数人在做大多数人的工作。正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要整个改造过来，谈何容易。

红四军出现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军阀主义残余等，大多数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有密切关系。面对着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古田会议绝不单单是朱毛之争、前委军委之争，或者权力之争、个人意气之争，它是什么？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军队的较量。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也成为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如果你到底还是一支农民起义军，潮水一样地进来了，潮水一样地退出了，行不行？在当时不能幻想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结构的情况下，如何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情，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历史地落在了古田会议身上。

锻造一支新型军队，这是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所在。这支新型军队能不能锻造出来？毛泽东在争什么？毛泽东自己讲，不为个人争兵权，要为党争兵权，就是要争，要大权独揽，否则无法完成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改造的使命，最终反而会被大多数人改造。毛泽东当时干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在今天看，非常了不得。

古田会议认为，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提分析。

古田会议要求，树立“红军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才去打仗”的目标，脱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立革命政权等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的目标和基础。

古田会议通过坚决斗争以消除影响，也通过正确教育和引导做到有魄力。这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的方法。

古田会议提出，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成分。这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中注重发挥群众的力量，最终改变要从群众自身开始。

古田会议重新塑造了一支武装。这支武装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武装，尤其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农民获得的权利和实惠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必须用生命和鲜血加以保卫。一切只顾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小农意识都成为不现实的妄想，残酷的斗争现实，加之革命思想的注入引导，开始重新塑造这支参加土地革命战争的中国农民。

特别是认识到只有革命不断发展，才能保障家庭所得到的土地及一切利益的时候，“广大农民如铁屑之追随磁石，凝聚在了苏维埃旗帜之下”。抛弃旧观念，以空前的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精神，创造出一支崭新的革

命队伍。这是古田会议的后续效应，它完成了对整支军队的改造。

大革命失败了，让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枪杆子打出了政权，建立一支什么样性质的军队？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包括牺牲了的刘安恭、后来坠机的林彪，他们都做了不懈努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其中，毛泽东的眼光最为远大，因而贡献也最大。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一系列根本问题。它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任何一次农民暴动、武装起义或国民革命武装。枪杆子要民众打江山，枪杆子要捍卫革命的成果和人民的政权。这就是古田会议的辉煌成果——人民军队的军魂在这里锻造。

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影响重大。古田会议之后的中国工农红军，历经第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支队伍哪里还有宗族观念、地域观念、非组织观念？可以说完全转变了。

毛泽东讲过：“这支军队要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支军队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做到了这一点，一扫旧军队的残余，一扫农民起义队伍的特点，锻造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力量。

古田会议的重大意义概括地说，就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理念，工农红军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理念，成为这支队伍坚定信念的时候，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就此诞生了。其获得的巨大力量使中国革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古田会议由政治建军的起点，最终成为革命胜利的起点。



西征作战，白骨永筑青山

西路军的征程，是来自不同方向的红军队伍，在内外矛盾中向着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指挥转变的，艰难痛苦的蜕变。

做一个关于西路军征战历程的辅导，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有利的条件：一是我们已经走了河西走廊的一半到三分之二，都有了感性认识；二是我们看过影片《惊沙》，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三是我们在高台西路军烈士纪念馆，完成了对烈士的祭奠和对整个西路军战史的大致了解。我们将在感性和理性的大致梳理基础之上，来学习西路军的征战历程。

从总体上看，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大约是这样一种趋势：一方面军在海源一带，二方面军在静宁一带，四方面军在会宁。当时，国民党军主要力量的大致布势，是东北军、中央军，包括青马的部队（兰州方向和天水方向）。

红军最初设计的路线，是到定远营去取得苏联的援助。但后来这个路线没有实现。四方面军一部从靖远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之后遭到国民党中央军的尾追；然后在一条山取得胜利，击败了青马的护河部队；然后到了古浪，九军在那里吃了比较大的亏；之后在山丹、临泽、高台又发生了惨烈的战斗，五军受到重大损失，从临泽返回了倪家营子；最后在倪家营子进行拉锯战，同样损失巨大；剩下的部队从倪家营子突围直接进入梨园口，又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

这是一个大致的作战行动。

西路军是战史上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注释：

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出发，作北上转移。张国焘这个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

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2万余人，组成西路军，渡黄河从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下面是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

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从这两次《毛泽东选集》注释的修改里面，我们看出西路军问题的复杂和对西路军存在的争议。这些年来我们对西路军的评价在不断提升。总体可以概括如下：

西路军是指1936年10月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组成的西征队伍，因种种复杂因素在河西走廊发生重大牺牲，到1937年3月分路突围被迫终止使命。

这段历史是我们军史上非常惨烈的一段，在高台的西路军纪念馆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重大牺牲的情况：

战死7000余人，被虏12000千余人。被虏的人中，5600多人被杀害，3000人返回故乡，4000余人被营救送回延安，流落西北各地1000多人，突围至星星峡的400多人。

我们不能讲西路军全军覆灭，为什么？成建制地突破到星星峡，最初统计403人，最后统计为470多人，这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唯一成建制保留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工农红军打通国际的战略行动，由东征到西征，由宁夏战役到最后打通新疆，一步一步地演化为一个庞大

的计划。为完成这一计划，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西路军。西路军的命运与劫难，其担负使命之沉重和聚集矛盾之复杂，斗争之艰苦卓绝和历程之可歌可泣，构成了中国革命史上最动人心魄的事件。

我们讲西路军的征战历程，重点是以下几个方面：为什么要渡河？为什么要孤军深入？为什么未能东返？为什么损失惨重？以及西路军的价值意义。

为什么要渡河？

为什么要渡河？就是要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为什么要接通苏联？中国革命极其困难，被反复围剿，被从江西一直赶到了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然后到了川西、甘肃，还不断往西部压，这时出现一个契机。

长期以来打通新疆、接通苏联的联系，一直是我们党追求的目标。1935年6月16日，长征中的一、四方面军还没有会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联合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当是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以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

这就是说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前，中央已经定了，就是打通国际路线，占领新疆，从新疆获得苏联的援助，这是我们重要的方向。

一、四方面军两军会合后，8月4日至6日政治局举行沙窝会议，毛泽东进一步说：“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

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在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发生革命。我们所有的苏区，都建立在各个省白色政权接合的敌人统治最薄弱的部位。毛泽东始

终把握着这一条。西北是敌人统治最薄弱的一环，又靠近苏联，因此在这里打通苏联，对中国革命非常有利。

紧接着，9月9日，一、四方面军分裂，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与张国焘分裂之后，实现接通苏联的方针更加迫切。

9月12日，北上的一方面军组成抗日先遣队，召开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一、四方面军分裂以后，毛泽东当时非常困难，中央红军北上只剩七千多人了，搞不了太大的名堂了，毛泽东讲，一定要找一个与苏联接近的地方，维持生存，以求将来的发展。即使后来发现了陕北根据地，到了陕北以后，接通苏联的愿望也同样迫切。

1935年11月，张浩从苏联回国，带来重要消息：“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

当时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立即建议：“速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战略根据地。”12月23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1936年红军的战略方针，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这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当时一、四方面军还处于分裂状态，张国焘另立中央，中共中央掌握的力量只有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以这部分力量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兼政委，决定实施西征，设法造成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相机攻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

后来在各方压力下，张国焘也觉得自己搞不成，被迫于6月取消了另立中央，从8月开始，红军从表面上实现了统一。所以8月12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的战略方针：

一、二、四方面军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

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府。

这是当时中央战略方针的演化过程。由决定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单独打通苏联，变成了在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之后，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三个方面军尚未会师，但合作之势已形成。

1936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电告共产国际：

为了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希望苏联方面解决飞机、大炮两项问题。

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回电：

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在你们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000—20000支步枪、8门火炮、12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

今天看起来，感觉提供的援助并不多，但是对当时处境非常困难的红军来说（红三十军枪多一点儿，约5000支；九军约2000支；五军更少，约1000支），能得到20000支步枪、8门火炮、12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弹药，是相当大的支持。

9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三军领导人：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两月后占领宁夏。至于占领甘肃西部问题，等宁夏占领取得国际援助后，再分兵夺取。

共产国际来电：

1936年12月，武器集中在蒙古共和国南部边境，然后向定远营方向输送。

也就是说，武器1936年12月才能到，所以当时中央计划11月占领宁夏，12月，等苏联武器差不多到了，再向定远营挺进。但这个计划后来事与愿违。大家有必要记住这个时间点。后面发生问题，就在这个时间点上。

10月11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军委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正式要夺取宁夏定远营取得苏联援助，当时要求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有利于攻击中卫与靖远之点，努力造船，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结果10月24日晚，三十军在靖远一带渡河，整个行动大幅提前。10月25日晚，九军开始渡河。10月27日凌晨，九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全部过河。10月29日，五军过河。全部过河部队2.18万人。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令河西部队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简单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渡河，是为了打通苏联，取得国际援助。为什么《毛泽东选集》1951年的注释和1991年的注释差异那么大，渡河的时间所反映出来的领导决策的差异，就由此出现了。

为什么要“孤军深入”？

为什么一支部队过河要走那么远，一直走到几乎全军覆没，一直往西走？一方面为了取得援助，但苏联援助最早12月份才能来。先计划到定远营，后来定远营不行了，退到安西。安西又不行了，退到哈密。在哈密，获知援助要等到1936年二三月份才能到。但是我们过河部队为什么要孤军深入呢？

第一个原因，今天，几乎所有的纪念馆、纪念文章都将过河之举描述为“孤军深入”。是不是孤军深入？其实设身处地想，当时河西只有马家

军，国民党力量相对薄弱；河东则重兵云集，集中了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部。

我们今天看到西路军后来的严重损失，觉得过河是“孤军深入”，其实当时，过河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

第二个原因，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先期到达，已经与陕北红军共同组建了陕北根据地。陕北根据地面积并不大，客观上容纳三个方面军也确实有困难，养不了那么多部队。再加上当时两个方面军之间确实存在隔阂，所以就主观来说，开辟另一块根据地，已经成为不仅是张国焘，也是红四方面军多数领导的行动取向。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阴影尚未过去。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一方面军加上陕北红军2.2万人，二方面军1.1万人，四方面军3.8万人。虽然四方面军南下在川西作战时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人数仍然比一、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加起来还要多，作战能力也最强。

三军会师之前在甘南，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说：我军在甘南占领的地区，人口80万，而陕甘宁地区人口才40万，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相对还好些。

这是实际情况，不像我们今天一些人想象的：陕北是块福地，张国焘放着福地不去，偏要到甘南、河西。

陕北红军、中央红军会合之后，陕北的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军政力量。毛泽东知道，张国焘也知道，四方面军先期占领甘南是不错的，人口80万，是陕甘宁地区的两倍，物产也丰富，问题是能不能站住。国民党中央军来了，甘南势必要丢掉。那么从什么地方再搞一块根据地，作为四方面军发展的基础，成了不仅是张国焘，也包括四方面军很多干部的共同心愿。

宁夏战役计划终止之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将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远营改到安西，后来又改到新疆哈密。其主要原因是苏联政府担心苏日关系出现麻烦，如果从外蒙进来，就会和日本发生比较大的冲突。

这样一再改变，形成了什么局面呢？9月11日，共产国际警告，同意

红军部队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区域西部计划，同时坚决不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以免其脱离中国主要区域，成为边缘化的力量。但是两个月后，11月3日，共产国际电报，不得不把援助地点调到哈密，这就使得接收装备的红军必须大纵深西进。这个局面是最初各方面都没有想到的。

援助地点越来越远，时间也越拖越久，从1936年的12月拖到1937年的二三月，最终成为过早渡河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越走越远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原因，出在我方的决策上。四方面军过早渡河，援助没有到，部队也不能回来，所以提出，在甘州、凉州、肃州这一带建立根据地，等待苏联的援助。这也就是后人看到的“孤军深入”局面形成的原因。

为什么没有东返？

如果援助越来越远，一味等待下去，会面临重大损失，可以选择回来。但西路军为什么没有东返？

从全过程来看，西路军有三次东返的时机，但都没有实现。

第一次东返机会：1936年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名“西路军”。一个小时之后，中央再电徐（向前）、陈（昌浩）：

（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

（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刚刚任命西路军一个小时之后，中央再电：

如果没把握接近新疆，如果解决不了衣服问题，可以回来。

但第一次返回的机会，西路军指挥部放弃了，仍然决心打通新疆。

11月12日，徐、陈回电中央：

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

第一次放弃东返，有轻视马匪的因素。四方面军战斗力很强，一路打来，最初不以马匪为然，认为河西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真正的威胁是河东的中央军，蒋介石的嫡系力量，毛炳文部、胡宗南部、关麟征部、王均部。

根据官方统计，马匪的兵力和渡河的西路军兵力相差无几。只不过马家军的装备差，大量是民团，也就是几乎未受正规训练的杂牌军。

11月16日，中央军毛炳文部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对西路军构成重大威胁。当时，河东的红军部队为减轻西路军的压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提前发起山城堡战役作为策应，迫使毛炳文部奉胡宗南之命掉头东返，于11月26日回到河东。

毛炳文部返回河东后，西路军总体松了口气，认为主要威胁解除了。当时中央是希望西路军东返的，以增强河东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红军力量。但鉴于河东国民党重兵云集，河西仅有马家军，西路军领导仍然选择西进，认为有把握在河西走廊创办根据地。这些都有当时的电报为证。

然而11月18日，古浪战斗失利，九军损失了2000多人。这给了西路军一个非常明确的警示，就是马家军并不简单，作战能力还比较强。但这时，第一次东返的机会已经失去了。

第二次东返机会：高台作战以前，西路军已经比较困难了，中央已下令东返。“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提议西路军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夹击敌胡宗南部。但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央取消了东返的命令。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后来回忆：“西安事变后，我们应该坚持东进，而我个人在这时不能坚持己见，说服其他同志实行东进，是战略上之严重错误。因为如果东进，最少可以保存西路军的基本力量，而政治亦有得策之处。继续西进实为失策。”

从陈昌浩的回忆看，中央取消了东进的命令，西路军的大多数领导也不愿意东进，就是陈昌浩个人觉得应该选择东进，但是他没有坚持己见，说服其他同志，他讲这是战略上之严重错误。于是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后，失去了第二次东返机会。

第二次东进返回，是西路军最好的一次机会。当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天寒地冻、民情不通。马家军又是骑兵，行动飘忽快速，使西路军处境越来越困难。如果西路军当时东返，甘肃省主席于学忠是东北军的将领，兰州的东北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会予以配合。河东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王均各路敌军因“西安事变”，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后，是战是和一时难定情势，因此处于彷徨之中。这是当时西路军有可能各个破敌、安全返回的重大机会。但这次机会也没有抓住，又失去了。

第三次东返机会：高台作战失利后的方向选择，也是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

1937年1月20日高台陷落，对西路军震动很大。21日凌晨1时，西路军领导人决定东返，中共中央接到西路军要求东返的电报后，立即要周恩来协商东北军协助西路军东返，并授予西路军领导“行动方向自决”之权。

行动自决权是中央给战区领导的最高授权，行动方向可以自己确定。24日西路军在威狄堡受阻，又回到了倪家营子，失去东返最后一次机会。

这样来看，一次一次机会的失去使西路军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困守倪家营子。当然最后中央也有电报：

你们坚守50天就有办法。

后来又说：

你们坚持30天就有办法。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坚守到最后。

国民党方面关于“河西走廊之役”（即我们所说的“西路军征战”）的记载：

始于1936年10月12日，共军利用截获我商民的羊毛皮筏，在靖远县中泉子强渡黄河，至次年4月底安西截击止，在整整半年时间当中，最惨烈的战争有四次，第一是克复古浪，第二是鏖战高台，第三是倪家营子拉锯战，第四是扫荡梨园堡。

这是国民党方面的记载，倪家营子是最后一战。在倪家营子三进三出，当时有战略方案选择问题，有作战能力评估问题，也有领导层的犹豫问题。徐帅后来回忆：“不能利用当机决断权。中央已经授予了可以临机决断，结果来回地犹豫。”

最后时刻，1937年3月13日，中央军委主席团复电徐向前、陈昌浩：

你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地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项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一个是率现存之三团人员向外蒙冲去；第二是率现存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不论采取哪一种，均须将伤病员安置民间，均须采取自主自动姿态，均须轻装，均须取变化不测战术，如何，望立复。

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石窝会议回复中央及军委：

（一）今天血战部队无弹，饥渴，损失甚大，已战到最后，现存两团余兵力，伤亡及牺牲团级干部甚多，只有设法保存基干；（二）军政委员会决定徐、陈脱离部队，由卓然、先念、李特、树声、世才、黄超、国炳组成工作委员会，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卓然负政治领导，受工委直接指挥。

徐帅到了晚年讲起来，后悔的就是这一点，认为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不应该脱离部队。

在最困难的时刻，李先念担任军事指挥，李卓然出任政治领导。当时石窝会议决定：尚存人员编为三个支队，李先念支队、王树声支队、张荣支队，分散游击。西路军工委随李支队行动。河西走廊两边，一边是祁连山，一边是荒漠戈壁，在这样的区域里打游击非常困难，不毛之地，生存都成问题。

石窝会议后不久，张荣支队、王树声支队先后被敌打散。唯李先念支队经过极其艰苦的转战和漫漫长途跋涉，最后抵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成为西路军中唯一一支成建制保留下来的队伍。全部力量最后仅余四百多人，西路军受到重大损失。

为什么损失惨重？

一是轻敌。大家普遍认为，河西是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以为马家军战斗力不行。李先念同志晚年有段回忆：

西路军领导开始对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的困难和敌人力量估计不足。到临高地区之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基本被我击溃。对形势估计判断错误，发生失误。古浪战斗失利，西路军领导感到“出人意料”（没有想到九军损失了两千多人）；高台保卫战，董振堂奉命死守高台，两千八百余名官兵几乎全部殉难，对西路军领导“震动很大”。

从总体看，低估了马家军的作战能力是我们吃大亏的一个前提条件。马家军的核心就是马步芳的青海第100师，警备第1旅、第2旅，马步青的骑兵5师，总兵力不到3万。

我们对马家军的认识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最初并不看好它，但后来遭到失败，又把对手描述得十分强大，不仅具有兵力优势，还有装备优势，

使我们陷于对方火力的猛攻之中。

事实上他们没有那么显著的优势。其武器装备较我军低劣，民团方面更谈不上训练，持长矛大刀及19世纪的毛瑟铅丸火枪。

五军军长董振堂对西路军的领导说过：马匪作战能力不行。因为董振堂当初在西北军服役的时候，1928年曾在永登与马家军作过战，对方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所以董振堂认为马家军训练水平低，作战能力不强，渡过黄河打垮马家军没有多大问题。

当时红军指挥员中发生这样的对敌人判断失误，不止董振堂一个，中央红军中也有同样的问题。

1933年3月4日，马鸿逵第105旅进占光山郭家河村，与汤恩伯第89师换防。3月6日拂晓，红二十五军74师秘密急行军60里到达郭家河，乘敌人地生疏、立足未稳发起突然进攻，以伤亡30人代价歼敌两个团，毙敌207团团长马兆图、副团长吕宗文，俘敌205团团长马鸣及其下属官兵2000余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余支、战马百余匹，副旅长马登科仅带60余人落荒而逃。

这些战例都大大增强了红军面对马家军作战的信心。我们为什么要在河西走廊，在甘州、凉州、肃州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后来看根本就不可能，但当时低估了对手，觉得可能。

中央红军也发生过低估敌人的问题。遵义会议开完，确立的战略方针是“赤化四川”，首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中央红军中的几位川籍将领向中央的建议，认为川军好打，作战能力不强，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赤化四川没有问题。遵义会议采纳了这一意见，结果土城一役吃了大亏。那是毛泽东同志刚刚复出，刚刚通过遵义会议获得了军事指挥权，指挥的第一仗就打败，被迫一渡赤水，从宜宾一带渡过长江的计划完全无法实现。

所以，对敌人的低估不仅发生在西路军，中央红军照样发生。尤其五军军长董振堂长期在西北作战，对马家军是了解的。他向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建议，认为马家军战斗力不行，会给西路军主要领导留下深刻印象。被大家忽略的是，董振堂已经离开西北多年，而这段时间内马家军也是变

化的。

1928年和董振堂作战的马家军，三日一操练，半年一会操，多数士兵把给养拿回去过生活。所以甘、青一带有“只吃粮，不当兵”之说。说是去当兵，当什么兵啊，把粮食拿回家去了，也没什么训练，就是三天去出个操，半年去会个操，非常松散的部队。甚至围攻古浪作战时，马家军缺乏现代化训练的弱点也暴露无遗。因不熟悉陆空联络技术，不懂得要布置通讯布板，被前来助战的国民党飞机炸死士兵10多名，军马炸死了30匹。所以董振堂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

但董振堂在保定军校学习的时候，马步芳也在保定军校学习。马步芳后来又在西北军干过，觉得西北军的训练非常好。董振堂他们打完仗离开西北之后，马步芳掌握军队，认真仿照西北军的训练方法，使军队的素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点，董振堂等人未曾料到。低估了马家军的作战能力，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家军的战法是西北特有地形上产生的传统作战方法。河湟骑兵机动灵活，自古已然。历史上中原武力进入西北就吃了这方面的亏。同治初年，陕甘总督杨岳斌镇压回民反抗，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

每值接仗，千群万骑，以相抗拒；一经击败，狼奔豕突，行走如飞。

西北地广人稀，遮蔽物又少，徒步作战和马背上作战的差别很大。杨岳斌讲的就是千群万骑“呼啦啦来了，又呼啦啦跑了”这种西北作战的特点。我们当时并没有把这种对手充分掌握。左宗棠征西，也在给他儿子的信上说：

贼剽锐殊甚，遇坚军则转瞬不见踪迹，遇暇军则有隙即入，亦不即招架，非长毛所能。

左宗棠所说的“长毛”指太平天国。左宗棠镇压了太平天国。他拿这个力量与太平天国比较，发现完全不一样。“遇坚军则转瞬不见踪迹”，

一看你强，骑马跑掉了；“遇暇军则有隙即入”，只要有缝隙，就趁机冲杀进来。这是一个我们不适应的对手和不适应的作战方式。

马家军的骑兵在机动性上确实胜红军一筹。西路军刚刚宿营做饭，马家军一见红军炊烟，急驰而至，将来不及吃的饭食挑翻倾倒后立即逃窜。如此一连数日，给西路军造成极大困扰。过去我们习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现在马家军也来这一套，来得快，跑得也快，确实在战法上就让西路军十分被动。马步芳自己编的“马家军骑兵歌”：

突前线，扰后方，像闪电，似疯狂。

这是一个我们不大看得上的对手，却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1936年11月，马家军召开武威军事会议。攻打古浪的敌指挥官、旅长马元海（此人给西路军造成了最大伤害，任第一线总指挥）在会上发言：

与共军正面作战，兵力装备我们比不过，也斗不过，最好的办法是尾追。我们有的是骑兵，发挥骑兵特长，天天将共军的殿后部队截取一部，从武威到嘉峪关的狭长通道上，很能截取一大部分共军的兵力。这种切尾的办法，所用兵力不多，红军只能忍痛，不可能回头护尾，收获的效果一定可观。如果红军长途流窜疲惫之余占领城池顽抗，我则用大力围攻。骑兵沿途疲劳追击使共军休整和给养都成问题，以饥饿疲惫之军盘踞城池，绝没有攻无不克之理。

马元海等人把西北地形掌握透了，把我们的短处看透了，利用这一点，其兵力装备虽然不行，但一截一截吃红军，用他的骑兵快速截我后卫。因为这个武威军事会议，马元海的理论深得马家军其他将领的赞赏，把他推为步骑兵全军总指挥。

马元海直接指挥青海第2警备旅、第100师刘德呈团、循化民团、西

宁东南川民团。马彪为第一路指挥，下属 100 师的马忠义团、陈嘉科团，青海警备旅马元祥团、马得胜团和临夏旧洮庄民团、门源民团。马朴为骑兵第二路指挥，下属 100 师的骑兵旅，西宁鲁沙尔民团，西宁上五庄民团、湟源民团。马禄为骑兵第三路的指挥，下属骑兵 5 师马禄旅及韩起功旅，韩起功为步兵指挥，下属骑兵 5 师马呈祥、祁明山旅，第 100 师 300 旅手枪团，西宁市民团，张掖民团。第 100 师的马步康、马全义等部，还有民和、互助、乐都、贵德、同仁等县的民团为总预备队。

今天看起来，这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但这是一帮烧砸抢能力很强的匪徒。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是总指挥，在围攻兰州之前和打下兰州之后非常谨慎，打下兰州之后，尤其是继续向西进入河西走廊时，更是无比小心。因为部队会与马家军相遇，而西路军吃过非常大的亏。但在那个时候，马家军已经完全不行了。

马家军这种骑兵作战形式，在连发武器打击和炮火摧毁下，是一点优势都没有的。解放战争时期，彭总带的部队炮兵没有问题，连发武器没有问题，所以彭总过了兰州往西北打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西路军的这种场景，完全一路平推全部扫荡，全部消灭光。马家军这种战法在我军装备低劣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与解放战争中的我军步兵、炮兵根本无法抗衡。

但在当时红军的简陋装备之下，马家军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而恰恰我们出现了问题，未坚持集中兵力。中央 11 月 25 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

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只要是打两团以上之敌，西路军领导人必须亲临现场指导。

又电：

只要粮房不缺，把西路军全部集中到方圆四五十里范围内，齐打齐进。

后来发生的西路军和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期间，

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永昌、山丹期间，西路军在三百余里战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高台、临泽期间，西路军又是摆出了“一字长蛇阵”，一次又一次地吃了没有集中兵力的亏。

陈昌浩就讲：我们确实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一条山时未多集中兵力击敌；在甘、红、古浪时集中兵力不够，主力分开；永昌时期未能“齐打齐进”；水泉子伏兵嫌弱，高台时未能将主力迅速靠近五军。

高台那一战，五军的电台掌握在政委黄超手里，五军军长董振堂孤军奋战，却无法向后方转告信息。因为黄超不在高台，导致整个部队失联，援兵不及，五军受到重创，董振堂牺牲。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导致西路军损失惨重的原因之一，轻敌。

二是高层决策的分歧。

正如历史学家胡绳讲的一样：西路军问题涉及张国焘问题，当时中央红军已受到很大削弱，而张国焘四方面军却兵强马壮。

胡绳还讲：“西路军接受的是军委命令，上面署名是张国焘、朱德，张和军委不能截然分开。张当时想与苏联挂上，抬高自己的权势。”

我们今天研究西路军问题，切忌“大翻烧饼”。过去讲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损失，今天又讲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决策的损失，两种讲法都有问题。

当时，对方针的分歧确实发生在了高层，但是我们讲这些分歧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结合实际情况。共产党的力量、红军的力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不同山头形成的。

1927年以后的武装起义，海陆丰起义、湘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琼崖根据地、赣南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闽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等，由于工农武装割据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共产党从一开始搞武装斗争，就是来自不同山头的武装力量，演化成三支最大的力量：以赣南和闽西苏区为核心的中央红军，以鄂豫皖苏区为核心

的红四方面军，以湘鄂西苏区为核心的红二方面军。

不同的力量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山头。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山头通过磨合、斗争形成统一领导、统一步伐、统一指挥、统一意志，那是非常困难的，必须付出代价的。

当时红四军内部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如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大多数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密切相关。随着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革命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红军必须完成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统一。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也成为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一支农民队伍怎么变成一个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不同于李自成、不同于陈胜吴广、不同于黄巢、不同于太平天国的队伍。解决这一问题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古田会议上。

毛泽东当时讲，“不为个人争兵权，要为党争兵权”，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当时红四军内部朱、毛之间的矛盾，被一些海外的学者和我们一些搞党史的人说成是毛泽东争权、揽权。毛泽东就是争，但不是为个人争，而是为党争。要通过集中统一指挥实现改造，进而才能实现胜利。

西路军的问题，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有人又说是毛泽东争权，争张国焘的军权。毛泽东争的是红军集中统一指挥，只有这样红军才能获得胜利。没有统一的领导力量，没有统一步骤和一致的行动，不可能获得胜利，不可能把我们与太平天国划分开来，与陈胜吴广划分开来。所以当时对西路军行动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

1936年6月，张国焘刚刚取消“伪中央”，对四方面军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对红军发展方向和方式各执己见：先河东还是河西，先向南还是向北，先建立根据地还是先接通远方，先灭马家军还是

先取得援助，靠自身力量还是靠外援力量……思路不一致，步调不一致，缓急不一致，方针不一致。西路军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艰苦作战的。

实际上，当时在中央领导层内部分歧是很大的，而我们也不能说张国焘完全不服从中央指挥。因为张国焘时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的第二领导者，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德。当时的主要命令电报，以中革军委张国焘、朱德名义发出，很大程度上是张国焘的意思，它与中央的命令是有差别的。当时中央也不好直接指挥得这么具体，因为对四方面军的力量不好直接介入。

1936年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1936年9月，中央认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应该先南后北，要求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宁）兰（州）大道，与一方面军共同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夺取宁夏。但是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掉头西进，打算渡河，渡过黄河占领甘北，作为“目前最重要的一环”，不愿意与中央会合。他对陈昌浩说：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

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是将宁夏战役看作另辟根据地的非常好的机会。他积极指挥四方面军部队抢先渡河，主要是为了在河西找一个全新的安身之地。所以10月28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陈述他的部署：

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取得物资后，再与主力回击深入之敌就更有把握了。

张国焘的意思是先到宁夏，先拿装备。中央的意思是一、四方面军共同取装备，包括二方面军也共同到定远营。如果不明白当时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分歧，和来自不同的根据地、不同山头之间利益的不同取向，你就很难明白西路军的形成及其后来错综复杂的行动。

10月2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他与张国焘共商：

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暂不渡为宜；

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几乎在毛泽东要求彭德怀与张国焘“共商”的同时，10月24日晚三十军已在靖远以南的地区渡河，“共商”几成多余。虽然今人不知晓当时彭德怀是否还来得及与张国焘“共商”，但三十军的过河总算还有一份中央的背书，九军的过河呢？毛泽东24日刚讲“九军拟暂不渡为宜”，25日晚九军就开始渡河。说九军不服从中央命令，但九军得到了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联名的命令，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其实当时主要是张国焘的意思，朱德被张国焘完全架空了。

10月26日，张国焘命令九军、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就在渡河的当天，中央以绝密电致前敌总指挥彭德怀：

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凉州在西面，宁夏在北面，张国焘有意向西不向北。10月27日，九军及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全部过河。同日，彭德怀、聂荣臻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有意破坏预定计划。宁夏战役计划首先击破南敌，四方面军一个军渡河，两个军留在河东，与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共同击退南面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等部。由于四方面军的几个军都渡河，首先击破南敌的方案流产。

10月28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及各军首长：

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

中央提出警告，三个方面军要联合起来，否则麻烦。结果话音刚落，10月29日五军过河。从今天来看，西路军作战能力原本强劲，它的整个

历史也非常悲壮，但是在过河这个问题上，九军、五军都没得到中央认可。中央后来追认了九军过河，但一直没有认可五军过河。简单说它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不服从中央指挥，也不太对。

问题在哪里呢？从中央层面看，要求九军、五军不要过河它却过了，可以说违背了中央的意思，但从它的指挥程序来看，当时中央还不能够完全指挥调动红四方面军，他们过去一直是服从张国焘指挥的，具体行动也得到了中革军委的背书，所以也不能够简单说成是擅自行动。

毛泽东设想通过组织宁夏战役，实现统一指挥，获得对三个方面军的指挥权。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召开会议让各方面把指挥权交来，而是通过一次实际作战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号令。所以10月29日，毛泽东在给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

全战役需掌握在你一个人的手里。

就是想通过实际作战，真正获得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指挥权。但彭德怀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彭向中央报告：

张对打击胡敌始终动摇，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

张国焘不想先打，想先到定远营获取苏联援助物资，这给当时中央的指挥号令带来重大问题。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11月初截断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执行，西路军由此成为孤军。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红军指挥步调不统一带来的重大问题。

11月5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

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电报里面几次写到“独立”“独立开展一个局面”“独立地去完成你们的任务”，还特别指出“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不受一切牵制”。实质上是强调，中央来电，你们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你们有专断权，关键要搞出一个独立的局面来。这就是在当时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对西路军的复杂指挥体制。

11月16日，西路军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张国焘立即批准：

你们的独立行动，对实现党的政策路线和战略方针有伟大意义。你们即在甘北、宁夏西北、青海东部大大扩大活动区域，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回蒙革命团体、政权机关和游击队等，必要时你们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

“独立行动”“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这是张国焘对西路军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独立地搞出一个局面。

因步调不一致，中央的海打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作战新计划等需要一、四方面军配合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实现。这是我们今天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却是当时存在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指挥层面出现了分歧。尤其是中央对四方面军没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挥、也不能直接指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军之间的误解交叉其中。由此造成了西路军后来的命运。

三是错判。

不仅张国焘发生了错判，中央也发生了一些错判。

错判之一，中央低估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难度，毛泽东同志

也低估了。

1936年6月毛泽东致函彭德怀：

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个：一是宁夏和绥远以西，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条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有妨碍，但能形成根据地。

实际上在甘、凉、肃三州的河西走廊一带，建立根据地非常困难。这是中央发生的第一个错判。

错判之二，是高估了东北军对西北军阀的影响。

“西安事变”以后，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觉得我们能够通过与西北、东北军的合作，使整个西路军的处境发生重大改善。当时甘肃省主席是东北军军长于学忠，我们与东北军的张学良达成协议，与西北军的杨虎城达成协议，与甘肃省主席于学忠达成协议，都是要改善西路军的处境，而且几个方面都同意了。所以12月27日，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

可见当时中央是看好西进的，认为西路军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数日之后，国民党中央军进抵西安。东北军、西北军为保证西安的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一部分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迎击胡宗南。于是中央改变西路军西进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配合东北军行动。这样就出现了西路军忽西忽东的拉锯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革军委主席电示徐向前、陈昌浩：

西路军仍应执行西进任务。

随后蒋介石又调集重兵进攻西安。根据形势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

出现“反复拉锯”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在对当时形势进行判断，另一方面在不断改变判断。对东北军、西北军能不能与红军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判断，对东北军控局能力的判断，等等。这一系列判断之间的拉锯，导致了后来西路军行动的来回拉锯，在倪家营子的来回拉锯。

这种拉锯有点儿像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来回地调集部队，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一会儿渡过去，一会儿渡回来。当时部队中充满了怨言，连林彪都发牢骚说，为什么不走弓弦而走弓背。这是部队不了解中央战略意图，中央决策就是根据敌人的布势来回地改变。所以，西路军在西部的行踪不定，来回反复，包含有中共中央对形势判断的来回修正。当时以为东北军能有很大影响，最后证实它没有太大影响，对马匪则几乎没有影响。

为了援助西路军，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西路军领导机关……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

当时对东北军抱了希望，也对马匪抱了希望。

中央2月6日致电周恩来：

与于学忠商调1师、2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与西路军配合。

希望东北军在西路军解除困境方面发挥作用。

2月24日，毛泽东再电在西安作为国共和谈调解人的周恩来：

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二马有代表在西安否？

后来有些人讲，毛泽东想让西路军陷入绝境，这完全是信口雌黄。毛泽东恨不得收买马步芳，让他放过西路军。听说他很爱钱，便问“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步芳，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说毛泽东当时对马步芳抱有幻想，小看了其干到底的决心，是不得不认的事实；说毛泽东想让西路军覆灭，见死不救，则是不折不扣的污蔑。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过很多失败，西路军是其中一个重大失败。怎么总结出经验教训来？经验教训的总结来自于它的客观，指挥层面、统帅层面都有问题，都有加以检讨的必要。而我们不能用统帅层面的问题掩盖指挥层面的问题，也不能企图用指挥层面的问题掩盖统帅层面的问题。

1988年徐帅的《历史的回顾》出版，他总结了四点西路军的历史教训：

第一，任务多变。

第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

第三，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

第四，对蒋介石的轻信。

后来出现了一本在香港出版的《史说长征》，内容与这种认识完全不相符，将西路军的覆亡说成是毛泽东的阴谋诡计，中央陷西路军于绝境，最后取得对红军的统一指挥权。2010年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点名批评这本书，称它完全歪曲了我们的历史。摘几份于己有利的电报，得出自己的结论。于己不利的电报，一概不引用。这是在研究历史、思索教训吗？习近平同志说：“要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把西路军问题变成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个人权力之争、指挥权力之争，

以牺牲西路军为代价，取得对红军的统一领导，这是对我们党史的严重玷污和亵渎。

悲壮牺牲，浴血为使命

讲到西路军的价值意义，《中共党史》第一卷曾对西路军做出这样的评价：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搏斗中，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来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

在影片《惊沙》中，高台之战、临泽之战集中体现了西路军英勇顽强、血战到底，绝不向敌人屈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红军官兵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战争中以弱击强、以劣胜优，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令人瞠目的神奇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支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血脉。我们在指挥层面出了些问题，有方向的争论，有方针的争论，但我们一线官兵作战极其英勇。

俄罗斯在车臣战争中产生的一句名言值得我们琢磨和牢记：“如果指挥员判断错了，那么就只能靠前方战士的浴血奋战去力挽狂澜。”指挥员判断错了，前方战士可能能够力挽狂澜，也可能不能。西路军就是一群最终无法力挽狂澜的战士。如果是悲剧，最大的悲剧意义就在这里。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讲：“西路军上至指挥下至战士，无不坚毅不拔、艰苦奋斗、抱定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旗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企图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与‘接通远方’之艰

巨行动，克服着任何红军所未遭受之困难而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终以饥疲之师，在弹尽粮绝境地，而根本失败。”这是西路军留给后人的最顽强的奋斗之音。

西路军在河西战场响彻云霄的金戈铁马早已淡去，浴血奋战的硝烟也已散尽。西路军悲壮的征战，已汇入了历史长河，正在离我们今天越来越远。但西路军广大官兵“碧血染黄沙，白骨筑青山”的革命斗争精神却长留于天地之间。就像西路军高台的这座丰碑一样，永远映照着我们今天的和平发展。

八十多年过去，大浪淘沙，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仍然在中国革命斗争史册上永放光芒。我们今天讲西路军问题，一方面是激情，浴血奋战、战斗到最后；另一方面要讲理性，要看到西路军的军事行动发动在中共中央若干重要转变的过程之中：

一是中国革命即将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必须完成这个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很多人不适应中国革命有可能而且一定要从分散到集中。

二是红军指挥权将由分散向集中转变。过去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独立指挥自己的力量，现在要统一指挥。

三是国内政局由国共内战向统一抗战的转变。

西路军问题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中央指挥机构开始对全部红军实行战略性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一次最为重大的转变。古田会议是一个转变，毛泽东完成了对中央红军的全部领导，实现了中央苏区内的统一指挥。解决西路军问题过程中，中共中央则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会师之时就想实现这样的指挥，但未能实现。西路军的失败是这一转变过程中付出的重大代价。不论有无这一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这种历史性转变必然进行。没有这样的失败，转变的时间会长一些，但是转变本身不可阻止。中国共产党要获得胜利，必须完成这样的转变。

大革命失败，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建立什么样的军队，如何领导好这支军队，如何夺取胜利，问题依然严重地摆在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这注定是必须经历无数磨难、付出重大牺牲才能认识 and 解决的过程。绝不会一蹴而就，绝不是开一次两次会议、经过一次两次谈心就能完成。现代化最终是人的现代化，统一最终也是人的思想上的统一。这样的统一很难做到。

在这样一个完成思想与组织高度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的眼光最远，贡献也最大。“中国工农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古田会议决议，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不同于历朝历代任何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使这支军队从小到大，从失败到胜利，这支军队的军魂也在此铸就。

历史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任何重大事件都是由多种复杂因素编织交错而成的。这是我们今天观察西路军问题应该具有的更大的视野。中国共产党即将踏上东方的政治舞台，西路军就是打通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通道。援助地点不断地改变则是苏日之间矛盾造成的结果，而“西安事变”更是日本与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苏联与日本之间矛盾的集中爆发。西路军就是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今天，我们看西路军问题，绝不能孤立地就红军看西路军，就河西走廊看西路军，就四方面军看西路军，越看思路越窄，越看心结越深。而应该从更大的背景来观察，从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大力量在东方政治舞台博弈的角度来观察西路军的命运。表面上看包含了中共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与不和、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认识差距、红军与地方军阀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等等；从大的视野看，则是来自不同方向的红军队伍，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向着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指挥转变的革命军队艰难痛苦的蜕变。

历史证明：严密的党的组织和统一的被坚决贯彻的军政号令，是中国共产党制胜的关键条件。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西路军问题应该具有的更大胸襟。一定要建设一支严密的党的组织和统一的坚决贯彻军政号令的队伍，才能获得胜利。国民党前参谋总长郝伯村写的《解读蒋公日记》，总结1945年到1949年国民党在国内战场上失败时说：

国共斗争两党体制上有根本差异，共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工农群众起家，毛泽东的领导风格是彻底斗倒内敌，不留残渣，以内部检讨、坦白、批判形成党内精纯，领袖权威、基层扎根，这是共党坚强战斗力的来源。国民党看似集权，实际是组织松散、纪律不严，党组织以知识分子为多，形成士大夫习气和官僚风，不能深入基层，不能植根于农村，导致国民党满盘皆输。

这是我们的对手对共产党为什么获得胜利的概括总结。在夺取胜利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一定要夺取这样的胜利。

1937年12月下旬，毛泽东会见当时西路军的左支队指挥员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人。西路军的失败，使其中一些领导人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毛泽东有所觉察，感到对西路军的返回将士处置措施过于严厉，要做调整。

程世才回忆，毛泽东讲到客观原因时说：“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米宽的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缺乏同骑兵作战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他还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其他任何军队也是做不到的。”

程世才回忆，毛泽东主席最后站起来，走了几步，把一只手稳稳地放在桌子上，望着他们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最后一定会胜利。”毛泽东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广大西路军干部、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就用大刀、长矛和敌人厮杀。但是这也证明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

毛泽东这句话值得我们牢记。一个军队胜利，绝不能仅凭拼杀的精神。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失败。

西路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从来不能淹没四方面军是我们军队中战将杰出的队伍，他们是从苦难之中拼杀出来的一批将领，很多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都来自于四方面军和西路军这样的力量。

西方著名军事学者克劳塞维茨说：“仅仅靠纪律、制度、规范、条令和组织并不能使军队产生尚武精神，尚武精神只有两个来源：胜利和苦难，唯有这两个因素，能让军人认识自己的力量。”

不仅西路军的苦难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之源，更包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苦难，包括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苦难：8万红军过湘江只剩3万，5万红军损失，湘江血流成河。中国革命就是这么过来的。当时老蒋都觉得红军肯定不行了，肯定失败了，但就是不败。这是共产党人的生命力。

克劳塞维茨说：“一旦武德的幼芽成长成粗壮的大树，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风暴，甚至可以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我们当年的红军力量，就是通过一道道艰难奋战、浴血牺牲的关口形成武德，长成粗壮的大树，前仆后继地向前奋斗，最后获得全国胜利。百万雄师过大江奠定在牺牲多少先烈的基础之上。我们达成这样的胜利，任何人的牺牲都不是白白牺牲，都成了胜利最坚实的基础。

山川地貌的巨变，历史前进的距离，是多少代人牺牲的成果。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一定要让后人也能站上我们的肩膀。一代一代奋斗不息，最终实现习近平同志所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家尊严，用胜利来捍卫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如果仅凭内战胜利，还不足以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这个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

中国的全球化是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从此，我们进入了世界体系。

百年中国，何处不沧桑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仅1.5万军队，就迫使大清王朝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1858~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2.5万人，长驱直入北京，将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2亿两白银；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国达到灾难的顶峰。8个国家总共来了1.8万余人，日军最多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地利军58人、意大利军53人。10天之内攻陷北京。京冀一带义和团民五六十万，清军十五六万，兵力如此之众，却不堪一击。

中国当时的衰弱，就像破茅草房子，一脚就踹倒了，然后弄个梁柱支起来，再进来一脚又踹倒了。最终的结果是：《辛丑条约》赔款13个帝国主义国家4.5亿两白银，大清王朝最后轰然崩塌。

但是大清王朝崩塌了又怎么样，灾难结束了吗？没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是要将基督教义中国化，天父天兄，上帝，耶稣，但洪秀全最终失败了。

镇压洪秀全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发起了“洋务运动”，他们认为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器不如人”，机器制造、科学技术不行，所以我们要学西方，学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30年，甲午一战，北洋水师灰飞烟灭，全军覆没。

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出来搞“君主立宪”，他们认为曾国藩、左宗棠、

李鸿章提出的“器不如人”太表浅了，中国不是“器不如人”，是“制不如人”。梁启超讲：“唤醒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所以要改制。于是，“戊戌维新”实行了君主立宪改制，但最终也失败了。

孙中山建立“共和”也是改制，但共和成果却被袁世凯篡夺，后来很多人把没有搞成共和都推到袁世凯身上，但这也不公平。袁世凯死于1916年，他死后12年，也实验了12年共和。结果北京九易政府，24次内阁改组，换了26届总理，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共和最终昙花一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胡适、钱玄同、鲁迅、陈独秀、郭沫若提出口号：“打倒孔家店”。在他们看来，曾、左、李的“器不如人”，康、梁、孙中山的“制不如人”，都不对。中国是“思想文化不如人”，所以要打倒孔家店，彻底抛弃孔孟之道。当年的“五四运动”先驱们集体提出打倒孔家店，而今天的孔子学院却遍布全世界，前后居然形成这么大的反差，孔子并没有妨碍我们走进现代化。当年矛头还曾对准过汉字，认为汉字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因此要“罗马字母化”，废除汉字。

在今天看来，他们都是勇敢的探索者。今天我们分析他们，后人也会分析我们，一代一代探索不止，所以我们要对探索者充满敬仰，他们虽然没有成功，但却顽强不息。

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提“中国梦”，但是，通过对北京到上海之间的新闻界、出版界、知识界做调查，发现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谈论“梦想”。

清华大学教授林语堂说他“只希望国中有小小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到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的梦想是“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这是最重要的事，这种嗜好延长下去非灭种不可，任凭有极好的政治制度也是无益的”；上海大学学者施蛰存讲他的梦想是“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罗文干谈他的梦想是“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争的勇毅转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妇女理家崇尚勤俭、不学摩登，青年勤俭刻苦、不穿洋服、振兴国货”。

他们的梦想加在一起就是四个字“民族救亡”。国家民族在危险的边缘，

如何拯救？

大清王朝崩塌了，民国成立了，灾难却没有过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关东军1.9万，东北军19万，两天丢掉奉天（今沈阳），一个多星期丢掉辽宁，两个多月东三省沦陷，我们的兵力十倍于它，却轻易丢掉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8400人，宋哲元29军10万人，一个月华北沦陷。中国如此衰弱，一击即垮。

现在，国家对教科书做了修正，“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即从“九一八”开始，这才是中国人抗战的全部历史。

近百年来的中华民族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能进入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现代的民主国家吗？如果能，我们的民族前途是光明的；如果不能，我们这个民族就是没有前途的。

哪一个政治团体能完成这个使命，你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就有最根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共产党人，铁肩担大任

近代中国一盘散沙。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广州三元里，只有个别人在抗击，大多数民众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粮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与我何干，皇帝打败了，赔皇帝的钱，割皇帝的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我百姓无关”。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民众竟然加入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进击，18000多人十天之内攻陷北京。为什么？今天看当年留下的图片，多少民众帮着八国联军推小车，又有多少人向八国联军通风报信。广渠门下水道未曾设防，联军从广渠门下水道鱼贯而入，那么多民众揣着手站在两边麻木地观看。民众帮着填平

壕沟，帮着架梯子，帮着在墙头上瞭望。

孙中山曾经讲过一句话：“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严复，留学英国，日本伊藤博文的同学，他回来后翻译了大量西方图书，他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中国的王朝更替就是姓氏的更替，刘姓的汉朝变成了李姓的唐朝、赵姓的宋朝、朱姓的明朝、爱新觉罗姓的清朝。“其兴也，此一家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与百姓无关。

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是1948年在东京国际战犯法庭被判处绞刑的七个甲级战犯之一。1931年8月，板垣征四郎在东北给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说：

“关东军心里不托底，我们就1万多人，东北军将近20万，我们搞得过吗？搞得过，没问题。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中国是一个同近代国家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他们就是交税，交给满洲国也是交，交给日本人也是交，交给国民党也是交，无所谓的。只要能交税养家糊口，怎么都行。他们不是一个团体，他们是分散的个体。”

另外一位“九一八”事变的元凶石原莞尔，被称为“日本陆军最富战

略头脑的人”，他讲了一句话：“我不用拔剑，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近代侵略者对中国的轻视，对民众及整个国家的轻视，令人心寒。

抗战期间，我们毫不否定正面战场的作用，但是一定不要忘记，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投敌，58位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的国家。

“二战”各国都有伪军。德国进攻法国，法国有伪军；德国进攻苏联，乌克兰有伪军；但像中国这种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的，独此一份。当时的中国政治被演绎得如此丑陋，出现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党政精英。

周作人，鲁迅的弟弟，今天不少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所谓“近代散文第一家”，但是可以不讲品质，只讲才能吗？

当年，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字，周作人不签。“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不签不走可以，还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最初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的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不到1%。日方已有底案，如果周作人坚持不受只有作罢，并不打算勉为其难，没想到周作人欣然接受，出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跟随汪精卫访日访满洲国，发表讲演，慰问日本伤兵。

周作人说：“我不干，他们派刺客来杀我。”根本不是什么日本刺客，其实要杀周作人的是国民党军统戴笠，下命令的则是蒋介石，他命令清除汉奸文人周作人。

刺客半夜爬到周作人家里，周作人不知道，自己去开门，刺客当胸一枪。但刺客怕晚上刺杀声音太大，所以为了消音，枪的口径用得很小，子弹威力不强，正好打中周作人衣服的铜扣子，一下子弹开了。周作人应声倒地，却毫发未损，身上连轻伤都没有。他的佣人从里屋出来，刺客第二枪把佣

人打死了。刺客误以为打死了周作人，连夜报告击毙了周作人。

周作人后来说：“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又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现文天祥。”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暗无天日的年代，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仰天长叹“我们的英雄不知在何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中的全部合理性合法性，就是他们的民族担当。在最困难、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共产党人站出来了。

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抵抗到最后剩自己一个人，有希望吗？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但他继续抵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杨靖宇一米八几，身高腿长。东北的隆冬，雪很深，日本人形容杨靖宇像个大鸵鸟，在雪地上蹦一蹦几下就没影了。日本人个矮腿短，雪深没膝，怎么跑也追不上他，于是就特别佩服他，甚至把他神化了。最终将杨靖宇置于绝境的，不是日本人，反倒是他身边的一个个叛徒。

第一个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程斌知道杨靖宇必然藏身于某个深山老林的密营中。那些密营里有粮食，有柴火，使得杨靖宇能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程斌带领“讨伐队”将密营全部捣毁，使杨靖宇失去了生存的保障。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被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他带着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张秀峰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的活动规律。此人2月叛变，杨靖宇3月份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第四个叛徒：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仓皇失措地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哪一个不是中国人？他们又都是失去了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有一段赵廷喜与杨靖宇的对话。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赵廷喜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杨靖宇投降，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杨靖宇的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只剩单枪匹马的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一句话惊天动地，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个中央委员投敌吗？有一个将官投敌吗？一个都没有！

当年的这批人面对黑暗的时代、黑暗的世界，踏上中国政治舞台。李大钊 37 岁英勇就义；毛泽东 34 岁上井冈山，开辟工农武装格局，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朱德 30 岁成为护国名将，反袁护法；周恩来 29 岁主持“南昌暴动”，奠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博古 24 岁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聂耳 22 岁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徐怀洲 19 岁当师长，20 岁当军长，21 岁当军团长，22 岁牺牲，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将领；邹容 18 岁发表《革命军》，20 岁去世。邹容创作的《革命军》感动了中国近代舞台上两个重要人物：第一个是毛泽东，他看完《革命军》的感受就四个字：“夜不能寐”；第二个是蒋介石，他看完《革命军》的感受也是这四个字：“夜不能寐”。

那就是一个年纪轻轻干大事、年纪轻轻丢性命的时代。这一批中国共产党人踏上舞台，一无资源，二无名望，三无地位。能救国救民凭什么？1921 年中共在上海成立。但当年谁看好这个党？包括中国革命、共产主义在内，一开始都不被看好，共产党人绝对不是幸运儿。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建党的两位中坚人物：南面的陈独秀，北面的李大钊，却谁都没去。为什么？陈独秀在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长，当时正在筹款，他要盯住贷款人不能去；李大钊因为北洋军阀政府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正在组织八所高校成立“联合索薪

委员会”，他因忙于追讨工资，也没时间到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近代上的伟大事件，中华民族的命运将因此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位发起人却错过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1983年，国防大学一个党史教授采访了当年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刘仁静那时仅19岁，而1983年的他已经80多岁，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在世的。

当被问起参加中共“一大”的感受时，他非常实在地说了一句：“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他还说：“李大钊不去，北京小组空出了一个名额。但空出的这个名额也轮不到我，他们首先问了资深同志邓中夏，邓中夏不去，他要到南京去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然后又问了党内另外一个同志罗章龙，罗章龙也不去，他要开工人座谈会。”

当年大家手头的事都很忙：陈独秀要盯住贷款，李大钊要追讨工资，邓中夏要参加少年学会的会议，罗章龙要开工人座谈会。在他们看来，哪件事都比中共“一大”重要。刘仁静在回忆录里写到：“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头上。”

刘仁静虽然后来被党开除，但却流芳百世，因为在任何时候介绍中共一大时，刘仁静都赫赫在目，而且位置居中。

从中共“一大”能看出中共的宿命，它是一个好运团体。但当年没有几个人看好这个在凄风苦雨中成立的党。别说外界，即使是党的发起人，也是走的走，散的散。

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13个代表，半数以上出了问题，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汉奸，抗战胜利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张国焘最后在国民党军统戴笠手下当特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命运？

我曾设想，如果历史是可知的，如果他们当年就知道自己亲手创立的这个党，28年以后要夺取全国政权，他们还会不会这么做？如同打牌一样，知道了底牌会这么出牌吗？不会的。

当然，参加共产党是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们可以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香港、海外都安全，在那里藏 28 年，等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再回来，他们不都成了建党元勋吗？各种待遇都不会少。但是，谁能想到自己发起成立的这个党，以后会取得这么大的功绩？打个比方，就好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你以为一钱不值，转身把彩票撕了。但等到开奖那天，发现中了大奖。到纸篓去找时，却发现被自己撕得粉碎，连兑奖号都对不齐了。这个比喻虽然俗气却很易懂。

中共“一大”总计 13 名代表，除了出问题的还有多名牺牲的。王尽美 1925 年牺牲，邓恩铭 1931 年牺牲，何叔衡 1935 年牺牲，陈潭秋 1943 年牺牲。13 个人中，从一而终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们在中共“一大”一直都是最不起眼的。毛泽东是书记员，开会时负责做记录。董必武，大家都认为他年龄大，但是他们走到了最后。而聪明的、才华横溢的、看起来前途无量的却都夭折了。这就是历史的淘汰，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站起来的。

今天，在某些海外的微博、微信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中共胜利靠的是投机取巧”“耍心眼搞阴谋诡计”。那请你也耍个心眼，胜利一次让我们看看。

仅仅从中共“一大”13 个代表各自的归宿就能看出，共产党何其艰难！在它前面没有红地毯，没有夹道欢迎，没有鲜花鼓掌，有的是不尽的流血牺牲和叛卖，万水千山的阻隔，而中国共产党却从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甚至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格局。

“毛泽东居功至伟”。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党员中，没有一个人的功劳能超过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个人，可能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相连，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打败这个军队，颠覆这个国家，不然你抹不掉他。”

毛泽东是党的上一位领导指定接班的吗？不是。他是共产国际看好的吗？也不是。恰恰相反，他长期处于中共中央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历经了14年，这期间经历了多少位领导者？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苏俄革命的基本经验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被撞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搞山头的结果，也不是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因为14年的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人。

1981年，我们党的决议，全面总结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其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

第二，群众路线。

第三，独立自主。

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等前仆后继，都在探索一条能让中国摆脱危亡，寻求复兴的道路。但这些变革者有一个共同点，几乎都力图依托少数精英来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都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所以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进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与革命一败再败。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从统治的精英层到文化界，都对民众充满了蔑视。鲁迅的《阿Q正传》和台湾人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都将中国人落后、丑陋的国民性的一面分析得淋漓尽致，诸如明哲保身，忍气吞声，为了一己之利苟活于世。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可以在活命的前提下变得无足轻重。我们所谓的精英层、知识层，对民众就是如此轻视，而毛泽东则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从中国民众中发掘出极其强大潜力和动力的领导者。统治者对民众从来都只会极尽蔑视，认为民众是羔羊，民众是奴

隶，民众是群氓。而毛泽东则认为他们是动力，他们是火山，他们是岩浆，他们是推动变革的力量。毛泽东讲：“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完全不同的是蒋介石。

抗战开始，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宣言：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抗战。

但开完会，胡适就问蒋介石：“委员长，抗战我们能顶多长时间？”蒋介石说：“只能顶6个月。”蒋介石的依据是什么？国民党兵工署给蒋介石报告，称炮弹枪械加在一起只能支撑18个师打3个月。蒋介石硬着头皮说打6个月，仅此胆数和算计。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仅仅靠枪炮弹是不行的。”掷地有声，被广泛引用。毛泽东的另一句话说得更好，但很少被引用：“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无组织状态。”点到了中国至弱之源。所以，共产党在中国近代，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把民众组织起来。而国民党的组织永远只限于城市，城市中永远只限于上层。共产党从基层开始，从村落开始，从社会单元开始，从家庭开始。

共产党的制胜之源是什么？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当时，有这样一句话：“直到列强不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来看待时，中国人才真正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

梁启超讲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

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

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

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

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

一定要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的基础是民众的万众一心，而不是民众的一盘散沙。

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启发了封建官僚士大夫中少数精英的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层觉醒；1937年全民抗战使全民觉醒。那一刻我们才真正认识到，日本人到中国来不是仅仅和统治者打仗，而是来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这激起了全民奋起。

1949年建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中国人第一次建立一个持续的、稳定的、繁荣的，既能解决民族救亡，也能解决民族复兴的现代民族国家。

这不仅仅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问题。国民党1912年1月建立的中华民国，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中华民国问题在哪里？不可持续，不繁荣，不稳定，既不能解决民族救亡，也不能解决民族复兴，因此38年就衰亡了。

国家制造战争，战争也制造国家

正如英国现代国家学说奠基者霍布斯所言：“当人人难以自我保存时，人们便自觉自愿地放弃权力，开始缔约，指定一个人或由多人组成的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大家都将自己的意志服从于这个集体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集体的判断，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实现了联合，这就是国家。国家不是慈善组织，不是人权机构，国家一定要形成集体意志、集体判断。国家让人民自觉自愿地放弃部分权利开始缔约，形成集体意志、集体判断。”

同样，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这已经被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所证明。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美国发动侵朝战争。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准备大举北进。麦克阿瑟明明知道中国30万东北边防军已经完成了部队的编组集结，但他根本无所谓。美国总统杜鲁门专程飞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商：“如果中国出兵怎么办？”麦克阿瑟说：“中国人不会出兵，中国历史上一场仗都没打胜，什么兵啊？他们把兵力放在这儿吓唬我们。”杜鲁门放心地回去了。

中国人爱寻找替罪羊，美国人也如此，他们把朝鲜战争发生的所有问题，都栽到了麦克阿瑟头上，说他没有判断出中国人要出兵。后来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记述：“不光是我，杜鲁门也没有判断出中国会出兵。”不光是麦克阿瑟的远东情报局，包括中央情报局也判断中国不会出兵。

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发出警告：“美军过线，中国绝不会置之不理。”对方置若罔闻，不作任何回答。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让潘尼迦把消息传到英国，再传到美国。因为当时中国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只好通过这个办法通告美国：“韩军过线不管，美军过线我们要管。”潘尼迦深知事关重大，迅速把消息转达过去。

周恩来为什么10月3日凌晨2点多约见潘尼迦？因为10月2日晚上政治局做出了出兵决定。中国本不想和美国人打这场仗，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军队长期作战，亟待休整，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彭德怀说：“当时，我们在朝鲜半岛一军打三军，我们只有陆军，对方却有陆海空。”

消息传到了美国。

10月3日下午，美国国务院非正式回复：“周恩来的讲话缺乏法律和道义根据。”依然不予理会。

10月4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回复：“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

到了10月7日，不是麦克阿瑟而是杜鲁门下令，美军越过“三八线”直赴平壤。

10月8日，毛泽东下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疾向朝鲜境内出动，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迎头相撞。

后来，我们跟美国人反复讲这个例子：“1950年我们不想跟你打，我

们一次次警告，你们逼我们打，一点儿退路没有。”美国人却狡辩：“你们传递信息不准确，你应该明确地说，过‘三八线’我就出兵，那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不过线了。”美国人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人承认，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显示出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之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可怕的对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实事求是地讲，1949年新中国成立，如果仅仅是内战打败了国民党，还不足以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这个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因为那是内战的胜利，而我们当时急需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尽管我们不想打，但却不期而遇了，所以我们没有退缩，迎上去了，并且获得了胜利。

当年京都大学的一位日本教授曾讲：“1949年你们的毛泽东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周围一个相信的都没有，看看你们那个糟糕透顶的历史。1950年你们竟然对美国出兵，而且不但出兵，还把美国人从北部压到了南部去，我这才觉得中国人跟过去真的不一样了。”

在中国军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的时候，李光耀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本科。他讲，平时穿过海关时，西欧海关官员看他是华人面孔，都不屑一顾——华人，劣等人种。但是，当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他再过西欧海关时，那些海关官员对他无不肃然起敬。华人正在跟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打仗，华人正逼得联合国军步步后退。

1900年，八国联军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赔款4.5亿两白银；1950年，联合国军被我们打退，而且是在境外的朝鲜半岛。中国的全球化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从此，我们进入了世界体系。

以前，中国人都缩在屋子里被别人打。中日战争不是在边境，甚至不是在长城爆发，而是在国境内的卢沟桥爆发。日军长驱直入扼住了我们的咽喉，直到北京南面宛平城，我们才跟日军作战。这就是旧中国的历史。

而新中国则以直接出境作战作为重大开场，这不仅对中华民族自身是一次精神洗礼，而且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在全世界华人心目中获得了

合理性、合法性地位。

李光耀说：“从此下决心学华语。”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成为李光耀学华语的动因，这是怎样一种逻辑关系？今天，国内有些人否定当年跨过鸭绿江之举，甚至声称，“如果不过去，中国早跟美国人改革了，开放了”，这简直是一派胡言。甘愿做美国的小喽啰，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人的精神，打出了中国人的气质！

1997年，我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那是第一次有中国军官进入美国国防大学，每天晚上在空军基地吃饭的全是美国军官——陆军、海军、空军。突然来了两个中国军官，他们非常好奇，一定要和我们聊天、合影。刚开始我们以为美国军官好客，后来才明白这是因为美军曾和中国军队打过仗吃过亏，他们不了解，觉得很神秘。

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参观西点军校，为什么是胡伯中校陪同？他是1978年西点军校毕业生。我们在西点军校的纪念馆里看见了上甘岭两个高地的模型：597.9高地和537.7高地。胡伯中校对我说：“你们山头上就2个连守卫，我们7个营轮番进攻却攻不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7个营夺占不了2个连的阵地。”

教官没有解释清楚，我们学员会讨论，直到最后也没有讨论明白。回国之后，我们把“上甘岭战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那次战役极其艰苦，美军调动了地面炮火、航空火力，但正面全部被摧毁。志愿军在反面、斜面挖道，美军炮火一停，我军便从坑道出来打击冲锋的人，进行拉锯式作战。

坑道给养非常困难，开始送进坑道一些萝卜，发现吃了萝卜烧心。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后来当了国防部部长），把自己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在平壤买了2万多个苹果。志愿军十五军党委做出决定，谁送进坑道一篓苹果，立二等功一次。直到上甘岭战斗打完，只有一个苹果被送了进去，送果员全部牺牲，因为美军火力封锁非常严密。

电影《上甘岭》中有这样的场景：指挥员、战斗员、伤员把一个苹果传过去，每人只啃一小口。1957年，这部电影公映之前在内部放映。上甘岭战役的指挥者、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看到一半时，泪流满面，再也看不

下去，走了。

当年，我们在美国学习的时候，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每一分尊重都体现了我们前辈的浴血奋战，现在的我们正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之上。

美国的亚历山大·温特讲：“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不是个人自尊，是集体自尊，没有集体自尊也就丢掉了—个国家的利益。”

中国以前最缺的就是集体自尊，所以一盘散沙。而今天，谁给我们带来集体自尊？是那些浴血奋战的前辈。从毛泽东同志开始，那一批批为中华民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人。

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不但是中国人民的决心，而且是我们的行动。

孙中山讲：“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一个人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哪里会有凝聚力，就会再现—盘散沙。”

邓小平同志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这些人之所以被历史铭记，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民族情怀。

今天的中国出现了什么情况？比如香港，这么多人打着前殖民地的旗帜四处游行，在全世界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哪有还打着前殖民旗帜游行的？印度、巴基斯坦、南非、阿根廷、韩国都没有，却在中国出现了。旗帜上竟然写着“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焚烧五星红旗。

2014年所谓“占中”，特区政府门口、香港特首办公室门口都贴着“庆祝鸦片战争胜利170周年”的标语。香港中文大学的两个学生竟然在英国下议院做证，要求英国重启《南京条约》及《天津条约》。而英国下议院议员却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回应。英国人今天不能提《南京条约》，也不能提《天津条约》，因为今天全世界都有贩毒，被抓住的都会处以重刑。而100多年前，英国人还以国家军队支撑贩毒，多么丢人！英国人根本不

敢提，而香港学生们却提出如此荒唐的提议。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提出英方有责任保障香港自由的生活方式，但事实有目共睹，完全是大陆在保障香港的自由生活方式，而非英国人。

我在香港讲学时，曾举过这样的例子：1898年到1899年，香港鼠疫蔓延，死了4到6万人，却都是中国人，英国人一个没死。为什么？英国人住在太平山上，而中国人只能住山下，山下阴暗潮湿，鼠疫猖獗。后来由香港行政局和香港的总督特批了一个中国人住山上，他叫何东，他的父亲是荷兰人，所以他是个混血。英国人只让这个混血住在山上，就算是一个中国人住山上了。当年中国人就是这种待遇。

而香港两位所谓的立法议员：梁颂恒、游蕙祯。在立法会宣誓的时候，他们直接喊出“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用非常肮脏的语言辱骂中国。在香港时我就讲，哪一个国家的议会宣誓，用别的国家语言？美国可以用中文宣誓吗？俄罗斯可以用法文宣誓吗？法国可以拿英文宣誓吗？绝对不行！香港立法会竟然拿英文宣誓，用英文辱骂中国。

“港独”发展到这种地步，连彭定康都看不下去了。彭定康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他离任的时候，一位中央领导者甚至讲“彭定康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埋下了很多钉子。结果连彭定康都说：“宣誓是非常严肃的事，把它变成学生玩的游戏是不对的，其中的危险在于，‘港独’注定要引发中国方面的反弹，是适得其反的要求。我有个最强烈的建议，他们应该退回来，谈论政治治理和民主问题，避免谈论任何关于独立的事，独立是不可能的。”彭定康不是在帮大陆说话，他的意思通俗来说就是在发出警告：你们这帮家伙胡整，整到最后你们满盘皆输。

我们今天谈到香港问题，只记住邓小平同志讲过一句话：“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而邓小平同志还讲过另一句话：“香港问题，先拿过来再说。”邓小平同志1997年2月份去世，1997年7月香港回归，一切原封不动到今天，我们就没再说了，必须改造它！

香港回归20周年，政治生态却恶化于1997回归时。为什么？一味追

求稳定就难以稳定了，必须要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必须在香港进行区域殖民化时，才能真正扎住根基。必须在香港修改教材，从小学生开始，学习国体、国徽、国旗、国歌。

示威游行的人说“这叫洗脑”，坚决不让用。因为反对的范围很大，特首梁振英同意了，这套教材是否使用，各学校自行裁定。哪一个国家不进行这样的教育？如果这种教育是洗脑的话，任何国家都要洗。必须明确的是，国家公民连国徽、国旗、国体、宪法都不知道，叫什么公民！彭定康为什么着急？因为有过惨痛教训，美国的惨痛教训。

1861年美国议会解体，就是通过民主表决，2/3的人要求独立。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宣布退出联邦的州。

1860年林肯通过竞选，当选总统。他要解放南方黑奴，南部各州都不同意；1860年12月南卡州宣布独立，公民投票，议会表决，以2/3的多数宣布独立；1861年1月份又有5个州——佐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宣布独立；1861年5月份又有5个州——得克萨斯、阿肯色、田纳西、北卡、弗吉尼亚。一瞬间，美国南部十几个州，1/4的领土，1/3的人口发生分裂，这期间出现了两个美国：北部USA，南部CSA。如果今天是两个美国，世界多么平安。

但今天只有一个美国，为什么？林肯总统发动了南北战争，USA灭掉了CSA，代价是什么呢？南北战争62万人死亡，代价巨大，超过了美军“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的总和：死亡58万人。所以“南北战争”之后，所有美国公民的誓词是：“我站在美国国旗前，面对代表美国国旗的美利坚合众国庄严宣誓——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翻译成中文就是：上帝之下的一个美国永不分裂。

我们没有公民誓词。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斯讲：“自1865年以来，任何一个政党、阶级或者阶层对分裂国家的可能性与可取性再也无人考虑了，没人敢考虑了。”今天的香港人在玩火，台湾人也想玩火，但玩火者必自焚！这是一个国家利益的体现。

世界大多数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制造战争，而战争也制造国家，中国也概莫能外。

小成功需要朋友，大成功需要敌人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一直在与西方文明抗争。林则徐、洪秀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前仆后继，中华文明一直都在与西方文明进行抗争。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华文明终于在政治上摆脱了颓势，我们有了自己的政治体制。出兵朝鲜，介入越战，中华文明在军事上摆脱了败势。改革开放使中华文明在经济上扭转了劣势。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绝不仅仅是一个党派的胜利，一种意识形态的胜利，而是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

习近平同志讲，我们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来源是：

第一，传统文化。

第二，1840 年以来的革命文化。

第三，1949 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化。

我们得到的精神支撑是中华文明的复兴！

举一个小例子，百度领导者李彦宏，在招聘员工时，有自己定的一套标准和榜样：

第一个榜样是鲁迅，他写下这样一句话：是翻译，还是用创作寻找中国的意义？

第二个榜样是钱学森，他配了这样一句话：是在海外住别墅，还是回国做导弹之父？

第三个榜样是毛泽东，他配的一句话：是投降，还是比敌人更强？

一个民营企业家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认识？这就是翻天覆地的中国革命给中国人精神上带来巨大洗礼的结果。

当今世界，主角注定是这两个国家：第一，美国；第二，中国。

当今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10 万亿美元的只有两个国家：第一，美国，17 万亿；第二，中国，10.5 万亿。

当今世界，国防投入超过 1000 亿美元的也只有两个国家：第一，美国，5900 亿；第二，中国，1500 亿。

当今世界，卫星数量超过 140 颗的只有两个国家：第一，美国，530 颗，数量不断地减少；第二，中国，170 颗，数量不断地增加。

2016 年中国进行了 24 次卫星发射，使中国成为 2016 年全世界卫星发射最多的国家。两个国家国土面积相似，在没有统计水面面积时，原来中国的国土面积比美国大。但美国将它与加拿大相邻的五大湖的湖面面积计入后，现在美国的国土面积比中国大。当然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多，美国 3.2 亿，中国 13.6 亿。武装部队人数，美国 140 万，中国 200 万。这些注定了中国和美国必将成为世界的两个主角。

中国想与美国双赢，但美国却只想单赢。美国人说，当今世界什么金砖五国？那是英国人造出来的伪理论。美国人回头一看，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这四个国家与美国差距越拉越大，只有中国在紧紧追赶，并且距离越来越近。我们说自己只是韬光养晦，只在后面跑，但美国相信吗？它认为中国离它越来越近了，它能不全力以赴对付我们吗？

有一句话这样讲：“小成功需要朋友，大成功需要敌人。”对于个人来说，做点小买卖，找几个朋友，拉个市场，弄点资源，朋友帮帮忙就可以成功了。对于国家来说，有美国这样一个对手整天给我们找碴、挑毛病，应该是非常大的好事。因为我们太容易懈怠和满足了，兜里有几个钱，甚至东西南北都分不大清了，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朋友”整天给我们敲边鼓、鸣警钟，使我们不懈怠，使我们奋起，使我们继续前进。

去年我访问美国时，驻美的国防武官曾问我一句话：“金教授，你多次来美国，能不能用特别简练的语言讲一讲你的感受？”我跟他讲了一句话：“一个衰老的帝国。”他说：“你讲得太对了！”我说：“这是我

的切身感受。”

1997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学习，飞机在肯尼迪机场降落，当时的情景惊得我目瞪口呆。美国人晚上不关灯，纽约城市面积非常大，一片灯火的海洋。2016年已经是我第八次到美国。那次飞机同样在肯尼迪机场着陆，但此时跑道开裂，荒草丛生，在从肯尼迪机场向纽约曼哈顿开进的道路上，高速公路中心的隔离带有的被撞断了，有的被撞弯了，都撂在那儿没人管。到了纽约，柏油路高低不平，颠得特别厉害。别人告诉我，纽约的SUV车之所以特别多，是因为路况太差，铁桥锈迹斑斑往下流水。

我们与基辛格会谈、与美国全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谈的时候，都会问他们：“美国市政怎么到这步了？”美国人说：“打了多年仗，没钱了。”此时，大家就不难理解川普为什么会发火了，因为美国在打仗的时候，中国人正在搞建设，他着急呀！

1900年，中国一盘散沙。1950年以后，中国却被世界称为“全世界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现在，经济总量很快就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我认为有四句话可以共勉：

（1）美国人亨利·基辛格讲：大国塑造本国安全环境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力的日渐增强，二是旧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

（2）英国人哈米什·麦克雷特讲：中国越是不团结，世界就越感到高兴。

（3）俄罗斯总统普京讲：国家越强大，个人越自由。

（4）习近平讲：对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不然谁愿意为国家和人民牺牲呢？



强劲发展，倚重创新推进

创造，基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毛泽东关于军事和政治的定义，并不符合教科书和理论推演，恰恰又是军事和政治的核心。

创新往往源于挫折，源于“置之死地而后生”。

什么是创新？创新绝不仅仅是一种现象，对国家来说，创新是一种战略能力。在僵化的时代，创新是推动变革的火种；在变革的时代，创新是获取优势的本源。

现在，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象征。尤其在当代，信息革命横向上引发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变革；纵向上引发以计算机、量子物理和生命科学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变革。纵横两个方向的变革汇聚在一起，开启了一个由科学技术变革引发人类组织变革，甚至是人类自身变革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通过创新获得优势就变得特别突出和重要。在历史上，创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如此高的战略地位。

创新是民族发展的能力

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创新是民族发展的能力。这绝不是理论推演，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美国。当我们把美国作为如英国那样传统的帝国主义来对待的时候，会发现美国是一个与以前所有帝国主义形态不一样的帝国主义，是一种“创新形态”的帝国主义。

比如说，在对待殖民地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主动让殖民地获得独立，而美国却让菲律宾取得独立。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把菲律宾夺过来，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当菲律宾公民投票要求独立的时候，美国允许了，让它独立。这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英国、法国、日本、德国，还是比利时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做法。1840年以来，中国多次割地赔款，除了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我们赔的款再返还我们。1908年，美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在北京办协和医院，办留美预备学校（今天的清华大学的前身）。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提案，免去赔款中的未支付部分。按照“庚子赔款”协定，美国应得的部分将近3000万两白银，要到1940年才能还清。1908年，美国把前面赔的那部分钱退还给中国很大一部分。1924年国会通过决议，剩余部分全免，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里美国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与日本的“三光政策”大不一样。

1907年，当时美国伊利诺大学的校长詹姆士给总统写了一封信，提出把钱还给中国，在中国办教育、办医疗。他说：“哪一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年轻的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影响上取得最大的收获。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的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有效。”

这不是美国的创新色彩吗？这不是美国的高人一筹之处吗？

当中国人“四大发明”不离口的时候，美国人几乎从不强调他们对世界有几大发明，其实美国人的发明相当多。

从科技创新开始，电灯、电话、电报、电脑、网络、空间技术，都是美国人的发明。如果今天的世界，没有电灯、电话、电脑、网络，将会是什么样子？

再如军事创新，空地一体、航空作战、太空作战、信息作战；文化创新，好莱坞变成全世界的文化大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天24小时全是新闻，在它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电视台敢于这样尝试。1986年，CNN在美国亚特兰大开播，主持人就讲：“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向大家播音，直到地球的末日。”多大的口气啊！还有美国的餐饮创新，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优势。

美国人每年都能获得诺贝尔奖，甚至不止一次包揽“三大科学”奖。如2006年，美国包揽了物理、化学和医学三项科学大奖。因此，美国对全球的影响，绝不仅仅表现为航母编队在全球游弋，而是体现在方方面面。

这就是创新给美国带来的力量。

变革的时代，创新成为人类前进的主要动力和核心内容。而创新活动的经常化和战略化导致事物的稳定性下降，有效周期缩短，使欠缺这一能力的国家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挑战。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击败，克劳塞维茨认为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他把普鲁士军队的失败归结为三点：一是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二是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三是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当一场大的变革到来，拿破仑的作战方式对欧洲产生巨大冲击的时候，普鲁士吃了大亏。克劳塞维茨认为，普鲁士吃亏的原因是守旧，不思创新。

34年之后，类似的灾难轮到了中国。1840年，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蒋廷黻，也试图总结鸦片战争的失败。他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不明了失败的理由，不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至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蒋廷黻认为，同治、光绪时代的“洋务运动”如果能提早20年发生在道光、咸丰年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改变面目。他讲得不全对，但讲出了一部分道理。

我们并不认为变革提早发生，中国就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吃亏可能会少一些。为什么没有提前20年发生变革？蒋廷黻认为：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仅仅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大灾难归结到这里是不够的。近代以来，从清朝的努尔哈赤到宣统，大清王朝12任皇帝由盛及衰的转换为什么这么快？康乾盛世的时候，中国社会各方面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达到极致，经济总

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至英国长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逆差。

17~18世纪，中国封建统治制度达到最辉煌和最完备的顶点，但从“康雍乾”盛世到“道咸同光”衰世，转换极快，中间只隔了一个嘉庆。我们很难用“王朝内部腐朽，前一代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后一代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然后一步一步削弱，最后崩溃”这样的一般道理来解释清王朝的情况。

近代以来，中国因为不改变原有的制度、机制，一味守摊子，吃了很大的亏。清政府所面临的，用李鸿章的话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过去匈奴、蒙古族是从北方入侵，不是从海上打来的，从来没有领教过船坚炮利。在世界性大变局面前，我们固守不变，落后就成了必然。

中国的兵制从来没有像近代更换得这样频繁：从八旗到绿营，从绿营到湘淮军，从湘淮军到小站新军。但没有一次是战前转制，都是因为时机错过，战败转制，仍然无法避免下一场失败。蒋廷黻讲，如果能在道光、咸丰年间开始洋务运动，那么，东方的灾难或许能避免。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在危机之前有所行动就好了，但我们近代全部是被动的。

1848年，马克思评论中国：“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60年以后，大清王朝崩溃。一个庞大的帝国，终于在这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了。这里有一个很深刻的教训：近代以来，任何一个摊子，任何一个团体，仅仅靠守是守不住的。

创新，基于对本质的认识

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是守来的，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

靠创新得来的。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毛泽东曾讲过两句话：“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我们按照苏联指导的那套办法，搞城市武装暴动，最后夺取政权，这条道路没有走通，失败了。没有掌握武装的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残酷地屠杀。怎么办？毛泽东当时也不知道。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思想已经转变。他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一种巨大的创造。

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建立广大的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走过的成功道路。而这条道路既不是共产国际给我们开创的，也不是列宁、斯大林给我们指出的。所以，后来当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走这条路的时候，斯大林曾经称中国共产党是“人造黄油”，是假的。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经典理论去行事。

后来中国革命成功了，1949 年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是两位大国领袖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而斯大林的第一句话则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成功的事实面前，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承认这个创造开辟了一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全新道路。

中国革命的成功，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同志说，“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绝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有一个例子流传很广，是胡耀邦曾经的亲身经历。20 世纪 60 年代，有一次胡耀邦陪毛泽东主席出差，主席问胡耀邦：“什么是军事？”这猛

的一问让胡耀邦有点儿反应不过来。他答道：“军事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毛泽东说：“不对。”胡耀邦反问：“主席，那你说什么是军事？”主席讲：“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当时毛泽东主席谈兴甚高，又问胡耀邦：“什么叫政治？”胡耀邦这回非常谨慎地说：“政治就是经济的最高表现形式。”他知道，这个回答主席肯定不满意，接着他问：“主席，您说什么是政治啊？”毛泽东讲：“什么叫政治啊，政治就是‘把拥护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的人搞得少少的’。”

毛泽东有关军事和政治的定义，都不符合我们的教科书和理论推演，但它恰恰又是军事和政治的核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

什么叫创造？它绝不是仅仅改换个包装，而是如何认识本质。毛泽东如何认识事物的本质？如何认识中国军事的本质？如何认识政治的本质？这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示。毛泽东创造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改变了古往今来世界军事体系的胜败标准。

1969年，基辛格总结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误时说：“我们进行一场军事战争，而我们的对手打政治仗。我们追求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而对手则从心理上拖垮我们。我们忘记了游击战的格言：‘游击队不被消灭，即是胜利；正规军不能全胜，就是失败。’”后来在伊拉克，这个道理再次被印证。

从中国的孙子，到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到美国的马汉，到法国的拿破仑，到瑞士的约米尼，到俄罗斯的苏沃洛夫，没有哪个军事家想出过这样的作战方法。这种巨大的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军事的重大贡献。

美国人所谓的“另一场军事革命”，就是毛泽东、格瓦拉的军事革命。人们普遍把军事革命的标准放在技术层面时，毛泽东、格瓦拉的军事革命已经颠覆了世界军事胜败的标准。可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体制，也对社会主义中国产生了巨大贡献。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讲过：“社会主义的弊病在

哪里呢？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贫困，它只不过能使贫困普遍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解决不了穷富问题，大家平均，都是穷人，没有富人。这叫社会主义吗？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走的路线，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交叉并行，最终使国家的经济结构、就业形式、社会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出现了极大的变动与革新。

邓小平在搞改革的时候，有人曾提出“搞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样的疑问，一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大家才认识到，真正挽救了社会主义的是邓小平。如果中国不搞改革开放，不解决贫困问题，那么，我们很难挡住那个年代的大潮。就是这种极富创新意识的变革，最终挽救了社会主义。

没有创新，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没有创新，也没有中国建设的成功。这就是我们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没有创新就没有新中国，新中国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

支撑创新思维的主体——大脑

创新思维表现为一种思维的创造力，它具有特定的指向，是敏锐发现问题及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它绝不是到处发散的，而是非常集中的。所以，创新思维有特有性、针对性、创造性和实践性。

20世纪初，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只运用了其潜能的10%”，并称该观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稍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不是10%，而是6%”；心理学家奥托随后估计“一个人一生所发挥出来的潜力只占其全部能力的4%”。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大脑，大部分能力没有被开发出来，非常宝贵的资源处在闲置状态。而创新，就是把人脑资源最大限度地重新开发，加以利用。

近代中国教育家陶行知讲：“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现在，我们天天讲石油枯竭、淡水短缺，很多资源不可再生，但最大的资源却没有被很好地开发利用，那就是人脑，它是支撑创新思维的主体和要素。

信息素质

人的素质中，很重要的一项是信息素质。信息素质表现为对信息的搜集、识别、筛选、利用和再创造能力。当然，不同的信息时代，信息素质表现出不同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温元凯说：“现代人能力的差别在于信息吞吐量的差别。”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人与人能力的差别在于信息鉴别能力、信息筛选能力的差别。

过去信息不足，因为缺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手段，没有网络，没有卫视。现在这些东西都有了，但问题是信息量太大，真的假的混在一起，大部分信息互相抵消。所谓信息素质，就是能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筛选出对你有用的信息。

专业素质

专业素质指从事专项活动的能力，包括专业知识存量、专业技术资源、专业组织类型等。专业素质划定了创新思维的区域界限，限定了创新思维活动的可能性边界。

任何有效的创新思维，必须是厚积薄发的产物，是长期思索、长期实践、长期积累的产物，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专业知识是创新的基础，你能够在你的专业领域进行多深的开掘，这是由专业素质决定的。

融会贯通能力

融会贯通能力，即在日益复杂多样的学科领域，实现专业序列化向知

识平行化转变的能力，从而通过边缘结合，获得多专业学科领域的知识融合能力。

平时我们都是按各个学科的序列分为：理科、工科。理工科内部又分出了很多具体门类。

分工是工业社会的特点，如武装力量的军种兵种从“区分”到“独立”（Separation-Independence）。而融合是信息社会的特点，各军兵种从“合作”到“联合”到“融合”（Cooperation-Integration-Interdependence）。融会贯通能力就是看你能不能完成知识的平行化，就是跨学科。

很多突破、发明和发现，都是在跨学科的边缘实现的。边缘是最容易突破的，就跟作战一样，两支部队的结合部是最容易穿过去的，两个学科的结合部也最容易实现创新。但是这要求你必须对两个学科有所了解，必须完成一定程度的知识的平行化。

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从而实现边缘突破，是信息时代思维创新的特点。

对时间的掌控

对时间的掌控，即对时间进行有效的管理。

如何掌控自己的时间？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有四个因素造成时间浪费：第一，制度欠缺或远见欠缺；第二，人浮于事，相互纠缠；第三，会议太多；第四，信息失灵。

而把握时间的方法有五点：“第一，要知道自己支配的时间有限，把它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第二，把力量用在获取成果上，而不是用在工作本身；第三，把工作建立在发挥优势上，避开那些做不到的事；第四，集中精力于少数主要领域，否则将一事无成；第五，将决策建立在意见不一致而非看法统一的基础之上。”

正确的决策往往是争论的结果，错误的决策往往是压制的结果。领导者、管理者都要做决策，决策都喜欢一致通过。其实这里面隐含着非常大的问题。

三峡工程的领导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记者问：“你们认为，什么

人对你们三峡建设帮助最大？”三峡领导者回答：“反对建三峡的人对我们帮助最大。”关于三峡工程，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太多了，但是如果有人提出弊病，比如移民的问题、引起地震的问题、清除环境污染的问题等等，为了把他们反对的理由推倒，三峡建立者就不得不在这些问题上面花很大的精力。所以他们认为，反对者对三峡的帮助最大。他的回答令我印象至深。

当然一个领导者要有这种气质，你就能够知道时间是怎么节省的。决策建立在意见不一致而非看法统一的基础之上。

支撑创新思维的环境要素

创新思维不仅仅是一个主体问题，还有人所处的环境问题，它同样重要。

比如，欧洲中世纪，在教会控制的沉闷气氛下，黑暗的宗教统治时期，没有创新的需求牵引，所以世界长期沉寂。再如，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很长。当世界的另一边发生革命变化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牵引，于是大量人才被埋没了。整个社会形不成环境的需求牵引，同样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能不能有效保护创新思维。比如，欧洲的宗教裁判所，把布鲁诺活活烧死。因为布鲁诺说“世界不是以地球为中心，而是以太阳为中心”。他这个发现是对真理的发现，在欧洲就是一个创新。但是宗教裁判所判他死刑，把他烧死。

哥白尼因此吓得终生不敢提出他的“日心说”，直到死了才发表。为保证安全，他说：“我的东西死了之后再发表。”那样的环境就是对创新思维没有有效的保护。只有少数非常英勇的人才能做到创新，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中华民族也有很多习惯对创新是不利的。比如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就是不要出头，不要冒尖，随大溜最保险，不要标新立异。这些都不是创新文化，是守旧文化。这些东西对我们创新都是不利的。

再有，人际关系。一人有了成果，是大家跟他走上去呢，还是想办法把他拉下来？有没有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工作氛围？能否营造出团结和

谐的组织机制？能不能容忍创新型科技人才的个性特点？

抑制创新思维的枷锁

我们从反面来看抑制创新思维的客观要素。

首先是历史环境的限制。欧洲中世纪和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度，都造成了对创新的限制。

其次是社会环境的限制。创新是人类的本能，求稳也是人类的本能。社会群体对现实的认定、对习惯的遵循、对变化的抵制，同样在遏制思维创新。任何社会都一样。群体追求稳定，不喜欢太大的变化。所以，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讲：“社会从未打算欣然接受任何发明。”社会作为一个群体组织，对新思想的抵制程度，与这种思想的新颖程度、该思想对现状的影响程度以及对传统与习惯的背离程度成正比。

抵制可能来源于惰性，也可能来源于惯性。前者表现为思维的僵化，后者表现为思维的循规蹈矩。两者都是对事物失去了敏感性，反应迟钝，熟视无睹，发现不了问题，更谈不到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惰性与惯性十分容易相互转化，共同压制创新。打破惰性和惯性，本身就是一种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创造性思维首先表现出来的往往不是建设性，而是破坏性。

任何创新都是艰难的，都是经过艰难险阻，最后从荆棘里走过来的。就是要越过这种社会环境，要战胜这种社会环境对你的限制。

除了上述两项客观要素，抑制创新思维的主观要素（即精神枷锁，西方称为“Mental Lock”），包含以下几点。

一是习惯。

每天你有固定的时间睡觉、起床、穿衣、吃饭、上班、下班。这个规律就是习惯，而习惯很可能演变为惰性。

习惯导致不饥而食、不困而眠、不思而行、不禁而止。前三项容易理解。所谓“不禁而止”，是由长期习惯形成的。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倡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首先批掉“两个凡是”，作为改革的开始。

但是后来，若干“两个凡是”又出来了，凡是领导人讲过的，我们都不要动。当你的标准成了“领导的讲话，句句都是真理”的时候，这种习惯就是不禁而止。没有人禁你，但我们把自己禁住了，这就是精神的枷锁，就是创新的大敌。

我很喜欢一位藏族诗人的一句话：“成熟的年龄，多余的是成熟。”这句诗很富有哲理。什么是成熟？会察言观色，会见风转舵，知道自己的利害在哪里。这种成熟是创造性的极大损失。

石头成熟，变成了鹅卵石。但它很圆滑，没有支撑面，没有发力点，撑不住，所以一堆鹅卵石，堆起来又塌下来了。在铁路上做路基的石头，必须是见棱见角的，有支撑点、支撑面，互相能够依托，撑得住。当我们成熟以后，每个人都成了鹅卵石，一堆人就像堆起来的鹅卵石，谁也撑不住。

创新就需要不知利害，硬往前冲，破除我们自以为是的東西。

二是逻辑。

思维的惯性往往来自逻辑。逻辑是推理的规则，却不是思想成见解的根源。虽然不依据逻辑推理必然矛盾丛生，但仅靠逻辑推理的思考方法，却很容易抹杀预感和否定直觉。而预感和直觉恰恰是创新思维的源泉。

当一切都循规蹈矩、遵循逻辑的时候，创新的亮点就没有了。逻辑规则奉行无矛盾守则，只能剖析本质一致而无矛盾的事物，但人类生活中的多数事件均含糊不清，不一致性与矛盾性是社会的根本特征。过度强调逻辑规则，容易阻碍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感觉与探索。

法国数学家彭加勒说：“逻辑主要用于论证，直觉则主要用于发明。”

法国数学家笛卡儿说：“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之外，人类没有其他途径来得到确实性的知识。”

爱因斯坦说：“我相信直觉、灵感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

的源泉。”

今天，随着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有大量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

显性知识是规范的、系统的，隐性知识则不规范；显性知识有科学实证的基础，隐性知识则没有；显性知识明确稳定，隐性知识难以捉摸；显性知识可以通过编码、格式化、结构化来实现传播，隐性知识则很难实现这种传播。

我们现在传播的、学习的、考试的都是显性知识。那么隐性知识呢？隐性知识甚至不太被所有知识拥有者了解，它不易保存，不易传递，不易掌控，但它又是人类能力开发的非常重要的创造力源泉。

如果将显性知识看作冰山一角，那么隐性知识则是隐藏在冰山底下的十分之九。隐性知识是智力的基本，是给大树提供营养的树根，显性知识只不过是树上的果实。当你以为全凭显性知识就能完成创新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许多专业领域都有众多知而不能言的隐性知识。这些不仅仅是对客观信息进行简单的加工处理，更重要的是发掘头脑中潜在的想法、直觉、灵感和智慧，自我开掘。隐性知识就有这种违反逻辑的特性，它不能编码，很难传授，甚至很难用科学进行实证。这些都是用逻辑很难解释的。

三是权威。

权威的存在，也容易形成精神枷锁。

第一，封闭——既然有权威人士在思考，我们还想什么呢？不用想了。第二，权威的存在容易造成揣摩、迎合式思考，因为你会力图跟上权威的思考，而这些都将导致创造力的极度衰弱。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由于有着非常资深的从业背景，其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极大关注。有一次，秘书给他打印了一张报表，胡佛觉得报表的边缘留得太窄了，于是批示：“Watch the borders（注意边缘）。”本意是，提醒秘书将边距留宽一些。

然而此后两周，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在北部加强与加拿大的边

界，在南部加强到墨西哥的边界。因为他们把胡佛的批示“Watch the borders”，理解成了“注意边界”。

对权威的绝对崇拜会激发出多么荒谬的想象力，而这种荒谬的想象力对正常的思维将形成多么大的封闭！

四是挫折。

创造性思维十分依赖想象力，又极易受到挫折。一旦遇到挫折，思维的封闭首先表现为想象力的封闭。比如，你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某个小伙子有一个奇思妙想，你却嘲笑他、打击他。长此以往，他就什么奇思妙想也没有了，脑袋呆呆的、木木的。

因为一个人运用想象力的次数与运用后受到的处罚成反比。受到的处罚越多，他运用想象力的次数就会越少。

思想落后于实践，不是真正的创新

恩格斯讲：“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是变革。”恩格斯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在军事变革的历史中，往往是新的技术、新的兵器出现了，新的思想并没有出现。

一位哲人说：“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长青。”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往今来，《孙子兵法》几千年不变，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几百年不改，但是世界军事日新月异。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意大利航空局前副局长杜黑，1921年，他提出了“制空权”理论。这一理论提出后，很多人说杜黑像个巫师，预言了未来战争可怕的情景，但基本不可能实现。

杜黑在《制空权》里写道：

第一，将出现一种全新的战争样式——空中战争；第二，空中战

争将引起战争的革命；第三，军事行动从此不再被地形地貌阻隔，战争将要从空中开始。

大家极度嘲笑他，说他是精神病。杜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人，他的观点中会被人抓住把柄的小毛病比比皆是，所以他遭到了质疑，他解释起来很困难。

在全国博士生论坛大会上，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讲：“X射线发现的第一篇论文，在今天看来是漏洞百出，但它是重大的发现。”杜黑的理论也是这样，漏洞百出，但正是对杜黑理论数十年的争论，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和作战思想才会登上军事舞台。

思想落后于实践的情况，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军事创新思维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异想天开的产物，不是在实验室里理论推导的产物，它一定要跟军事实践结合，注重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如果说自然科学大量的实证可以在实验室里完成，军事科学则有很大一部分要在战场上才能得到检验。

在创新能力中，最明显、最直接、最突出的是发现问题的能力及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能不能发现问题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是创新的核心。创新要有的放矢，但“的”在哪里？靶在哪里？这是创新的两个关键环节。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对实践的了解，即知己知彼的问题。首先来看“知彼”。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爆发，都在我们的意料之外。海外有这样的评论：“善良的中国精英们，默然思之不得其解的是‘美国和西方列强怎么会如此行事呢？’。”

中国人讲慎战，“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地，不可不察也”。本该三思而后行的事，他们怎么说干就干呢？我们用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始终无法理解他们。

当你用你的思维方式去论证、估计别人的时候，认为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慎战。奈何别人的思想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初若没有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针对性的创新就很难了。

2003年，美国人布鲁赫对中国军事力量这样评论：“尽管中国的军事变革至少落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20年，但中国关于军事变革研究的理论文章总量却居世界第一。”当然，这不是在讽刺我们，布鲁赫的确觉得中国不可小觑。尽管军事变革落后，但理论很超前，所以值得警惕。

然而对我们来说，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我们的理论数量确实世界第一，但都束之高阁。很多理论根本没有想到甚至没有准备拿到实践中去应用，至多就是申报一个课题，评一些奖，大家把课题费分一分，然后束之高阁，明年再申报一个课题。不考虑实践应用，并不是真正的创新。

另外，创新还有一个“知己”的问题。关于怎么认识自己，我们可以拿三段战争时期的战争经验来总结：第一，解放战争时期；第二，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时期；第三，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时期。三个成序列的作战总结，大家的普遍感觉一个比一个差。

解放战争时期的总结最好，非常详细、非常客观。我们胜利了，新中国打出来了，战绩越辉煌的战区，总结越彻底，比如东北、华东。东北第四野战军的资料汇编中，对每个纵队的评价，每个作战师的评价，都记录得非常详细。但现在我们却做不到总结对自身怎么认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总结得也还可以，比解放战争差一些。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再差一些。为什么出现这种递减？因为认识自身是很难的。孙子讲“知己知彼”，知彼比较容易，对别人，尤其对敌人能够比较客观。但真正认识自己是最困难的。为什么老子讲“自胜者强”？战胜自己、认识自己很难。

真正推动军事变革的不是军事思想，而是军事技术。火药与安全发火装置将冷兵器时代推进到热兵器时代，蒸汽机与内燃机使人力作战变成机械化作战，计算机和信息处理技术又使战争演变为信息化作战。来福线的发明、螺旋桨推进器的发明、航空器的发明、核裂变与核聚变技术的掌握、太空技术的掌握、精确打击技术的掌握，这些都使世界军事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今天的创新，往往是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之上的创新。

为什么海外一系列战争，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我们没有料到，但伊拉克战争我们料到了呢？人们对伊拉克战争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是因为技术手段提升了。

脱离军事技术就是脱离军事实践。脱离技术的创新，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今天的军官，“懂技术的不懂指挥，懂指挥的不懂技术”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个现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指挥、技术分离的问题，它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有关。

“形而上者为学，形而下者为器”，这是古往今来的哲学思想。所谓“形而上者”就是无形的、看不见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学问。“形而下者”就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如兵器、技术。但如果这样解释就简单化了。要成为“学”，就要脱离“器”，真正的大学问家多是搞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的东西。

最终形成什么结果呢？就是搞理论的、搞研究的、搞战略的，连基本的兵器知识都没有。我们的军事学轻视技术、脱离技术的倾向很明显，搞战略的脱离了军事实践。今天，制约战法选择的不是军事谋略，而是军事技术；制约思维创新的，不是理论理解力，而是技术理解力！

当然，今天技术分门别类，纷繁复杂，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理解所有技术，但是你必须能够理解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变化和挑战，必须能够领悟技术进步的含义。例如精确制导，它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如果不理解技术的含义而去创新，那就是无的放矢。如果不获得技术理解力，未来的创新能力就要大大降低。

2000年，我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它完全是指技合一的。

首先，我们看“坦克中心”，英军的“挑战者”最新型坦克就在里面，最先进的陆军兵器也在里面，旁边是全球安全研讨中心、联合军种指挥与参谋学院；新材料中心，里面有各种备带材料在这里研制；航空发动机与空气动力中心，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的风洞，包括发动机实验的型号，

都在这里；火炮中心，有各型英军装备的火炮；地对空与地对地导弹中心也在这个位置。同时计算机中心、灾难救助中心与联合国发生联系。联合作战与条令新概念中心，还有它的校部——皇家军事科学院，以及作战模拟中心、防务管理中心，还有新型火药中心。

当时，我们正在防务管理中心上课，突然听到外面发出“轰”的一声巨响，以为哪里发生了爆炸，都吓了一跳。教授告诉我们，外面正在试用新型的火药。这就是指挥理念、战略理念和全球性事务与各种兵器完全结合在一起。

一位给我们介绍兵器的英军中校，能非常熟练地拆卸、安装巡航式地空导弹。当时我感到很惊讶，一个中校级的军官，对兵器拆卸如此熟练，这正是创新的基础。创新，由此不是无的放矢，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技术基础，会对中国的创新形成很大的制约。

英国人的理念跟中国人的理念不太一样。“Technology, Management, Strategy”（技术、管理、战略）三者合一，是英国的国防基础。他们非常强调技术，对技术的管理已经形成了战略。固然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但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借鉴。

在当今技术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大的环境下，忽略技术将使创新举步维艰。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创新动力

创新的出现有很大的被动性，并不是说每一次创新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之一，是危机。危机对惰性与麻木的冲击，危机对骄傲自大、自我感觉甚佳的震撼，危机对创造潜能的激发与调动等，无不起到推动作用。

创新思维，特别是军事创新思维，往往呈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美国人的军事创新是什么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机械化作战，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海战，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岛屿作战，从越南人那里学到了特种作战。美国人模仿能力很强，全是学别

人的。他们自认为，对世界唯一的贡献就是数字化部队信息化作战。

真正逼使美国人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是越战的空前失败。詹姆斯·邓尼根和雷蒙德·马赛多尼亚在《美军大改革：从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一书中说：

越战经历和 C3I 系统（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使美军同过去的军事传统彻底决裂。此后高速发展的信息处理技术，加快了美军的战法改革，信息化作战最终使美军在世界军事中独树一帜。

创新往往源于挫折，大挫折往往造就大变革。创新借助于危机推动，创新思维，特别是军事创新思维，常带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性质。

朝鲜战争后期，美国人的创新曾让中国吃了大亏。

麦克阿瑟认为，在朝鲜半岛如果不使用原子弹就得后撤，当时美军的计划是准备从半岛撤往日本部署。麦克阿瑟被撤职后，李奇微出任美第 8 军司令，这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稳住了美军的战线，迅捷向北推进，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毛泽东当时要求“把美国人赶到大海里去”，志愿军获得胜利，突破“三八线”占领了汉城。麦克阿瑟即将被解职，李奇微就是在美军最灰暗的时候上任的。

1951 年 1 月的一个晚上，李奇微在看战斗简报时，发现了三个相同的数据：1950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2 日，大规模伏击战斗，历时 8 天；1950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 日，猛烈攻击美军部队，历时 8 天；1950 年 12 月 31 日至 1951 年 1 月 8 日，攻克汉城，止于“三七线”，历时 8 天。

李奇微抓到了志愿军作战的规律，把它称为“礼拜攻势”。

李奇微又进一步研究、调查，发现志愿军装备落后，后勤保障能力差，随身携带的粮弹，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进攻。李奇微正是掌握了这个特点，最后才使我们陷入了很大的被动。

李奇微采取“磁性战术”对付我们的“礼拜攻势”。我方攻势发起后，

他们就节节后退，每天晚上志愿军到了攻击停止线，他们就与志愿军保持3000米至4000米的距离。当他们后退到第六天、第七天时开始反击。这时志愿军的粮食不够了，后面的供应又不能及时送上来，美军就用优势炮火，实施猛烈突击。志愿军战役目的未能达到，在第五次战役中受到重大损失。这就是对方在战法上的创新。

当我们的弱点被对方抓住之后，战局就发生了变化。第五次战役损失较大，之后就是谈判了。朝鲜战争最辉煌的就是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后面两次战役没有打好，完全是对方的创新给我们造成了伤害。

美军作战理论中的“进攻战术”就是在到达顶点之前攻占目标，“防御战术”就是把进攻一方引向顶点。美军认为礼拜攻势就是防御的顶点，我们到达顶点，他们就开始反攻。所以，不要以为创新是我们的专利，对方也在创新，而且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很大伤害。

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全面获胜，但他们自认为朝鲜战争让他们跌了个大跟头，甚至跌入谷底。越南战争更糟，跌入谷底的谷底。而在海湾战争却重新登上了高峰。下一场战争是谷底还是高峰？美国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了力图避免“马鞍形”走势，所以积极创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对战争的经验总结非常谨慎。1991年海湾战争胜利，1997年我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的时候，发现美国国防大学陆军军事学院、海军军事学院竟然没有海湾战争的战例。

中国的三大战役：淮海、辽沈、平津，我们到现在还在讲。我想，如果海湾战争是我们打的，我们的教材会大力宣扬这场战争，但美国人根本不讲海湾战争。

为什么不教这个战例呢？时任参联会主席的鲍威尔讲：“海湾战争是理想的战争，碰到了理想的敌人，建立了理想的联盟，拥有理想的设施、理想的地形，获得了理想的战场。以后这种理想条件很难再现，所以，美国人反复警告，海湾战争没有针对意义。”

我们大讲海湾战争，说这是信息化战争的转折点，把它抬得很高，而美国人却把它放在一边。这就是对方的警醒，这种警醒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报告中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与我们的描述完全不同。报告称：

美国地面和海上部队训练和装备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一点令人遗憾。战场通信能力严重不足，使那些距离稍微拉开、彼此喊话刚刚听不见的部队之间无法进行通信联系。提供的战术情报经常是“马后炮”，而且不能令人满意或者毫无价值。由于缺乏夜视器材，海军陆战队每天天黑后，不得不停止作战行动。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缺乏运输工具，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到处租借卡车。事实上有些系统性能不佳，在作战中妨碍了部队的调动。情报支援的不足，也越来越严重地制约武器效能的发挥。目前使用的压制敌方防空武器的飞机均已陈旧。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有些型号的飞机甚至正在退出现役。

以我们惯常的思路来看，他们的总结对成绩挖掘不深，对优点概括不精，对意义升华不高。但他们对问题却挖掘很深，概括很精，升华很高。如果他们真正把优点概括得很高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躺着睡大觉了。

美国人如此重视自己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正如李际均同志所讲：“我们这个对手很难对付，因为他还在保持清醒，还在创新，每一次作战之后，都重视总结经验，特别是查找问题；他把条令都搞成活页的，以便随时修订。”这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创新不是口号，不是招牌，也不是获取利益的手段，它是一支军队强军固本最根本的要素。如果不能从这些最根本的要素搞起，不获得这样的思想方法，创新就仅仅是纸上谈兵了。

在节制和约束中爆发能量

讲创新，必然讲到环境。动态环境的营造实际上包含两点：第一点，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即个人动态环境营造；第二点，集体惰性的有效克服，即群体动态环境营造。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集体惰性的有效克服”就是要防备出现一些自我缠绕的惰性。集体惰性一旦出现，是非常难以克服的。比如，任何一个单位，时间久了，就形成一个人员的成长链。正团、副师、正师，或讲师、副高、正高……都是固定序列。达到每个位置，都要熬满固定的年头。此时如果突然插进一个人，打破了这个成长链条，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分配，即使你再有才华，再有能力，也难免被众人反对甚至敌视。这不是个人品质的问题，是体制造成的，就像一潭死水，多少年不流动。

毛泽东同志讲“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而我们的环境不变化，人员不流动，几十年在一个单位，必然形成这种局面。这对创新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要重视对创新思维有利的动态环境营造。

为什么美军规定，军官每两三年，最迟四年，必须轮换？为什么美国军官把他们的生涯概括为“搬家”？他们的理论是，当一个人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干到闭着眼睛都驾轻就熟的时候，此人浑身上下除了惰性什么都没有了。唯有对工作岗位半生不熟的时候，最有创造性，最谨慎，最小心。所以，在军人的军事生涯中，就要趁半生不熟的时候不断轮换岗位，不断让你接受新鲜的刺激。这就是机制对人的挑战，克服集体惰性，就要这样轮换。

今天的中国也正在逐步建立这个制度，但是很慢。没有人员的轮换，一般地号召创新，一般地讲打破利益格局，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我们的环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千里马需要伯乐发现”。但真正的千里马不是在马厩里被发现的，而是在跑马场上，让所有的马匹飞奔起来，你才能看出哪一匹是千里马。

就像激光一样，不激它不会发光，但是激光没有谐振腔，不把到处散射的光聚焦到一起，朝前推进它，也打不到你的脸上。一个人再有才，你也要激励他、约束他，否则他的能量是散射的。和激励相比，约束更重要。任何有效的思维，焦点必须集中，这必然是约束的产物。

真正的专业素质，就是让你在节制中获得自由。尤其是在物欲横流、周围各种诱惑花样翻新的情况下，能否保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专注，能否使自己的能量像激光那样高度聚焦，是能否真正将才能发挥出来的关键。失去专注，没有约束，无法致远。

这种约束，一是对自身能量的限制，二是对这一能量的有效发挥与运用。怎样约束他，让他少被杂事干扰，集中精力去做他应该做的事。

歌德讲过：“巨匠在限制中表现自己。”这种限制，恰恰是能量的积蓄。

集体是讲共性的，统一行动，有很强的共性。但是每个人必须要有个性，因为创造性的思维来自批判精神，批判精神来源于个性培养。创造需要有个性，发展需要创造，所以有个性才有创造力，才有生命和活力。个性不但对于生命个体来说是重要的，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宝贵财富。

南京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授会原主任蔡铁根，1958年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对批判教条主义。他认为当时存在的问题，不是教条主义而是游击习气，军队正规化建设没有跟上去。他提出：“军队训练教育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战争有权改变一切。我们要适应未来战争，夺取未来战争胜利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有的东西必须得改，比如游击习气必须得改。”

最后，他被开除军籍，发配到地方。1966年，他在地方当副局长，后来被打成“反革命”，1970年3月被枪毙，1981年总参军训部给他平反。

蔡铁根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个性。批判教条主义是政治问题，但是蔡铁根认为它是军事问题，且不构成主要威胁。蔡铁根这番话是1958年讲的，今天看来，依然能感受到“战争有权改变一切”的振聋发聩。我们的标准在哪里？没有战争标准，万事皆空。所以，蔡铁根的个性今天依然是军队的宝贵财富。

创造性思维不仅具有建设性，也具有破坏性。一种思想越新颖、越重要，颠覆性越明显，其破坏性及给我们带来的焦虑烦恼也就越大。虽然不能说打破规则是孕育创新的必要条件，但创新思维却必须超越旧有的思维藩篱。

不能超越创新所造成的破坏，不能承受创新难以避免的代价，也就没有了创新。

毕加索讲：“每一种创造行为，首先是一种破坏行为。”毛泽东讲：“不破不立。”都是同一个道理。创造性之所以难，就难在它带有破坏性，你不让它破坏，阻止它，那就是遏制它的创造。在创造过程中，它必然要打破一些东西，这就是创造带来的风险。

我们今天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既有重大的挑战，也有重大的机遇。迎接挑战，把握机遇，掌握主动的根本出路，是自觉、系统、不断地进行体系创新。转变思维模式，超越自身利害，应该成为今天我们通过创新思维迎接挑战、把握机遇的突破口。



安全稳固，善对危机处理

信息传播的速度，决定危机发展的态势。

危机处理的时机，决定控制危机的成本。

善对危机，方可止戈为武

危机，作为矛盾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处于即将爆发的一个临界点，它具有世界共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中国洪涝灾害，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军用飞机相撞，2003年“非典”肆虐中国，2008年年初冰雪灾害的袭击，“3·14”“藏独”骚乱，以及汶川特大地震等等。对这些在世纪之交，伴随我们国家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危机，我们并不陌生。

危机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第一类，自然灾害形态危机，被联合国归入 Disaster Management。比如，洪涝灾害、“非典”、冰雪灾害、汶川地震……这类危机很大程度上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一种自然规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要发生。而在抗击这类危机的过程中，仍有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从中起到很大作用。

第二类，经济风险管理类危机，被联合国归入 Risk Management。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经济危机。与第一类自然形态危机相比，第二类危机中，人的因素占比提升了，不过并非全部。你可以说，亚洲金融危机与索罗斯的炒作有关，但不能全部归因为炒作。东南亚地区的外向型、加工型经济，本身就具有巨大的结构性问题，是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造成的很多漏洞，容易被攻击或利用。所以，尽管在经济风险管理类危机中，人为的因素在提升，但仍是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在起主要作用。

第三类，典型的人为危机，联合国称之为 Crisis Management。比如，轰炸大使馆、撞机、战争等，这类危机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成事在人，

败事在人，挑事在人，结束这个事态也在人。没有人就没有这些事情，有了人就有了这些麻烦。

这几类危机之间的转化，是危机冲突中一个很大的特点。

比如，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四国政府（泰国政府、菲律宾政府、印度尼西亚政府和日本政府）垮台。当然，还有自然形态的危机向社会政治危机转移，例如2003年的“非典”，如果中央在4月20日不采取果断措施抗击“非典”，全国动员，那么“非典”本身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很有可能要转变为一场普通的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控制事态，“非典”大量蔓延影响很多人的生命，政府的公信力就要出现很大问题。

2003年4月20日，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办公条件不够，所以就借用了旁边的人民医院。于是，就有传言称人民医院成了北京“非典”的传染病医院，很多到人民医院看感冒的病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竟染上“非典”致死。

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眼皮底下出现的传播，对政权形成了严峻挑战。这说明如果自然形态的危机处理不好，它也有可能向社会政治危机转移，这是危机的一个规律。

不管什么形态的危机，处置不好，最后都要向社会政治危机转移。所以危机处理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稳固。

看清特点，力争化有为无

从今天来看，世界范围内危机处理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危机日益由突发变为常态。

全球化本身既是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又是引起不安和冲突的变量。全球化使我们的福利，包括技术、商品、资源连在一起了，也把我们的问

题连在一起了。国际社会面临的冲突与危机，不论是形式还是范围都出现了一种弥漫性扩散的趋势。

冷战虽然结束了，但它遗留的一系列问题依然是新世纪危机冲突的根源。边境领土纠纷、民族宗教冲突、意识形态对立、武器扩散和军备竞赛等。同时，新世纪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冲突和危机，东西平衡瓦解、南北差距扩大、人口增长与环境破坏、资源紧张与海洋权益争夺，还有单边主义扩张与恐怖主义兴起……这些是冷战时期很多冲突的根源。

根据联合国 2005 年的统计，在世界范围内，非法移民每年交易额高达 70 亿美元，所以抓了一批“人头”，判了一批“人头”，但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因为利益诱惑太大，不断地有人出来。

全世界每年经济产值的 6% 是通过非法洗钱实现的，高达 2 万亿美元；每年毒品交易总额高达 4 千亿美元。而且散落在全球的 5.5 亿件轻武器中，仅有 1800 万件由各国的政府、军队和警察使用，占武器总数的 3%，其余 97% 的武器流落民间。幸好中国的枪支管理甚严，否则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和烈度将会大大增强。

上述这一切，都是全球化的副产品。

第二，危机蔓延速度越来越快，失控概率大大增加。

危机传播速度取决于信息的传播速度。古代有烽火台，目之所及，燃起狼烟，将士们就知道有外敌入侵了。当时还有 500 里快马驿站，消息通过一匹匹快马传递着，所以马蹄的速度就决定了危机的传播速度。今天，则是网络通信的速度决定着危机的传播速度。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说：“互联网时代的速度，意味着各国政府对自身议事日程的控制权都会减少，领导人在事件反应前享有的自由会减少，而且会被迫与更多的参与者分享舞台。”这就是网络传播给危机增速带来的问题，消息传播到哪里，危机就蔓延到哪里。

1999 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当时的消息传播过程是：

北京时间5月8日5:45，即当地时间5月7日23:45，我使馆被炸，3人死亡，20余人受伤。但是由于使馆的通信系统遭到破坏，国内并未在第一时间得到报告。

北京时间早晨6:00，《人民日报》驻南联盟记者吕岩松用手机打到《环球时报》主编的家里，告知情况，主编再把电话打给外交部，外交部领导获悉后又将电话打到吕岩松的手机上，这才与大使取得了联系。

6:10以后，有关部门才陆续向中央报告。7:30以后，驻南大使潘占林才正式向中央报告。这就是我们当时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了。

那时网络的速度如何呢？

北京时间5月8日6:24，新浪网在国内率先发出简讯：大使馆被炸，标题新闻。事件发生后大约1小时，早晨6:40，新浪网发出详细报道，全方位介绍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和人员的伤亡情况。

国内各界一片哗然，新浪网新闻中心瞬间塞车，访问量达到平时的5倍以上，紧急将服务器由1台增加到5台。很多人要持续刷新两三个小时，才能挤进新浪网。

这就是信息时代危机传播的速度，也是危机失控的背景。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封锁消息6天，媒体无一知晓。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充分的时间开会商议，6天之后，向世界公布美国要封锁古巴。现在，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美国总统连2个小时的缓冲时间都没有。

信息传播速度意味着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传递顺序被打破，普通民众不但能够与领导者同步，甚至可能先一步获知消息。过去信息的传递顺序就是主要领导者掌握最大量的信息，信息往下层层稀释，随着职务的降低，绝密、机密、秘密，县团级往下，最高领导人享有最大量的信息，这是过去的传递顺序。

今天，纵向信息传递顺序，与领导信息保持一致的信息传递顺序，被大量的横向信息传递顺序打破。所以中宣部一位领导同志说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支部书记可以掌握本支部成员信息量的90%，书记告诉成员

国内外形势是什么样的，大家就认为形势是什么样的。到了1996年，一个支部书记连本支部成员信息量的10%都掌握不了。到了2008年，可能连5%都掌握不了。这就是大量横向信息传递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美国人称这种状况为“信息倒置”，即被领导者比领导者知道得还多，坐在台下的比坐在台上的知道得还多。这种挑战不仅仅意味着知道得多，它还意味着拥有越来越多实时信息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等待结局，而是开始关注事件的细微进程，并要开始参与和影响这一进程。知道就要参与，参与就要干预。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决策时间大大缩短，一些关键角色甚至只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决策，接受检验。所有的领导者，不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想内部决定、处理完毕、对外宣布。但今天，要达成这一过程越来越困难。

第三，危机的连带效应和连锁性日益明显。

今天的危机所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势呢？就是单一危机发展成复合危机，经济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局部危机引发全局性危机，地区危机转化为跨地区危机，这些已经成为信息时代危机衍生的重要特点。它在不断发展、延伸，雪球越滚越大。可能最初的危机并不算什么，但最终的结局却是一塌糊涂。

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出危机的连锁性和连带效应。2005年11月13日，吉林吉化双苯厂发生爆炸，之后即刻开展了搜救工作，灾难慢慢得到控制，到11月14日凌晨，明火被扑灭。

搜救工作开始时，当时的吉林市副市长就宣布，根据专家的检测分析结果，爆炸不会造成大规模污染。爆炸发生后，产生了大量橘黄色的烟雾，造成了大规模的空气污染，所以当时各方关注的是扑灭明火，因为这样就能制止空气污染。

但是就在吉林市领导宣布不会产生大规模污染之后，大规模污染却发生了。100多吨消防用水在扑灭明火的过程中流到了松花江里，松花江水被污染了。按照要求，扑灭化工厂的消防用水必须通过构筑围堰的方式把

它堵住，以免到处乱流。但是当时有关部门并没有构筑围堰。

松花江水被污染之后，吉林有关方面请示国务院分管领导，通过丰满水库放流的方式，将污染水体冲下去。水库由每秒 230 立方米提升到 600 立方米，最大提升到 800 立方米。11 月 15 日决定放流，可是接下来更麻烦了，直接将污染水体冲到了下游的哈尔滨。

11 月 21 日，哈尔滨市市政府发布文告：

从 22 日中午 12 时起，全市停水 4 天，检修管道。

当时就出现了混乱局面，哈尔滨市市民抢矿泉水、抢湿巾、抢飞机票、抢火车票。有人说松花江水污染了，还有人说要地震了，顿时谣言满天飞。

11 月 21 日晚，哈尔滨市市政府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告诉大家真相。政府下发紧急通知，说明是吉化爆炸导致松花江水污染，请大家不要惊慌，三四天内污染水体流过松花江，就能够恢复自来水供应。同时，国务院和周围省份都非常重视，矿泉水等支援物资马上运到，形势很快被稳定住了，哈尔滨市人民的情绪也被稳定住了。

所以，危机中的发言极其重要。领导同志平常讲一千句话，别人一句记不住，危机中讲一句话，别人长久不忘。而危机中的失言是非常要命的。

哈尔滨市发布紧急通知的第二天，吉化负责人还在讲：“我们有污水处理厂，不会排污到松花江。”同一天，中石油的新闻处长也表态，他不认为哈尔滨停水与吉化爆炸污染有关。他们的表态都非常糟糕，全部被记录在案。最后，他们拼命解释当时为什么要这么讲，但是事态已经非常明显了，他们的否认已经非常被动了。

在 11 月 22 日当天，中石油和吉化都在否认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已经正式就松花江苯污染事件知会俄罗斯。因为丰满水库放水之后，污染水体会从吉林冲到松原，下一步冲到哈尔滨，再到佳木斯，然后污染水就冲入俄罗斯。

11 月 23 日，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宣布吉化双苯厂爆炸，松花江发生重

大水污染。11月24日，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会见俄罗斯大使拉佐夫，向俄方通报11月20日前后，污染水体流出中国境内，进入俄罗斯。此时，吉林省省长正在带一个代表团到黑龙江省道歉。当吉林省省长正带团在黑龙江省道歉的时候，中国政府也正在向俄罗斯道歉。

从这个例子来看，危机的衍生就像滚雪球一样。这是现代危机的特点——连带效应。

第四，利用甚至制造危机，成为频繁使用的手段。

天下本已够乱，还有人在故意捣乱，并且这类人不在少数。比如“藏独”骚乱。本身是一次内部事件，却被西方所利用，歪曲报道。CNN发表的完整图片内容是暴徒袭击军车，而发表出来的图片却把暴徒删掉，成了军车向普通群众开过来。

还有一幅图，被达赖说成是武警装扮成僧人，打砸抢烧，引起骚乱。结果达赖提供的这幅图片被证实是2001年在新疆拍的一个片子，武警战士作为群众演员拿着袈裟。

今天，通过伪造、剪辑等手段造谣生事，利用各种方式制造危机，已经成为危机衍生的非常大的特点。

常怀危机，方能避免危机

从中国内外的形势来看，新世纪初的20年，既是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首先，就国家安全的大环境来看，历史遗留的陆地边界问题尚未完全解决，300多万平方千米海洋权益一半以上存在争议，“台独”分裂势力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藏独”和“东突”势力危害边疆安定团结。

此外，社会结构在变革中矛盾交错，不稳定因素增多，这也成为今天矛盾的起源。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记中，评论了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很难说这个人是亲华的，还是反华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对中国了解很深。

这些年来，边疆这么稳定，中国真是太幸运了！未来5~10年，中华帝国的一两处一定会有变化。也许是达赖过世，藏人运动日趋激烈，也许是朝鲜族人的大移民，也许是香港，也许在新疆，中华帝国的疆域变化势必要发生。

这是2004年罗斯·特里尔在中央党校讲学时的讲话。“中华帝国的疆域变化势必要发生”就是指我们的边缘要出现破碎，这是我们在研究现实问题时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日本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一度判断：2006年，中国大量累积的银行坏账问题可能要爆发；2008年，台湾大选“修宪”“制宪”事件可能引发战争。但他说的这两条现在都过去了，台湾大选没有引发战争，银行坏账问题也没有爆发。他还预言，2010年，中国人均收入超过2000美元之后的政治民主化诉求要对中国社会形成很大挑战；2015年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能源会供不应求。当然能源危机可能会提前到来，这些变化都会形成很大的潜在危机因素。

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经济转型时期。我们正面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失业洪流、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别和地域差距，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我们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5，但清华大学胡鞍钢所在的国情研究中心认为是0.48。0.4是警戒线，我们已经跨入了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基尼系数主要是衡量一个国家收入的公平程度：基尼系数为“0”，国王和他的仆人拿的钱一样多；基尼系数为“1”，全国财富都在国王一人手里，其他人都白干，工资一分都没有。用“0”和“1”来衡量两个极端。

从总体来看，我们一方面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新的“瓶颈”正在形成，在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更多发展空间的同时，我们面临的危及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危机因素也在大大增加，比过去要多得多，这与我

们社会的剧烈转型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应对和控制危机放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通盘思考、把握和谋划，要坚决防止和制止那些可能延缓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稳定、危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陷我于首尾难以兼顾的情形出现。

我们要从高处着眼，从低处着手。高处着眼就是从国家和地区大的安全观来考虑，放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不要仅仅看一个小问题，只顾一个企业，只顾一个地区，导致危机升级；低处着手就是一定要获得行动的能力和能量，而绝不单单是坐而论道、理论推演。

对中国特色危机处理进行探讨，就一定要避免传统角色所容易出现的所谓“六拍”：做出决策拍脑袋，交代任务拍肩膀（任务包你身上了），接受任务拍胸脯（绝对没问题，一定完成好），出了问题拍桌子（怎么回事，把情况搞成这样），不可收拾拍屁股（这个事情与我无关，都是他人弄的），回顾起来拍大腿（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们要建立危机处理的科学决策机制，就一定要避免这种“六拍”的出现，摆脱这种简单的经验决策的模式。

中国有句古话：“小智善于治事，大智善于用人，睿智善于决策。”美国一位危机管理专家叶海尔·德罗尔也讲过：“危机越是普遍或致命，有效的危机应对就显得越关键，危机中做出的决策非常重要而且大多数是不可逆转的。”这其中的道理就像俗语所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或“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

基辛格讲过：“领导者到达高位之前的积累，至关重要。”这句话的核心是到达高位之前，就要开始积累。到达高位不是完成积累，而是运用积累。等到了高位才开始积累，就一切都晚了。

危机中的决策至关重要，而且不可逆转。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二八定律”讲到：80%的产出来自20%的投入，80%的存款来自20%的客户，80%的交通堵塞发生在20%的路口，80%的工作由20%的人员承担，80%的医疗资源消耗于20%的疾病，80%的销售额来自20%的客户和来自

20%的推销员。

帕累托定律揭示了80%的结果归于20%的起因。他指出少数是重要的，关键点出于少数，多数往往只能造成少许影响，而少数则往往造成重大的影响。不是局部拯救整体，就是局部颠覆整体。这就是帕累托定律所揭示的，要抓住事物本质，辨别主要矛盾，要从琐碎的事情中摆脱出来，否则领导干部就会被琐事淹没重点。

时间有限，精力有限，要用最大的精力去关注最重要的事情，这才是领导成功的关键。不能事无巨细一把抓，关键点绝对不能放。

帕累托定律非常像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同志讲：“任何一级的首长，要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毛泽东同志还讲：“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毛泽东同志或许不知道帕累托理论，但他却准确地运用了这个原则，就是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和重心放在那些对全局来说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动作上。

历史上的楚汉相争，绝大多数战役中，都是项羽胜而刘邦败，但在关键的一战，项羽却败了，所以他只有自刎于乌江。刘邦胜了，坐北朝南，成为汉王，这就是关键点。

人有些时候可以失败、可以失误，但有些时候完全不能。这些完全不能出现失误的点就是决定你整个人生的关键点，而这些关键点都是应该被抓住的主要环节。

像汶川地震，没有人会料到领导者的反应速度、军队的反应速度、媒体的反应速度，会在这个历史关键点上，给我们带来了重大的收益。所以路透社评价说：“在这样一个时候，中国能够以不寻常的速度采取行动，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像中国那样，集中资源和注意力。”

美国《时代周刊》在《被唤醒的中国》中，描述了中国民众对灾区井喷式的支持：“这是一种集体的顿悟，整个民族突然间意识到，在20年的经济繁荣中他们改变了多少，以及一些改变是如何朝好的方面发展的。”

汶川地震显示了很多我们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规划和策划，谁都知道危机事件的不可预见性和突然性。在这个点上，如果有一个好的动作和反应，收益巨大；如果没有，损失巨大。这种收益和损害是平常工作的数十倍、数百倍。

危机处理的“四个能力”

中国式的危机处理有什么特点呢？危机处理机制包括相应机构、规则，由机构和规则决定的功能，以及该功能在国家机构常规与非常规运转中所实现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国家有很多危机处理机制，抗震指挥部也好，抗旱指挥部也好，防洪涝指挥部也好，防“非典”办公室也好，它们最终起到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四个能力”。第一是综合能力，第二是加速能力，第三是决战能力，第四是执行能力。这“四个能力”就是衡量一个机制是否有危机处理能力的四个基本的标准。

“综合”是指能不能综合我们在和平时期的条块部门分割。和平时期常态情况下，条块部门分割是专业分工的需求，是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需求。危机时刻要打破这一点，要实现条块化功能的综合，而且要加速各相关部门的运转。

比如，一个单位原来的运转速度每分钟 600 转，这个单位的领导换了，新领导也按照原来的每分钟 600 转运转，关键是危机时刻这个单位能不能加速到 800 转、1000 转？有的单位领导说：“不行，我这个单位加速到 1000 转肯定会散掉！”这就是你的领导能力的问题了！领导的最大能力是能够加速各相关部门的运转，而不是维持相关部门的运转。

此外，决战能力即超过条块部门分割和金字塔层级迅速决策，执行能力即迅速将决定付诸实施、贯彻落实。这是在快速能力中要实现的几个最根本的能力，能实现就是一个有效的机制，不能实现就要看差距在哪里，

是决战能力不行，还是综合能力不行、加速能力不行、执行能力不行？所有能力的综合，最终的目的都是使机制比别人强。如果我们仅仅依托个人肯定不行，机制往往能弥补个人水平和能力的不足，形成机制就是为了弥补领导者个人决策能力的不足。

其次，在危机状态下，如果你还是按照常规将情况层层上达，指示层层下传，就会严重滞后，因为常规管理机构和规则已经不适应危机的运作处理方式了。所以危机处理要求一种非常规程序的能力获取和意志表达，它实际上是普通行政能力、普通行政组织能力之外的一种新组织和新能力。

这就是各单位为了有效完成危机处置，都要在原有的机制之上再组建一个小单位的原因。因为这个新组织、新能力不是原有机构所能够承担的。而这个新组织、新能力所起的第一关键作用就是监控预警。

危机前的监控预警既可降低和减少危机发生的突然性和意外性，又可使决策者能够有备无患。在处理危机时，居主动地位的重要步骤，也是防患于未然，制止危机在萌芽状态中的关键阶段。

做到监控预警，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确定预警重点；二是，获取预警信息；三是，跟踪分析应对。在这三个方面中，信息获取至关重要，而信息获取是一项需要长期进行、长期积累的工作。临时发生问题，临时搜集信息是不行的！在信息获取中，真实性至关重要。

现在，从中央的部门到军队的部门，再到国务院一级，都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信息获取部门揣摩主要领导者的意向，提供主要领导者喜欢的信息。这点很糟糕，它影响了信息的真实性。虚假不真实的信息将直接导致预警的失败。所以，在信息分析方面，冷静客观同样重要，先入为主的印象或者主观预测的倾向必然会使预警判断偏离实情。如果对领导者投其所好，最终将导致预警失败。

预警往往很难成功，原因是危机本身的高变异性和低预测性。为什么危机的预测性低？

第一，预测需要掌握变量，但是某些变量处于未知状态，往往成为预

测过程的缺项，给预测结果造成关键性的干扰。比如，2004年台湾地区选举时，北京国台办、中台办，包括军队情报部门一直预测“泛蓝”要当选。因为它在台湾不管是从实力还是民意上讲，肯定要上台。所以2004年我们预测陈水扁要下台，“连宋”要上台，但结果却是陈水扁上来了。台办的那位同志后来还检讨：“我们今年的预测又错了。”我当时跟他说，不必检讨，不是他预测错了，而是某些变量处于未知状态。陈水扁的流氓性就是这个未知变量，而我们都是君子。

对于2004年台湾的选举预测，内地有位学者的话很对，也很幽默。他说：“2004年的台湾选举，就是台湾岛内年迈的绅士面对年轻的流氓。”连宋——连战、宋楚瑜都是年迈的绅士，而他们的对手就是年轻的流氓。大陆何尝不是绅士，“3·19”的枪击事件，那两颗子弹，我们想都想不出来，对方却都能做出来，一夜翻盘，总计将近700万张选票，他竟以2.8万张票的优势当选，这种流氓性完全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和预测的，这就是变量处于未知状态给预测带来的巨大干扰。

第二，即使在已知变量中，也会有相当一部分包含主观判断的正误，影响对变量的真正把握。

第三，并非所有变量都能纳入统计，一旦未被纳入统计的变量作用超过某种限度，危机结局将与预测结果出现巨大反差。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美派初级教育代表团互访。中国代表团到美国考察了60多所小学，美国代表团到中国考察了40多所小学。相互考察后，两国分别向各自的教育部门提交了研究报告。

中方对美国小学教育的评价是：第一，美国的小学生无论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第二，加减乘除尚不熟练，整天奢谈发明创造；第三，音体美活动如火如荼，数理化无人问津；第四，纪律十分松弛，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老师在讲课，小学生在下面来回走动，老师竟然不管，简直是难以置信。于是中国代表团得出结论：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预言，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或超过美国这个超级大国。

当时美方代表团考察中国40多所小学后，也总结出中国初级教育的一

些特点：第一，中国学生手放胸前，提问时举右边一只（而美国是或举左边，或举右边，或不举手，站起来就问）；第二，清晨街上最多的就是学生，边走边吃早点（而美国是家长上班之后，校车到家里来把学生接走）；第三，中国学生有种作业叫“家庭作业”（美国没有，他们将 homework 解释为需要在家长辅导下完成的作业）；第四，考分最高的学生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学生（中国评判学生就一个分数；美国不是，他们注重全面发展，球打得非常好，音乐很不错，这个学生也很好）。

综上所述，美国人得出的结论也是：美国初级教育完了。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成绩最好的。20年后，中国在文化教育方面将把美国甩在后面。两个代表团的结论是一样的：都觉得美国教育不行了。然而，20年过去了，结果是中美双方的预测都没有实现。

回过头来看，什么变量处于未知状态？什么变量包含着主观判断的正误？什么变量没有被纳入统计？这就是预测中的重要问题。美国人将这种现象称为“More expert, less accurate”，即越是专业越不精确。越是专家，越是专业人员，预测越不准确。这是决策科学预测中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在危机处理中，预警失效就成了我们面临的一个常态，也是最大的问题之一。所以，危机处理中最珍贵的能力，不是主动反应能力，而是被动反应能力。猝不及防的反应最能看出你的反应能力。

危机处理的时机决定成本

危机能否快速处理，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能不能获得较充分而准确的情报；第二，能否制订可以立即援引的预案；第三，能否设计尽可能短的决策程序。

美国“9·11”事件的处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布什总统曾经很自信地说，自己根本不需要学危机处置理论，“我这个人的性格天生是应对危机的。”结果，“9·11”事件发生之后，与他所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8:45 发生第一次撞击后，中央情报局反应迅速，在 9:00 以前就向布什

做了报告。布什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个飞行员驾驶技术怎么这么糟糕，把飞机开到大楼上去了。当然，布什是飞行员出身，当时情报不充分，他觉得是误撞大楼，这是情有可原的。

9:03 发生第二次撞击，中央情报局于 9:05 分做出结论性判断：恐怖袭击。

9:41 发生第三次袭击，撞击五角大楼。当时布什在什么地方呢？他就在佛罗里达的一所小学里听课，当他听说发生了重大事件，立刻起身，乘坐 9:55 的“空军一号”飞回华盛顿，对付那些恐怖分子，那些“懦夫”——“不敢与美国武装力量正面较量的懦夫”。

结果当 10:41 飞机抵达佛罗里达的一个地方时，布什接到了来自白宫地面的通知：

总统不要回来，恐怖分子正在驾机撞击你，正在空中寻找“空军一号”。

听到这个消息后，布什的豪言壮语顿时烟消云散，立即指挥飞机向西飞，飞往路易斯安纳州一个叫巴克斯达尔的空军基地。11:45 到达路易斯安纳州，在空军基地落下，“空军一号”前舱坐的是总统，后舱坐的是各大媒体记者。

前舱的办公室主任通知后舱的记者：“手机全部关闭，不许与你们的老板联系，因为总统正在成为恐怖分子追杀的目标，不能告诉恐怖分子总统的行踪。”所有记者都把手机关闭了。但是，当打开“空军一号”上的电视，电视上却正播着美国总统到达路易斯安纳州的巴克斯达尔了。

视频为什么会播出去呢？因为当“空军一号”着陆的时候，美国各大电视媒体的记者都在外面拍摄，空军基地旁边就有一个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拍到了“空军一号”着陆的镜头，当地电视台马上就播出了。当时各大媒体抓不到新闻，就立即转播了这个小电视台的新闻，美国总统就在这个地方，于是此地又不安全了。当然这也说明，在危机中，任何政府都要面临如何有效控制新闻媒体的问题，管理非常重要，美国也一样。

13:20，“空军一号”又一次起飞，这次选择降落的地点，是任何记者

都无法进入的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弗特。“空军一号”15:00 到达奥弗特。奥弗特在沙漠中心，是美国战略空军的地下指挥所，位于地下 30 ~ 70 米深处。

布什下了飞机就一头钻进地下室，两个多小时后，他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研究美国发生“9·11”事件出现的变化。会议结束后，布什想返回美国，但周围的人都劝他待在地下，只有这样，恐怖分子才会无机可乘，因为这个地方能防止核生化武器的袭击。布什说“不行”，这个西部牛仔无论如何都要回来。

16:30，“空军一号”按照布什的要求，从内布拉斯加州奥弗特起飞，19:20 回到白宫。

布什曾说他最能对付危机，但当危机真正发生，从早上 8:45 第一次撞击开始到 19:20 回到白宫，作为国家最高指挥者、最高武装力量的统帅，布什却脱离指挥岗位 11 个小时。以致第二天——9 月 12 日，布什的家乡——得克萨斯的《太阳报》就发表了社论：

昨天，我们的总统像一个夜晚受了惊吓跑到母亲床上寻找安慰的孩子一样，在美国的上空到处乱飞。

后来，这位专栏作者也因为这篇社论被解除了职务。大敌当前，这么讽刺总统，就是“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后来白宫发言人还专门做了发言：

昨天确实不是布什总统最好看的时刻。看，不管领导者素质怎么样，不管布什如何做，当危机真正发生之后，领导者的张皇失措，在一定程度上都在所难免。

但是，美国“9·11”事件的处理为什么能够有条不紊？当布什在空中张皇失措、到处躲避的时候，美国政府已经启动了两个预案。

第一个是“SCATANA”。这个预案实现了空中交通与导航管制。从 9:00 到 17:30，完成了净空。平常美国上空每天有 6 到 8 万个飞行器，在净空期间，

所有内地飞机就近降落。

13:40，诺尔德（北美防空司令部）进入指挥。

14:00，国内班机全部降落；17:30，国际班机全部降落。

美国上空没有了飞行器。所有飞行器上全部带有美国空军的敌我识别装置，此装置能自动应答，雷达信号一上去，它就会自动回复是自己的飞机。除了能自动回复的飞行器，所有空中飞行器将全部击毁，因为那肯定是恐怖分子。

这个空中交通导航与管制计划就是准备和苏联大打核战争的预案。假如美苏核大战开始，美国在完成净空之后，所有的空中飞行器中只要没有敌我自动识别器自动回应，都可以被断定是苏联来袭的核弹头和远程轰炸机，就可以打掉它。

那时，苏联解体已经十年，但美国没有废弃这个方案，一直到2001年，美国拿它对付苏联的方案来对付当时的恐怖分子，这就是预案的可援引性。领导者虽然张皇失措了，但预案和机制都在发生作用。

第二个是“COG”计划。即政府连续性计划，包括紧急疏散、要人保护、备用通信中心、启动机载指挥中心（15分钟能够升空，就算我地面通信工具全部被摧毁，还可以在空实施指挥），还有舆论动员、股市停盘。这个政府连续性计划也是当初和苏联打核大战的计划。

如果核大战开始，政府连续性紧急疏散，总统在空中到处飞就是要人保护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法定的接班顺序：第一是总统，第二是副总统（副总统还兼参议院的议长），第三是众议院议长，第四是参议院副议长。这是法律规定的四个接班人，因为这四个人不可能连续出事。

为了防范此种事态出现，美国在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这四个人从来不会出现在同一场合。比如在最盛大的活动——总统就职典礼上，可以看到总统、副总统，或者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或者参议院副议长，但其中有一个肯定会被藏在戴维营或者其他地方。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做得不足。比如，政治局九个常委都在北京看节目，植树节时常委们全都在同一场合种树，这些都很危险。从一个大国的国家安全考虑，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场合。

但是，有时候出于政治考虑，如果谁不出来，就会被怀疑不是政治有了问题，就是身体有了问题，会被做出各种各样的揣测，所以他们必须出来。实际上这还是从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延续下来的一种政治心理，必须要摒弃。我们以后应该形成这样的习惯：主要领导者不能出现在同一场合，这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需求。

在紧急疏散、要人保护完成，通信中心、指挥中心形成，布什在空中躲避、到处乱飞之后，副总统切尼从白宫的二楼转移到了指挥室。他回忆说：“我只记得我的两个脚尖点着地面。”这表明他是被安全人员拖到地下指挥室的。

政府启动了连续性计划，安全人员的职责就是把他弄到那个指挥位置，所以安全人员冲进来，架起切尼，拖着就走，而不会去征求切尼的意见。把人架到指挥位置后，他们只说一句：“先生，你指挥吧。”任务就算完成了。

而赖斯的回忆比切尼更惨，她竟然使用“throw”这个英文单词。“他们把我架起来往里一推，扔到了指挥位置。”赖斯称自己完全是被安全人员扔进去的。

这就是机制。当国家这个机器在运行的时候，所有人，包括主要领导者，都是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他们必须按照机器的运行规律，到达自己的指挥位置。所以，一个机制只有这样运行起来之后，才会产生效率。

同时，美国股市从“9·11”后停盘，9月17日复盘，停盘共6天。有些国家嘲笑说：“这是美国大萧条以来的第一次停盘，前所未有，美国狼狈透了。”实际上，这是美国一种有效的保护措施。如果“9·11”以后股市不停盘，股市狂跌，甚至崩盘，“9·11”的打击对美国造成的经济影响会大得多。

过了6天，美国稳住形势后，通过舆论动员，9月17日复盘，复盘后股市又狂跌了3天，9月21日，股市终于稳定了。

当时，我问我们的相关部门：“当中国面临重大问题时，我们有没有

全面股市停盘的计划？”他们说：“没有。”如果这样，金融崩盘所造成的打击要比一个重大事态造成的打击大得多。如果重大事态发生，股市不在短期内停盘，不稳定舆论，不采取相应的措施，这种市场经济下股市的冲击、金融的崩溃对我们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美国政府使用的连续性的运作计划，原本都是用来对付苏联的，结果却有效地对付了恐怖分子，有效地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保护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就是预案的重要，预案的可援引性。当问题发生了，没有预案，没有可以援引的预案，全部从头开始，再从摸索中寻找对付危机的方案，将会是很大的失着。

快速反应要强调的几个问题：

第一，危机处理的首要任务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控制事态。控制事态要求首先必须抢占先机，争取主导，因为先机一旦丢失，主导就丢失，这是危机处置的核心。

很多人在面临危机时，不愿快速做出反应，觉得问题盘根错节，解决起来太难，最终导致危机的失控。正确的做法是，危机出现时，不是要立即解决问题，而是要控制危机。

危机处理的首要条件不是要求争取最好的结局，是要避免最坏的结果。一定要避免问题的失控，所以哪怕问题解决不了，也要把事态控制住。

第二，危机处理机制的关键能力是被动反应能力。猝不及防之下，不能有效地反应，这是危机处理的关键能力。

第三，就危机处理中，摆脱被动扭转局面来说，捕捉时机比做好准备更加重要。很多人都强调准备的重要性，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有备无患”，但是在危机处置中，时机非常重要，我们永远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当你还在准备的时候，却往往错过了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机。

危机处理中的时机往往集中在危机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美国人曾对几百例危机案例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危机处理的头3个小时，如果措施不得当，后续花费的代价会非常大；反之，后面的成本就会变得很低。危机处理的最初几个小时决定整个危机处理的成本，这就是时机。

事态控制是当务之急

危机处理的基本要求是控制事态。问题的解决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事态控制是当务之急。

控制事态的第一要素是控制信息。

掌控信息是当今信息时代掌控危机的第一要素。要强调培养领导者的信息素质，即信息的汇集、甄别、分析、处理能力。主要领导者的信息搜集和信息汇集能力，不是通过听汇报、看材料获取来的，而是自己具备第一手信息的搜集能力，这在决策中起主导作用。

第二，信息时代掌控舆论对掌控危机局面至关重要。信息时代危机失控的初期往往是因为舆论的失控，舆论失控往往最后又导致危机失控。发生在21世纪的危机，是通信极为发达时期的危机，是手机、互联网全面普及的危机，是公民权利意识高涨时期的危机，是民间力量茁壮成长时期的危机，是广受国际社会关注时期的危机。

这个时期的危机，与我们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完全不一样。因为整个环境变了，通信极为发达，手机、互联网全面普及，公民权利意识普遍高涨，民间力量茁壮成长，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个时期的危机中，对危机信息的掌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样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总结和学习的过程。

比如，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之后，由于我们信息不畅，无法及时准确地了解全过程，难以迅速判断事件的性质和美方的动机，国家领导人对外表态的时间显得迟缓。炸馆事件发生36小时之后，才由国家副主席发表电视讲话。50小时之后，才由外交部部长向美方提出四点意见，进行正式交涉。与信息时代的要求相比，我们严重滞后了。

2008年“3·14”“藏独”骚乱事件同样如此。“藏独”骚乱事件发生之后，新华社一直到3月23日才播出了一篇报道：《鲜血和生命的控诉——

西藏各族群众痛斥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这是中央媒体揭露“3·14”事件最早的报道，但事件已经发生了9天。

当时为什么报道晚了？出于多种考虑。

正值“两会”期间，这次事件对我们的形象是不是有所影响？大家都在提倡和谐社会建设，这么不和谐的声音出来，是不是会对地方工作、对全局发生震动？正是这种迟疑导致我们很被动。

3月23日，新华社还播出了一篇评论：《事实不容扭曲，公道自在人心》。这篇评论讲：

十天以来，一些西方媒体罔顾事实，对拉萨事件进行连篇累牍、触目惊心的歪曲报道，攻击我国政府的处置措施和西藏政策，问题在哪里呢？

但与其指责西方媒体罔顾事实，我们为什么不发出自己的声音呢？我们的主流媒体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当然就在那儿连续发声了。我们为什么不出来明正视听呢？

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事实不容歪曲”，但实际上事实是可以歪曲的，事实是能够歪曲的。我们还常讲“公道自在人心”，但实际上公道是可以塑造的，如果我们不塑造人心，而是去等公道自在人心，那么我们永远等不来这一天。

在信息普及的时代，我们必须明正视听，必须要能够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否则，你只有被别人涂黑。这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的信息跟不上，主流媒体跟不上，我们的迟缓、迟疑所带来的被动。

控制事态的第二要素是节制目标。

所谓节制目标，就是考虑自己的力量能办多大的事情。比如，解放台湾是我们的目标，无法渡海是我们的力量。这个力量到目标之间的距离就是风险。力量接近目标，跳一跳就能够得到，是最好的；力量远离目标，风险就太大了。

危机处置中最重要的就是目标，最容易被忘的也是目标。力量的有限性决定着目标的有限性，把握目标的有限性才能使自己张弛有度、进退自如。我们不要企图一下解决所有问题。只能分段解决矛盾，分散解决问题。

控制事态的第三要素就是要积极行动。

目标要节制，但是行动要积极。这种积极主动的行动，不一定就能立即控制事态，甚至可能由于你仓促的积极主动而引起另一方面的风险，但是反过来看，缺乏积极主动的行动肯定会使危机处于失控状态。虽然积极主动不一定能使你成为主导，但你不积极不主动，肯定会被动。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且不谈领导人的果断，媒体的反应也是空前积极主动。

14:28，地震发生。

14:42，中央新闻频道采编系统开始运作，核实地震消息的真实性。

14:58，地震消息在中央电视台被最后核实。

15:00，中央电视台的央视整点新闻时段，头条播出发生汶川大地震的消息，距离地震发生时间仅32分钟。

15:20，中央的新闻频道中止正常节目，开始特别直播抗震救灾专题，此时距离地震发生才一个小时。

特别直播开始，央视新闻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根本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内容把直播充满。直播开始，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反应速度，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我们新闻媒体从来没有像这一轮这么主动。

由于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快速、透明，西方知名媒体如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BBC（英国广播公司）等，在整点新闻报道中大量采用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和英文频道（CCTV-9频道）的报道，中央新闻媒体第一次在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全面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于国际社会能第一时间了解真相、提供援助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不管是撞机、大使馆被炸，还是“非典”等，我们过去的报道都处于被动中，一旦出现新闻，我们在北京的习惯反应是打开凤凰卫视，不看中央新闻，因为中央新闻太慢了。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各国媒体

都在进行大量现场报道，而我们却还在报道内地建设的事情，从中央一套到中央四套，各个频道都不报道“9·11”新闻。

而当时对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却做出了彻底性改变。一个灾难确立一个标准、一种方式、一种组织形式。今后我们不能倒退，只能前进，而这一轮新闻媒体的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甜头，我们第一次居于主导。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对境内外的新闻做了比较后，我们锁定了中央新闻台、四川台、中央一套和中央四套，这些台的新闻远远比凤凰卫视快，比 CNN 快，比 BBC 快。反过来，外面也开始大量采用我们的报道。

这次实践，揭示了两条极其朴素的信息规律：

第一条，速度就是主动，速度就是主导，速度就是质量。虽然在7天之中，汶川地震震级纠正了3次，从里氏7.6级，修正到里氏7.8级，再修正到里氏8.0级，但却没有人因此而质疑政府隐瞒真相，因为新闻报道本身就是一个不断逼近真相的过程，大家都理解。

第二条，新闻规律，就是近些再近些。报道的手段和技巧已经不重要，你做得足够好是因为你站得足够近。在第一现场，现场报道，直面现场是最重要的。

法国《世界报》5月2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上说：

每一次中国出现危机，都会有共产党垮台的预言，垮台论的预言家没有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思，让全球共产党历史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可塑性。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一种全球共产党人都没有的可塑性，他们所具有的快速调整、自我批评以及不断考察国内外有效模式等灵活方式，不但巩固了其政治基础，而且还具有与民众达成一种新的社会契约的能力，这种契约基于经济效率和爱国主义两根支柱。

《世界报》对我们做出了非常深刻的分析。

控制事态的第四要素是承担风险。

危机中必然要有决策，决策就会带来风险，即决策利益带来的风险，把握时机带来的风险和明确权限带来的风险。危机处理过程都牵涉到领导决策的问题。决策就是选择，选择就是放弃，所以决策往往决定你要放弃、丢掉些什么。

针对这种战略抉择所带来的风险，你可能要割舍一部分利益，从而完成利益排序。利益排序并非一劳永逸，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压力下，它会不断发生变化。尤其在实际情况中，最优先的不一定最重要，最重要的不一定受威胁最大，花费代价最大的也不一定带来收益最大。

利益抉择过程既是危机处理中无法回避的过程，又是最艰难、最复杂的过程。领导者的“难”就在于此，简单讲就是“有所失才有所得”，总想一无所失，最终必将一无所得。

西方有一句话：“机会永远存在，抓住机会的永远是少数。”这是一个悖论，到处都有机会，人人都有机会，但是利用机会、抓住机会的永远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没有做好准备。法国的巴斯德讲：“机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就是因为大多数人在机会到来的时候都没做好准备。

当然，抉择利益也好，把握时机也好，不可避免包含着妥协，妥协非常讲究时机。危机处理过程中，一定的妥协和退让不但必要，而且往往不可避免。

第一，注意妥协的时机。妥协必须有利于事态降温和危机控制，而不是相反。如果你妥协了，而对方的要求更高了，危机更升温了，那么你妥协的时机就错了。

第二，要注意妥协的损害。妥协的损害必须是暂时的而不是长久的，绝对不能为了规避眼前风险而给自身造成长期无法挽回的损害。有时妥协就是为了救眼前之急，度过眼前之难关。但是，绝对不能为了规避眼前的风险，而给自身造成长期无法挽回的损害。

第三，明确权限的问题。危机处置中有条理想的经验，就是“权力向下分散，责任向上集中”，这是高效危机处理的特点。危机处置事关重大，

主要领导人必须掌握决策权。同时，危机处置事态瞬息万变，最前沿的人必须掌握机动权。危机处理最前沿的人没有第一线的机动权而只有上层的决策权，就要陷入全面的被动。因为第一线的人最了解情况，而怎么使第一线的人员动起来，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危机处理的难题。

如果第一线人员都趋向不动，那么在危机处置中他就趋向于做一个信息传递员，告诉领导发生什么事情了，什么地方被围了，什么地方出现困难了，什么地方被砸了。他只会报告，不做处置，上级让怎么干就怎么干，没得到上级指示就不动。

第一线人员为什么会有这种趋向？因为动对了成绩是上面的，动错了都是自己的责任。所以风险太大的干脆不动，不动就是成功，一切行动听指挥，上级让怎么做就怎么做。怎样让第一线人员动起来？这就面临一个分权的问题。

美国、以色列把危机处理得非常好，他们提出：第一要分权，给出第一线操作人员清晰的分权目标，针对目标分权，针对什么问题完成分权；第二要做出必要的限制，不是无限制给出处置权，而是在有限的环节给他控制权；第三要配置适当资源；第四要授权不受损，这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做不到第四点，前三点都会落空，也就是把权力交给第一线人员，而责任由上边承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第一线人员还是不积极主动。

要给第一线人员什么呢？就是在规定的范围和目标之内，完成授权。授权完了就你来，出了问题由上级承担。非有如此的胸襟，不足以驱动第一线人员的积极行动，这就是美国提出来的奖励成功者，鼓励失败者，把惩罚留给那些不行动的人。

做到第一点很容易，大家都在奖励成功者，鼓励失败者却不太容易，做到第三点更不容易，因为我们一向坚信不行动是最保险的，但是我们必须形成鼓励失败者的机制，而把惩罚留给不行动的人。

当危机发生时，无所动作，一切不是向下推就是向上推，美国人称这种人是“杀伤力最大的”，要把惩罚留给这种人。因为任何一个危机，前三四个小时的行动决定了危机处置的成本。如果前三四个小时不能有效地

行动，导致危机失控，那么危机成本就会很高。而前三四个小时决策层依赖的第一线人员的主动性，却没能做出有效的情况判断，那么你就不可避免地要为危机处理支付高昂的成本了。

再举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破冰，基辛格秘密访华。当时基辛格讲：“这是1945年重庆谈判结束到1971年这26年来，中美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见。”怎么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他准备了非常详细的脚本。基辛格1996年撰写了回忆录，回忆了20世纪70年代初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来总理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因为这句话让他为整个会谈准备的腹稿瞬间全部落空。

周恩来总理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中国始终奉行积极防御，准备打大仗，做好美国、苏联占领中国的准备，即苏联占黄河以北，美国占黄河以南。”基辛格听了呆在那里。他说在全世界访问过那么多的国家（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非常有名，他一天能访问3个国家，与3个国家的领导人会谈），但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有过这样的开场白。

基辛格后来总结：“中国领导人这种令人震惊的高度危机思维，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周恩来还说：“美国占黄河以南，苏联占黄河以北，就等着你们进来。”基辛格讲只想起一句话来回应周总理：“美国绝不会进攻中国。”第二句话是：“你们防备我们的力量可以摆在别的方面，比如说摆在北面。”

总结起来，就是严重的危机感往往使危机本身得以避免。这是第一代领导者给我们留下的巨大的历史财富和精神财富。

危机，与其说是一种灾难，不如说是一种检验，是对民族的集体、对国家的集体、对军队的集体、反应机制的集体做出的全面检验。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李际均说得对：“决策机构需要一批高度爱国，受过良好教育训练，有丰富实战经验，善于思考又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干部队伍，只有他们才能担此重任。”

新世纪中国发展道路就是这样一个阶段，既是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我们内外的矛盾，我们内外环境发展的机遇，都对我们的领导层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机遇对我们领导层提出的要求，最后带领中华民族真正走向富强之路和复兴之路，危机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检验，对我们最大的锻炼，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提升。

心胜 III

强制敌手，营造安全范围

中国必须学会大国之间的游戏规则。

以往，“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对我们影响太深，甚至影响到国家安全筹划。

威慑不仅仅是力量，更是使用力量的决心。

翻开 1979 年版的《辞海》，我们会发现，“安全”的概念非常狭窄，而“国家安全”的概念根本没有出现。在 1989 年版《辞海》中，对“安全”的解释稍有扩展，但是“国家安全”的概念依然没有。

什么叫“安全”？以前我们认为没有事故就是安全。但我认为，在一个大的安全观里，安全足以上升到战略的层面上来。由此产生了“国家安全战略”这一新概念。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军队来说，国家安全都是一个全新的项目。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边境自卫还击战中，都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但在当时，这些行动主要被看成是捍卫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祖国统一的行为，为我们今后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

1999 年 5 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促使国家安全战略作为一个完整的观念被提出来。那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995 工程”的启动，更是带动了我国的军队建设、国家的安全建设等一系列国家安全战略的提出。

由此可见，直到今天，国家安全战略依然是一个比较新的内容。我并不急于讲述一个安全的框架，因为这个框架还在继续搭建，我着重分析的是搭建安全框架的一些基础，它所要面临以及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夺取优势，为了取得胜利

企业管理战略、经济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现在社会方方面面都在提战略，出现了“战略泛化”的现象。那么，什么是战略？

“战略”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 strategos，原意是将军、将领，最初指的是一种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对胜利的追求。后来演变成军事术语，指军事将领指挥军队作战的谋略。而在中国，最早的战略观念则出自孙子的《妙算》。

由最初的将军，到将道，又到战略，标准英文为 strategy。从整个过程来看，今天的很多战略观念都很模糊。模糊在哪里呢？无论讲战略的综合性，还是讲战略的全面性，其核心观念就是制胜，战略一定要夺取优势，一定要取得胜利。

将道也称为胜道，即制胜之道。军事战略、国家发展战略是这样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同样如此。仅仅把力量综合起来就是战略吗？不是的。综合起来是为了夺取优势，是为了取得胜利。离开这点，战略的基础就没有了。这就是从将军到将道，再到战略的发展过程。

孙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战略，但他的著作《妙算》却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战略观念。《孙子兵法·地形篇》：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

什么是将道？孙子认为，将道就是要料敌制胜，当然还要考虑地形的问題。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孙子还讲过，将道作为胜道，需有以下几个条件：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

每战必殆。

第一条讲，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战，什么时候不可以战，这样的人能够取得胜利；第二条讲，知道双方兵力多少，知道什么时候运用得多，什么时候运用得少，这样的人胜；第三条，全军上下一心一意，同一个志向，这样的人胜；第四条，以充分准备代替毫无准备，这样的人胜，这是一个以逸待劳的问题；第五条，充分授权，充分发挥第一线官兵的主观积极性，这样的人胜。如果无论什么时候，有领导指示我们才动，没有领导指示我们就不动，那不动也就不会胜。

这就是将道、胜道，制胜的战略。战略一开始就是要谋取胜利，谋取胜利有若干个条件，而这若干个条件必须具备，才不是简单的作战，而是真正地入了将道了。

西方曾评论中国：“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直到行将不复存在了，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极具讽刺色彩。这主要源于1840年以来，国际形势对中国的连续考验和严峻挑战。

1840年以来，中国所遭受的灾难使中国的安全战略跟美国的不一样。美国安全战略推行较早，它用金钱、枪炮不断地扩展疆土，属于扩张型。自1776年独立以来，美国的国土面积从100多万平方公里扩展到今天的930多万平方公里。而1776年以来的中国，国土面积则由大约1200万平方公里收缩到了今天的960万平方公里，还有大量的海洋权也丢失了。

近代西方曾有人讲：“近代中国的收缩到今天都没有停止。”比如说台湾问题，我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正是从这刻骨铭心的教训开始的。当然，我个人认为，我们过去对历史的认识，过于简单地把灾难都推到了一小部分人的身上，比如台独分子、清政府。

不少研究近代史的学者都曾讲过：“清朝是个特例，清政府最后的垮台不是内部崩溃，是外敌太强。”李鸿章则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清政府面对的是空前的灾难。

清政府时期，皇帝的清廉程度和皇帝励精图治的意向是历届封建王朝中最突出的，尤其是清后期的皇帝。他们很想把国家管理好，如果没有外敌压力，清政府还能维持很长时间，因为其内部还有一些再生的机制。但这种再生机制在强大外敌压迫之下，就不足以支撑了。

以道光皇帝为例，在执政之初，清朝社会腐朽，“宴会三日不能闭，官员车马无不斗奇淫巧”，八旗子弟乘坐奇车宝马，驾鹰遛鸟，满汉全席，宴会三日不能闭，一派腐朽没落的气象。

道光深知清王朝所面临的挑战与灾难，上台之初就想扭转局面，于是，励精图治，从自身做起。当时他规定节约宫内开支，“岁入不过二十万”，故宫一年的开支不能超过二十万。他最先提倡“四菜一汤”。道光的皇后过生日，他规定宫中只许吃炸酱面。他还力图节省经费投入军队。此外，道光皇帝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穿过带补丁裤子的皇帝。

但如此清廉的道光皇帝，最后却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1842年道光被迫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仅仅一纸《南京条约》将他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只讲结果，不讲过程。

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远东曾做过这样的评论：“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7000名，16条军舰。清朝的兵力70余万，沿海一带的兵力就有20余万。但镇海丢失，广州丢失，陆续失地，到处顶不住。最后7000名英军，将中国闹得翻天覆地，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永久割让香港。这就是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冲击时，至弱武备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当晚，《清史》记载：

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乎顿足长叹。

道光退朝之后，在便殿阶上捶胸顿足，踱步徘徊至五鼓，顿足长叹：“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

中国当时面临的严峻挑战，不是道光皇帝个人品质所致，而是国家力量的问题。清政府的腐败机制不能产生强大的力量，因此也就无法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道光皇帝一辈子的梦想都被一纸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击碎了，最后郁郁寡欢，抱憾而终。

咸丰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主和派，重新起用主战派林则徐，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然而林则徐在赴任的路上却突然病死了。咸丰皇帝曾给自己定下一个座右铭：

第一，防土木之渐；第二，防宴安之渐；第三，防壅蔽之渐。

通俗地讲，就是不能大兴土木，不能大吃大喝，不能闭目塞听。然而，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杀人放火，火烧圆明园之际，咸丰皇帝却跑去了热河。

近代中国连续遭到严峻冲击，少数几个皇帝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挽救这个败局。因为软弱的国家力量完全不足以实现抱负，腐朽的政治机制根本无力维护国家安全。

我们在检讨近代史的时候，经常讲帝国主义如何凶残，如何残暴，如何嗜血成性，却从未反思我们为什么软弱至此。

国家安全战略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近代以来中国因为安全问题所遭受的灾难比比皆是。清朝政府垮台之后，国民政府成立，但灾难并没有结束。

有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一度畅销。书中表达的社会情绪姑且可以不认同，但总体来看，我认为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我们以前不是没有说过“不”。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

1860年9月12日，咸丰皇帝对英国、法国宣战；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1900年6月1日，慈禧太后对诸国宣战。这些证明清朝统治者不是不想说“不”、不敢说“不”，而是力图说“不”却不行。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但中国近代的灾难依然没有终止。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关东军1.9万人，东北军19万，但19万东北军却没守住东北。后来很多人把东三省的沦丧，全部归咎于蒋介石给东北军发去的“不抵抗”电文。好像蒋介石如果发的是“抵抗”的命令，东三省就不会被丢掉似的。

张学良在回忆录里讲得非常清楚，“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在北京的协和医院里戒毒。更准确地说，当时他正在一个戏园子里看梅兰芳的京剧，看到一半时被告知日本人发动了“沈阳事变”，于是他迅速返回协和医院。

在协和医院里，东北军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众位高级将领认为打不过日本人，不能抵抗。之后他们就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文，称只能和平解决，不能抵抗。所以蒋介石才给他们回电，同意了东北军将领的提议。由此可见，并不是蒋介石不让打，而是东北军不想打。

我们在总结历史的时候，容易找替罪羊。习惯了把很多历史的灾难归罪于少数人，比如慈禧、道光、蒋介石。然而，把他们抓住之后，历史的重负就能全部得到解脱了吗？并非如此。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自主地直面入侵，并最终取得了成功。所以很多军史部和战略部的同志都主张，中国应该将朝鲜战争的第二次战役，改写成“中国近代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朝鲜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而进行的一次最坚决、最有效的军事行动。1949年，毛泽东曾讲过：“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今天，中国要谋划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这是全部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虽然没有非常准确具体地提出国家安全战略的概念，但是他给国家安全战略奠定了非常牢固的思想基础。离开这个思想基础的战略都是纸上谈兵，毫无精神底蕴。

国家安全战略，就是一种对国家安全的总体筹划，一门组织运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综合力量，保障实现国家生存发展战略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从军事战略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的军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升。美国国防大学 1976 年成立，中国国防大学 1985 年成立，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模仿着美国国防大学的模式建立的。但是美国国防大学以国家安全战略教学为重点，我们以军事战略教学为重点，在这个教学层次上，二者还存在很大的差别。

国家安全问题不仅要靠军队全力维护，还要靠国家的总体筹划。所以美国国防大学班级的编组都不一样，2/3 的人来自军队，1/3 的人属于地方。这些军队的人又来自于三军，包括军官。属于地方的人则来自包括白宫、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这些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能机构。军队和地方混合编排，一起研究国家安全战略。

军事战略主要偏重于军事作战行动，偏重于怎样夺取战争的胜利。国家安全战略则涉及更大层面的筹划，如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运用这些综合力量来保障国家的生存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个国家要制定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包括四大要素：

第一，利益。首先对国家利益要做出准确的判断，邓小平同志讲过：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和观察问题，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二，威胁。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做出判断。为什么 1999 年 5 月中国使馆被炸之后，国家安全战略被正式提上议题？因为我们面临了一种威胁，所以，威胁是国家制定安全战略最强有力的推动因素。

第三，目标。怎么克服在争取利益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威胁？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就是要有效维护 2020 年的小康建

设，给 2050 年中华民族的崛起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第四，手段。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保障，对力量的有效组织和运用。

国防大学一位副校长曾生动地描述：“目标和力量之间的距离，就是风险。”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风险有失控的可能。目标和力量成正比，力量越强目标越高。

比如美国的目标就是全球称霸，是靠着它的力量来支撑的。那么别的国家为什么不想全球称霸？恐怕不一定是想，而是没有这个力量。

大国关系就是做交易

围绕着利益、威胁、目标、手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识和判断。

第一，国家利益实际上跟国情密切相关。当我们描述中国国情的时候，经常会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将这句话剖开，实际上国家的利益就全部显现出来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当务之急就是要取得发展，经济的增长和国家的富强，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利益。

第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的安全利益就是维护社会主义体制，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我认为这句话不够完善，应该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尚未完全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尚未完全统一才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它对中国形成了极大的制约，对中国的安全、国际地位、资金流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之大，体现在领土、人口上。但这还不能被称为一个强国。今天，很多人以为中国很强大，甚至已经到了要反复声明我们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时候了。我认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连统一都没有完成，离超级大国还差得很远。

第四，“大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发展，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完成统一，必须完成大国的利益。

国家安全战略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一定要阻止周边国家出现敌对性集团。为什么加“集团”二字？因为周边出现敌对性国家难以避免，但一定不能让它们联起手来对付我们。一定要打破它们的这种企图。这才是一个大国的追求。

中国不说“势力范围”，但大国一定要营造自己的安全范围。一定要组织自己的缓冲区，营造一个友好地带，一个中立地带，然后才是敌对地带。如果一打开家门都是敌对地带，那么国家安全如何维护？这就好比单元门一打开，这家跟你过不去，那家跟你过不去，都是你的仇人，那你在这个单元还有什么安全可言？理想的状态是你一打开门，都是朋友，其次是中立的，然后才是敌对的。这也是一个大国必须追求的目标。

作为大国，中国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但只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也是远远不够的。

1998年至1999年，印巴发生冲突。巴基斯坦外长来中国访问，印度外长也立即到中国访问。我个人认为，当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是欠妥当的。因为我们指责他们把克什米尔地区搅得一塌糊涂，制造了紧张趋势，所以对巴基斯坦外长的态度非常冷淡。巴基斯坦外长立刻有种被冷落甚至被抛弃的错觉，就好像中国要跟印度站在一队了。而印度外长来访时，我们对他却非常热情。

作为大国，中国必须学会大国之间的游戏规则，大国不害怕周边事态波动。如何发挥大国的作用，体现大国的存在呢？那就是：当周边相安无事时，你才会没事。周边打起来，你让他们不要打，他们就不再打了。这时，你在这个地区就有发言权了。

现代国家的国家安全，就是一定要做交易，做交易手中就一定要牌。中国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还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朋友遍布天下，做交易成什么事了？

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到中国来访问。很多人说贝克就是一个商人，根本不是政治家，满口都是生意经。他反复讲中国在什么地方让他一下，他会在什么地方让中国一下。外交部对贝克嗤之以鼻。

但大国关系不就是做交易吗？不做交易，还有什么大国关系？还有什么国际政治？中国对政治的理解是什么呢？是郑和下西洋，皇恩浩荡，他们到处散发货物，倾尽所有，没有带回任何利益，相反因花费过高，出现了巨大亏本，以致民国禁海。

我们从未想过要跟别人做交易，赚对方的钱。因为“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对我们影响太深，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国家安全筹划。

无战将无威慑，无威慑无战略

战略问题，还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等其他相关因素。中国有一句话：“缺什么补什么。”在国家战略中，以下几条正是我们缺乏的。

第一，机遇与战略。

在战略实施中，把握机遇极其重要，但中国对机遇的把握是个弱项，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太重视它。

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是中国最南端的海洋领土，但43个重要岛屿几乎被瓜分一尽。除了台湾占了一个太平岛之外，中国一个岛屿都没有。

1988年3月14日，联合国给了我们一次历史机遇。当时，联合国要求中国在永暑礁建一个科学考察站，我们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但舰队到了以后，永暑礁一带却被越军占领，双方武装对峙，情况非常紧张，形势一触即发。

当时，军舰向舰队请示怎么办，舰队没有开火权，于是舰队请示军区报海军，南海作战部报海军作战部和广州作战部，广州海军作战部报军委作战部，军委作战部又报军委，最后军委领导下达指示，军委总参作战部再向广州和南海作战部转达，等等，程序很长。因为命令没有及时到达，越军又首先开枪，我们只好被迫还击。等到“保持冷静，保持克制”的命令到达之后，仗已经打完，6个岛礁已经被我们占领了，这就是我们的机遇。

“3·14”海战中，在没有接到电报的情况下，中国海军抢占了6个岛礁，主动积极地抓住了时机，维护了国家安全利益。这是我们收复南沙群岛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因为紧接着我们就丢掉了更大的机遇。欧洲人认为南沙战后无事，时间尽在我手。但谁能想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了，1991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呢？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对南沙毫无兴趣，重点放在欧洲战场，与苏联展开争夺战。但90年代苏联垮台后，美国的战略中心开始调整，对南中国海的兴趣越来越大。时至今日，已经公开站到了东盟一边。

所以，维护国家安全战略需要把握机遇，丢掉机遇，战略就很难实施。这就是机遇和战略的重要性。

台湾问题同样如此。孙子曾讲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核心是什么？不要以为你的一个简单的战略规划，就是一个常势，一个常形。战略规划得再好，也只是一个图纸而已。怎么实施？法国的一位大数学家曾讲过：“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对机遇的把握就是对战略的把握。

西方的“机遇成本”理论讲，捕捉机遇不是一道廉价的大菜，端过来随便就能吃，捕捉机遇需要付出代价和成本。枕戈待旦就是成本，抓住机遇一跃而起，就是能够捕捉机遇。

讲到台湾问题，我们有没有过机遇呢？台湾问题的形成，有些因素我们是不能控制的。

第一个因素，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军第七舰队割断了台湾海峡，这是台湾问题的由来。这个不可控制的因素导致我们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全面搁浅。

第二个因素，1991年12月25日，苏联彻底解体，使我们用和平方法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也彻底搁浅。

20世纪70~80年代，我们在大国关系之中曾经那么游刃有余。美苏都要拉拢中国，因为中国这个砵虽然比较小，但是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无论它被拉到哪一边，天平都会发生倾斜。

但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为什么我们显得这么局促？苏联解体了，天平的另一端不存在了，我们在美国面前没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战略利益消失了，相反，战略对抗却出现了。台湾问题成了美国对抗中国最前沿、最省事，也是最廉价的一张牌。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苏联解体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微乎其微。从 1950 年到 1991 年，独立解决台湾问题就没有机会了吗？答案是有的。

1975 年 4 月 30 日，越南人民军攻陷西贡。1975 年 4 月 18 日，红色高棉占领金边，美国在东南亚军事崩溃，全面退出东南亚，这给我们提供了历史契机。

当时中美虽然没有正式建交，但互设了联络处。我们尊重和保护美国在台湾的全部利益，就是为了防止中国在完成统一之后，美国反弹。我们建国之初就宣布“所有不平等条约一概都不承认”，但我们却承认美国和台湾签订的全部条约。中国跟美军通信，目的就是减少他们的敌意。

美军从东南亚溃军是它最困难的时候。政治上，1974 年白宫“水门丑闻”，尼克松被弹劾下台；军事上，东南亚军事局面全面崩溃，那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机遇出现了，我们为什么没有抓住呢？

1975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邓小平用了“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描述了当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军队抓得住机遇吗？抓不住，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遇飘然而过。

什么叫机遇？

（1）偶然性。如果我们早知道 1975 年会出现这个机遇，那么 1966 年就不会搞“文化大革命”，充分准备 9 年，一举完成统一。

（2）非常驻性。1975 年出现机遇，我们快速准备，1976 年到 1980 年，就可能迅速拿下台湾。但机遇是短暂的，1977 年美国人就咸鱼翻身了。

今天回头总结 1975 年的情况，多么清醒，多么清楚。可是在机遇出现的时候，我们丢掉了。没有机遇就没有战略，战略不是在苹果树下等着

苹果掉下来，而是需要行动、经营和运作。这个过程中，机遇就显得极其重要。中国捕捉机遇的能力不是很强，但如果失去机遇，将会使整个战略都有全盘落空的危险。

第二，威慑与战略。

战略是需要威慑的，没有威慑，战略无从谈起。什么叫威慑？众说纷纭，但真正管用的理论就是简洁，基辛格只讲了一句话：“威慑需要具备三个要素：实力、决心和让对手知道。”

（1）实力。没有实力不叫威慑，叫虚声恫吓。

（2）决心。有没有使用实力的决心？没有决心，实力也形同虚设。

（3）让对手知道。对手不知道，自己糊里糊涂往上撞，也不叫威慑。

这三者缺一不可。战略必须要有威慑，没有威慑的战略，无法有效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

曾经有人拿中国的三峡大坝开玩笑。台湾和美国学者在一起开会时曾讲：“如果炸掉三峡大坝的话，淹他们武汉以下2亿还是3亿，淹他们多少个工业区？”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做了两点说明：“第一，此消息未经证实。第二，这个消息如果被证实的话，这是美方极不负责的态度。”

但一句“极不负责”就够了吗？就形成威慑了吗？在这一点上，充分暴露了中华民族缺乏威慑给国家所带来的巨大威胁。一个国家凭什么在世界立足？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过去有人讲“落后就要挨打”，说的是经济落后就会挨打。但1999年中国经济发展了，国家也强大了，我们的使馆却突然被炸了。对此，我们似乎除了用砖头、瓦块、墨水瓶把他们的使馆砸得一塌糊涂之外，别无他法。

当时，青岛基地的海军中就有人提议，让中国的战略舰艇潜出夏威夷。我认为这些军人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但这项计划最后却没被批准，因为我们当时只有一艘战略核潜艇。

海军的一些领导同志讲起这些来也同样是痛心疾首。中国的战略核潜

艇1980年制造出来，1987年巨浪-1完成试射。但“七五”“八五”“九五”这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居然全部停止，没有发展。直到大使馆被炸，战略核潜艇才在“十五”期间再一次仓促上马，葫芦岛方面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昼夜突击。

因为没有投入，没有项目，所以我们停工15年，包括热处理师、材料师、机械师、工艺师在内的技术人员严重缺乏。他们要么去做摩托车，要么就去做电冰箱、洗衣机了。

我们的海军领导讲，幸亏白发苍苍的总师还在，幸亏他们的肝脏、心脏、血压、胆固醇还可以，他们的身体如果出点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技术中断15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995”给我们最深的提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会对别人微笑，不会对别人瞪眼，它就永远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想对别人瞪眼，腰杆上一定要有东西。如果腰杆上除了钱包，什么都没有，那么钱包看得再好，也容易被别人抢走。所以，国家安全战略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国家的威慑问题，如果你腰杆上不吊几个大棒，你怎么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安全？

当有人拿中国的三峡大坝来跟我们开玩笑的时候，那不仅仅是别人的猖狂，也是我们战略威慑能力的缺乏。俄罗斯今天的国力不到中国的1/3，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中国的1/3，它的军队不到中国军队的1/2，它的国防开支只是中国国防开支的1/3，但今天却没有人敢拿俄罗斯的古比雪夫大坝开玩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仅仅是中国的国力不行吗？仅仅是军力不行吗？仅仅是军队开支不够吗？还是武装力量不够强大？我们找了很多理由，但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后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了很多军队专家，有些军队领导甚至公开在网上发表了文章，称三峡大坝没问题。理由有以下几条：

- (1) 三峡大坝是混凝土重力坝，小型核弹都没有办法。
- (2) 三峡大坝前，我们层层设防，对方大集群突防根本无此可能，

即使被漏过的少部分飞机，在三峡大坝上扔下几颗炸弹，也不过是给三峡大坝挠挠痒痒而已，根本没有用。但这就够了吗？还远远不够，这种讲法也不是国家威慑。

什么叫威慑？三峡大坝是国家的核心财产。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的单元里有宝贝，我警告你，我的单元里有非常结实的防盗门和防盗窗，你进不来。但这就是你的勇气吗？你的勇气就表现在防盗门、防盗窗很结实上吗？这可能也算勇气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勇气的核心。

勇气的核心是：我这个宝贝就放在家里客厅的桌子上、茶几上，我没有防盗门，也没有防盗窗，但你进来动一下试试？动一下你就会有灭顶之灾。不能形成这样的威慑，我们就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中国拥有非常多的礼仪文化、邦交文化，但缺乏报复文化。报复文化就是威慑文化，这种文化的缺乏会给我们带来安全问题。

俄罗斯在维护自己国家安全的时候，怎么使用核威慑？只有三条：

（1）在俄罗斯及其盟国遭到核武器和非核武器进攻的情况下，俄有权首先使用核武器。

（2）俄军主张一旦战争打起来，在投入 10 个师旅的兵力仍无法制止战争的情况下，毫不迟疑地投入战役核武器。

（3）只要核大国的盟国向俄或俄有安全义务的盟国发动进攻，参与或支持进攻，俄就有可能对其发动核攻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小跟班打了我的小跟班都不行。你要留神，否则我就要直接打你。他们就用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核威慑来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首先使用，毫不犹豫地使用，而且要对任何对俄罗斯国家形成安全威胁的力量去使用。

核威慑是什么？就是这个。

核俱乐部共有 8 个成员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

其中，中国的核政策是：

（1）绝不首先使用。

（2）绝不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

这就相当于，当别人威胁中国的三峡大坝时，我们有大棒，有大炮，但锁住不用。你不首先对我抡大棒，我绝不会首先对你抡大棒，所以大棒放在那儿根本没有用。

当然，这个政策是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制定的。当时中国的核力量极其弱小，两位领导人担心美苏两国强强联合把我们原本弱小的核力量掐死，所以做出了这样极具保护色彩的方针。

今天不一样了，苏联已经崩溃，中国处于第一线。但我们还在坚持“两个凡是”，核政策至今未改。核俱乐部的8个成员国中，只有中国如此宣布。其他7个成员国都坚持，当本国受到威胁时，要首先使用，哪怕对方是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

所以，中国必须要拿出“大棒”来维护国家安全。以往的核政策如果再不修改，不仅仅是台湾问题、拿三峡大坝开玩笑的问题，即使他人对我们做出更过分的举动，我们也只有无力的辩解。

现在，鉴于三峡出现的情况，包括军委在内的很多人都在研究，我们必须要考虑加强设防。但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上了对方的当。中国的军费有多少？武装力量有多少？第三代作战飞机有多少架？第一流的设备有多少？我们稍作盘算，结果就非常清楚了。当用于防御的时候，我们首都现有的防护力量根本防不住巡航导弹。

中国的经费和军费都非常有限，当我们把有限的军费大部分投入到防御首都、防御长三角、防御珠三角、防御三峡大坝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攻击力量？还有什么完成统一的力量？荡然无存。我们全都防，自己好了，对手的危险也没有了，我们统一的目标也搁浅了，所以今天的中国才会这样，防不胜防。我们要按照要点去布防，不能期望全部的军费都能完成有效的防御。

俄罗斯的军队不到中国军队的1/2，国防开支仅是我们的1/3，国土却是我们的2倍。那么，他们是怎么设防的呢？就是核威慑。

中国再不筑起这个核大坝，就不能有效完成国家安全的防护。我们经常讲中国的核实力越强，使用核实力的决心就越大。在台海地区和其他地

区避免大规模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制衡美国和日本战略图谋，并促使其分化的概率也就越大。

就像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一样，当时邓小平同志正在打上党战役。小平同志说：“放开了打，狠狠地打，我们打得越狠，毛泽东在重庆越安全。”如果没有这样的战略规划，我们可能就会以为，想办法跟国民党搞好关系，毛泽东在重庆就能安全。但恰恰相反，我们打得越狠，毛泽东在重庆越安全。

这种辩证关系同样适用于今天。当我们使用核实力的决心越大，我们避免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没有这种决心，没有这种意志，一心想着一定不要有大规模战争发生，到最后，也许大规模战争就真的难以控制了。

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有一条根本原则：危机升级的能力。没有能力使危机升级，危机就要失控。如果对方能够使危机升级，而我方不能使危机升级，那么危机必然要失控。这是国际上一个力量平衡的运用法则。

如果一个国家不捕捉机遇，战略就是空的。如果不形成威慑，战略也是空的。没有战略，别人就会拿你的核心财产开玩笑。威慑不仅仅是力量的问题，在威慑中，使用力量的决心也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

第三，胆略与战略。

人的主观精神状态，领导者的胆略，在战略构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成分。尤其对军队和军史来说，主观的意志和决心同战略的规划与实施关系极大。

湘军悍将胡林翼在《曾胡兵法》里面讲：

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本无万全之策。

我认为这是军事的核心，但我们却总是在追求百分之百，然而决战决胜有绝对的把握吗？永远没有这一天。兵事永远充满变化，一定是算到五六分，在运动的过程中出现机遇，然后抓住机遇。

比如，美国针对阿富汗的作战。“9·11”事件之前，美国根本没有进入中亚的机会。中亚是俄罗斯的后援，和中国关系非常好，以至于美国突然间进入中亚，我们安全部的一位主要领导在内部很小的范围讲：“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美国人进入中亚。”

“9·11”是一次非常大的机遇，美国人怎么抓住机遇的呢？美国人判断，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很可能是发动“9·11”的元凶，所以他们要去打阿富汗。但美国当时仓促到什么程度？连翻译都没有准备，美国军队中没有一个人懂得沃尔多语，因为那里不是他们的战略关注的重点。但没有准备也要打，因为时机在那里，一定要抓住。

进去以后出现了巨大翻盘，因为地面作战不用打了。北方联盟塔利班，阿富汗人打阿富汗人，美国人跟着北方联盟就开进了占领地盘，机遇就这样出现了。

机遇是从胆略中获取的。军队没有准备好，美国对阿富汗准备也不充足。但小布什坚持要打，这看似一意孤行，但打完以后立刻出现了机遇，美国也紧紧抓住了机会。这对我们未来对台军事斗争或者其他方向都有借鉴意义。因为在战略中，胆略的成分显得尤为重要。

讲到胆略与战略，我认为不得不讲一下“海南岛战役”。它是中国的一盘险棋。因为当时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打下海南岛，朝鲜战争一爆发，那么美国人割断的绝对不仅仅是台湾海峡，还包括琼州海峡。那么到今天，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可能就不是台湾问题，而是海南岛的问题。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时，曾给海南岛前线的指挥员发电，下令争取春夏两季解决海南岛问题。

海南岛问题原定在春节以前解决，但后来鉴于攻击金门失利，三野攻击东部岛失利的两次损失，我们认识到了越岛作战、跨海作战的非同小可。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毛泽东下令暂时停止海南岛战役，争取在春夏两季解决。

当时，毛泽东的指示下发以后，2月1日广东军政委员会开会，战争发起时间由原来的2~3月推至6月。6月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但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广州军政委员会通知战役推迟到6月份。2月9日，15兵团致电军委，以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15兵团作为攻击海南岛的主要部队，认为6月份也早，1950年底能完成就很好了。

一系列动作之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当时攻击海南岛的15兵团是韩先楚的40军和李作鹏的43军，但两军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动作。广州军政委员会的会议宣布，战役发起时间推迟到6月份。李作鹏回去后，向全军传达了战役发起时间推迟的决定，然后时间表也跟着推迟了。

但韩先楚回去却违反规定，将消息秘而不宣。除了军长、军参谋长、军政委等参加会议的人知道外，师长、政委都不知道。所以，韩先楚的军队仍在做2~3月份攻打的准备。

2月9日，15兵团认为计划不妥，还要推迟，因此致电军委，表达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3月20日，韩先楚发出了第一封电报，致15兵团及四野：

主力登陆作战估计无大问题。

韩先楚为什么不传达？因为他觉得可以打。当时他原想依托苏联进口的登陆艇，但苏联没有那么多。之后又想派人到香港去购买发动机，改装机帆船，然后登岛。他们对此寄予厚望，但在香港却只购得一二百台发动机，木船改装机帆船的计划也没有成功。再加上“金门血战”的教训，这一系列问题最后都成为推迟解放海南岛的原因。

当时，部队情绪极大。韩先楚一意孤行，认为主力登陆作战无大问题。但他率领的40军内部在私底下就反应极大，怨言一片。有人说：“我们从东北、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这回真的要革命到底了，革命到海底了！”因为当时有三野的教训，攻击金门损失兵力巨大，8900多人一个人都没回来。

还有很多人讲：“韩副司令在15兵团，司令当得好好的，你还兼任40军的军长做什么？”部队不愿意打的情绪很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

经成立，很多部队领导都改到地方出任各级领导了。别人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却还得打，最后还得死，所以反弹情绪很大。

这种情绪不单单影响了基层，也影响到了主要指挥者。当初，韩先楚把命令压下来的时候，某军参谋长就知道了韩副司令要打的强烈意向。鉴于金门登岛有去无回，这位军参谋长在大战发起之前，自己给自己脚上打了一枪，并声称是海边的特务打的。受伤了也就不能登岛了。

金门血战的教训是，第一线登岛部队最多是一个副师级的干部，没有师以上的指挥干部，部队指挥无序。所以此次要求攻击海南岛一线部队主官必须登岛。但革命成功后，他已经是个军参谋长了，地位不低。他很担心登岛回不来，于是晚上在海边给自己脚上一枪。

后来保卫部门进行了调查，警卫员保证肯定不是敌对势力打的，至于那一枪是不是别人打的，他也无法说清。后来1955年授衔时，根本没有授给他，还将他逐出了军队。

让韩先楚非常恼火的是，这种动摇不仅仅来自士兵，还来自军队的高级主官。第一批登陆一个加强营，第二批登陆一个加强团，韩先楚一看各师报上来的名单，眉头紧皱。主官不上，都是副职，而且政工干部不少，指挥干部不多。

韩先楚非常生气，但是没有办法，最后只好率先自己干。在这种情况下，他顶着巨大压力，将主力登陆作战估计为“无大问题”。当然，他这个电报投上去就石沉大海。

3月31日，韩先楚以40军党委的名义，致电15兵团：

大规模渡海作战条件已经成熟。

韩先楚讲，一定要抓住季风时期。季风就是4~5月，时间一过，季风一转，登岛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个命令报上去以后，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4月初这封电报已经很难查到了，韩先楚以个人名义致电15兵团、四

野和军委，要求立即发起海南岛战役。他还专门提到43军尚未准备好，愿率40军主力渡海作战，自称：“我完全可以打下来。”

今天来看，半个世纪以前，我军指战员这种强烈的寻战意识和求战精神，使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大的威胁。真正的危险就是从韩先楚强烈的求战避免的。

4月10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大举强渡作战的命令。军委的命令下达之后，由于43军李作鹏向军队传达了6月份才登岛，所以很多部队完全没有准备好。等到4月16日，海南岛战役开始，43军第一拨登岛部队只有2个团，别的部队根本没有准备好。而韩先楚带着40军6个团第一批登岛。

4月16日海南岛战役发起，5月1日海南岛解放，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割断台湾海峡，这是多么险的一步！如果到了6月25日海南岛还打不下来，那中国的两个岛就都将被美军割断。

我们怎么从悬崖的边上走下来的？就是前方指战员强烈的求战精神和寻战意志，不仅仅是军委领导的决定，也是前方指挥员的意志。没有这个意志，按照军委的部署，我们的未来将面临巨大危险。没有一线指战员的积极主动精神，我们的战略将难以实施，这是中国军队最为宝贵的财富。

当然，韩先楚是诸葛亮，料事如神，知道朝鲜战争要发生吗？未必。毛泽东讲：“1950年5月，他才知道金日成准备在朝鲜方向有所动作，要完成统一，但具体什么时间根本不知道。”

毛泽东是通过法新社的电讯才知道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非常生气。金日成事先没有跟我们打招呼，韩先楚更不知道。韩先楚只知道一点，一个军人的职责，就是当战争准备成熟的时候，一定要动。长远包含着变化，而变化是莫测的。如果不动，夜长梦多，他抓住了军人的直觉直感，一意孤行到底，这才使我们国家避免了重大威胁。

海南岛解放之后，朝鲜战争爆发。韩先楚被调到朝鲜前线。朝鲜战争中，第二次战役几乎把美军的第八集团军陷入重围。38军穿插三所里，而带队

的正是志愿军副司令韩先楚。

第一次战役38军穿插不到位，彭德怀大骂38军军长。第二次穿插时，38军下决心打个翻身仗，但彭德怀已经不敢信任了，于是派志愿军副司令韩先楚带领部队穿插到位。这都是几次关键的作战行动中，战将所发挥的作用。

朝鲜战争之后，毛泽东让韩先楚到福州军区当司令，他不愿意去。福州军区部队都是三野的，而韩先楚是四野的，他觉得部队不好指挥。但毛泽东就让他去，把韩先楚调到那里就是为了威慑。台湾方面一看，谁到福州军区当司令来了？原来就是当初打下海南岛的那个人，这就是威慑。

苏-27、苏-30 驱逐机，威慑就是兵器吗？显然不是。真正的威慑来源于战将。名军必有名将，以色列军队中有达扬、沙龙、巴拉克、拉宾等。美军、俄罗斯军队也都有一批名将。而两伊战争打了八年，除了一个萨达姆之外，别人记不住任何一个将领。一支军队如果没有名将，就不可能具有非常强的战斗力。

胆略对战略的捕捉、对全盘战略态势的改变都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要营造一个安全战略的总体面貌，正如《六韬》所讲，营造国家安全战略也好，营造军事战略也好，任何战略规划都来自于将道。

《六韬·龙韬·奇兵》上讲：

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

军队的核心人物就是一个将，决定一支军队素质的是军官的素质，决定军官素质的是高级军官的素质。这就是一个将在一个国家武装力量中和维护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

这个“将”不是一个单独的战略规划。哪怕是国家安全战略规划，规

划好了由谁来执行？最终是这些维护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这是一个国家维护自己国家安全的最基本的部分。而这些最基本的部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再好的战略规划也是一纸空文。但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就能够创造性地执行这个战略规划了。

十六大报告给我们规定了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国家安全战略所要维护的最根本的目标。目标很高，风险也很大。制定这样一个安全战略，要克服风险。要落实国家安全战略，就必须进行力量组织与力量运用。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死的，但人是活的。说到底，最根本的还是人的问题，人的决心、人的意志、人的能力、人的见识与人的水平。这种战略思维的能力，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心胜
III

统一大计，国之永恒基业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能够称之为“强国”的国家，尚处于分裂状态。

台湾问题已成遏制中国的核心要素，也对中国外交形成了巨大的无形的制约。

台湾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但海峡两岸的对抗性质却已经发生了质变。这种质变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最大争论：“谁在代表中国？”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说，自己代表中国。但是，今天对岸不屑于代表中国，对岸说：“你代表中国，我不代表；但是你不要代表台湾，我代表。”这就是今天台湾问题的质变。

为了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曾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设想的背景是国共第三次合作。但国民党下台之后，这个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国民党再要恢复权力非常难，而且即使国民党恢复了权力，新一代国民党人和过去的国民党人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今天的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

社会规律必须通过人的努力去实现

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像孙中山那一代的老国民党人，是绝不会让步的。孙中山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点已经牢牢地印在我们的民族意识之中，而正是这种意识才使一个国家的文明保存了下来。”

孙中山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日本人曾给他提供了包括武器、钱和避难所等很大的支持。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 年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当时，日本人立刻找上门，让孙中山兑现诺言，割让满蒙与日本。孙中山说：“第一，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割让满蒙与日本。

第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点已经牢牢地印在中国人民的历史意识之中。”

孙中山还讲：“四大文明古国有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中国。只有中国文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为什么？因为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的国家都破碎了，文明就跟着破碎了。只有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所以，让我们割让满蒙与日本，想都不要想。”国民党创始人的思想基础非常牢固，基础就是“一个中国”。

蒋介石也一样。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为了防止大陆武力攻打台湾，美军派出第七舰队割断了台湾海峡。单从这点来看，蒋介石本该很感激美国人，但他却很生气。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讲：“台湾地位未定，要等到对日合约签订、朝鲜战争解决之后，才能定台湾到底归谁。”

6月27日当天，蒋介石就给杜鲁门发表了反对声明。蒋介石讲，美国派第七舰队割断台湾海峡他很高兴，但杜鲁门说台湾问题未定，他又很不高兴。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不影响会议的召开，关于台湾地位的决定，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容人割裂，曲解台湾地位就是别有用心。蒋介石与共产党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他恨不能将共产党人斩尽杀绝。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他毫不含糊，绝不让步。

从一张蒋介石晚上在金门眺望大陆的图片可以看出，他的梦想就是光复大陆。当然，他的另一个梦想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不管打成什么样，一个中国原则不容更改。这是国共和谈根本的基础。

台湾“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也和共产党对抗了一辈子，但晚年的他曾是台湾的统派头目。2001年，他在去世前曾讲过：“世界上所有大国，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希望我们中国统一，而海内海外的中国人，没有不希望中国统一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以来的恩恩怨怨，最后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双方百川归大海，汇聚在了一起。

但今天，这一点却发生了巨变。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蒋经国，几代国民党人都坚持“一个中国”。但从李登辉开始，国民党的统治阶层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登辉一上来就大放厥词：“中国得分成七块（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华南、华北等七个区域），中国太大了，别人害怕，应该分成七块，相互竞争，追求进步。”

李登辉之后，陈水扁又提出了“一边一国”。他声称自己的“一边一国论”绝不更改，不像李登辉的“两国论”，只有五天的勇气。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提出“两国论”，7月14日，在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压力下，李登辉将其言论收回，改成“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2000年8月，中共召开十六大会议前夕，陈水扁认为此时中共内部正忙于权力交接，一定无暇他顾，正是提出“一边一国论”的好时机。

2003年10月，陈水扁又抛出了“两边三国”论。这次他不但没有收回去，还变本加厉地说：“今天已经不是一边的问题，今天的蒙古已经独立了，那么台湾不可以吗？将来会是蒙古、大陆、台湾两边三国。”

历史已经发生了重大断裂。中国的“一国两制”政策针对的是断裂带的那边，而今天我们面对的却是断裂带的这边，这就是为什么“一国两制”政策很好，但屡屡难以奏效的重要原因，对手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的台海形势并非突变，而是渐变的过程，只不过在发生蛛丝马迹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警惕性不够高，所以思想准备不足。当然，也并非毫无所知，比如，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大任务：发展经济、完成统一、维护世界和平。

有很多人说邓小平个性急躁，提得太早了。他为什么这么急？很多人甚至猜测：“统一中国是重要的历史任务，邓小平这么着急，是不是受到了历史荣誉的引诱，想在中国历史上名流千古？”这种设想不失为一种可能，但是，从邓小平在1985年9月20日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想法完全不是来自于荣誉的引诱，而是来自于危险的威迫。

他说：“我们担心蒋经国不在了，台湾会走向混乱。不管怎样，现在

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出现两个中国。”

解决历史问题需要历史契机，历史契机稍纵即逝，一旦错过，便麻烦不断。邓小平正是要抓住 20 世纪 80 年代蒋经国当政这个历史契机，抓紧解决台湾问题。但后来的形势被小平同志不幸言中。1988 年 1 月，蒋经国因严重糖尿病，突然病逝。距离邓小平以上讲话只有两年多的时间。

很多人认为李登辉是蒋经国指定的接班人，但实际上蒋经国从来没有指定过接班人。蒋经国是个很现实的人，国民党政权要在台湾站稳脚跟，必须要找个当地的台湾人来充门面，否则政权难以维持稳定。台湾人中，李登辉曾给蒋经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李登辉第一次见蒋经国的时候，是骑着自行车去的。当时台湾官场气氛非常腐朽，一个农学博士竟然骑着自行车来见他，蒋经国觉得这是个办实事的人，因此对李登辉印象深刻。

此外，李登辉每次见蒋经国都会带一个本子和一支笔，蒋经国的每一句话他都会记下来。然后在第二次会面的时候，他再逐项汇报自己是怎么落实的，蒋经国认为他认真踏实，更对其青眼有加。

于是，蒋经国开始重点培养李登辉。虽然没有把他选定为接班人，但是将他提到了国民党副主席和台湾“副总统”的地位上，为他日后登上“总统”大位搭建好了非常有利的进军平台。

蒋经国在不断考察李登辉，1983 年，他任命李登辉为台湾省省长。当时，一帮“台独”分子正在鼓噪“台独”，动静闹得非常大。蒋经国不动声色，静静观望，他想看看李登辉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无从知晓当时的李登辉是否知道蒋经国在背后观察他。但我个人估计，以李登辉的聪明才智，他可能早就知道了蒋经国在有意试探他。

在台湾审议会上，李登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表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台湾和大陆是血脉相连，绝对不能割断，谁如果企图割断台湾与大陆血脉的关系，台湾就得死亡。

蒋经国悄悄地把李登辉在台湾议会上的发言稿调回来，完整地看了一遍后，他感觉非常好。又是农学博士，又骑自行车来见我，又对我的每个指示都落实得不错，又坚决反对“台独”，这人可以用，所以一步步地把他提了上来。

但是，1988年1月蒋经国突然去世时，李登辉也很措手不及，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被蒋经国提升为接班人，所以当时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宋美龄当时专程坐飞机从美国赶到台湾，为什么？她就是要阻止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主席。

当时国民党内部群龙无首，中常会开得乱七八糟。但在会上，一位国民党副秘书长却跳得奇高，他坚决拥护李登辉当选主席，如果谁不选李登辉当主席，他恨不得把茶杯砸到谁的脑袋上。会下串联，会上演说，最后在一片混乱中，李登辉终于以微弱的多数当选为国民党的主席。

那个当时跳得非常高的人就是宋楚瑜。李登辉能够出任国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临门一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李登辉当选后，宋美龄就此离开台湾，再也没有回来。

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它与社会规律、自然规律完全不一样，但很多人往往将历史发展的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了。

什么叫自然规律？东方太阳起，西方太阳落，早上不管你起不起床，太阳肯定要升起来，晚上不管你睡不睡觉，太阳肯定要落下去，这叫自然规律。

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最大不同，是社会规律必须要通过人的努力、人的奋斗、人的牺牲去实现，而不是坐等其成。台湾问题也是这样，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

李登辉上台以后，台海局势发生了巨变。正应了小平同志在此前的担忧，蒋经国不在了，台湾要出现“两个中国”。果然出现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李登辉执政后的台湾局势完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当然，从社会规律上说，即使没有李登辉，也会有其他的类似人物提

前上台，使台湾问题提前变得严峻。历史上有一些巧合，一些机遇，一时被错过，整个局面都会千差万别。

宋美龄从1988年离开台湾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2000年国民党丢掉政权，从此以后，宋美龄更是不让任何人再提台湾问题，直至2003年6月去世。

宋美龄晚年话非常少，大多数时间保持沉默。活到106岁时，宋美龄不想活了，于是自言自语：“为什么上帝让我活这么久？”周围人听得出她很伤心，但又无法和她解释，所以都躲开她。

别人无法解释，宋美龄就自己跟自己解释。她认为自己活得太久了，这也许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她眼看着自己跟蒋介石终生为之奋斗的所有东西，都在她的眼前灰飞烟灭，片瓦无存。1949年丢掉了大陆，2000年丢掉了台湾，到最后，用中国人挖苦人最狠的一句话讲：“死无葬身之地”。大陆不愿意回，台湾也回不去，最后葬在纽约。

今天，当我们再谈到国民党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这还是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时期的国民党，已经完全不是了。在今天的台湾岛内，成组织的抵御台湾独立的力量已经荡然无存。

李登辉曾经讲过：“时间到了，就像果子熟了，不摘下来要烂掉。现在时机非常好，大陆还没有准备好，大陆2008年三峡大坝要供电；2008年三峡到南京的高速公路要贯通；2008年要办奥运会，之后还要办世博会。这一系列动作下来，大陆的民主主义将要强到吓死人。我们等什么呢？等他们强大起来，我们怎么办？现在要抓紧时间，果子熟了，不摘下来就要烂掉。”

很多有“台独”梦想的人曾说：“如果换了你做李登辉，可能你也要这么做，看准时机。等到大陆强大了，还怎么做这个梦？现在不把这个梦变为现实，将来就没有机会了。”很显然，李登辉早已为今天那些敢于铤而走险搞“台独”的人打好了思想基础。

陈水扁也一样，他的“5·20”演说，虽然从表面上看，没有承认一

个中国原则，但陈水扁所讲的“合身、合用、合时”的台湾新“宪法”，在追求“台湾国”这点上是不会改变的。

2006年，不管是所谓“重新制宪”还是“修宪”，其核心就是要改变，要抽掉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精髓，要改为“台湾共和国”。

这些人设想得非常细，中文叫“台湾共和国”，英文全称为 Republic of Taiwan，缩写为 ROT。后来他们发觉情况不妙，ROT 在英文中也是一个单独词，翻译成中文是胡说八道的意思。一个“台湾共和国”，缩写之后竟成了“胡扯”的意思。如果这样叫出去，那真成一个笑话了。后来又要改称“台湾”，英文缩写为 TW。

孙中山曾讲过：“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中国历史的怪异之处正在于此。”这些人都曾在孙中山的遗像前三鞠躬，接过台湾执政权之后，却又干起了分裂中国的勾当，这正是今天两岸关系发展中非常怪异的地方。

“战场上得不到的，不要期望在谈判桌上得到”

大幅度的“台湾独立”运动，使今天的两岸关系一再陷入困局。过去我们虽然从未放弃过努力，但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期望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但今天是什么局面呢？我们不讲复杂的理论，只讲简单的现实，一句话：“胡萝卜使尽了。”我们把能给的好处已经全都给了，但台湾却没有变化。

两岸开禁以来，我们曾经认为甚至坚信，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拉拢它，融合它，最终完成两岸统一。

从蒋经国同意两岸贸易以来，1987年双方交易额17亿美元。两岸人民同文同种，习惯相同，贸易一发而不可收拾。1990年50亿美元；1993年116亿美元；2001年323亿美元；2003年450亿美元。两岸贸易这种增长态势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包括陈水扁。

但这种极大增长完全是我们单方面给台商提供优惠换来的，包括增加

台湾的资金投入，准许更多的台湾项目进入大陆，等等。然而，我们的资本要打入台湾市场，包括到台湾办合资企业却非常困难。我们单方面给台湾提供了优惠，而他们却处处堵住我们，不让进入。

如今非常令人尴尬的是，台湾每年都会从大陆获得几百亿乃至上千亿美元的贸易盈余。不客气地说，如果没有大陆的贸易，台湾的进出口贸易，不管是对美国、对日本、对韩国，还是对欧盟等国家，最多是持平相抵。因为台湾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几乎全部来自大陆，而且它支付给美国的巨额武器交易费用，相当一部分也是从大陆赚取的。

1990年两岸贸易50亿，2003年450亿，增长了9倍。1990年公开的“台独”占比4%，2003年公开的“台独”占比36%，也是9倍。贸易增长了9倍，台独发展了9倍，在大陆获取利益越多，越要独，这就是两岸关系怪异的地方。

当这张牌运用不当的时候，就变成了他们获益的点。因为经济上的“胡萝卜”已经扔光了，我们还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好处？没有了，已经达到顶峰了。

很多人认为，台湾问题只有两种情况：要么“独立”，要么战争。我认为选择不应该这么单一，从和平到战争之间必须有些过渡。如果我们不在经济上采取措施，依然是蓝绿商人同等待遇，最后只能面临战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越是回避，对岸越要迎头走来。我们没有一个人想打仗，都想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但如果处理不好，战争仍然难以避免。

政治上，我们也给足了台湾颜面。在处理对台关系上，我们最早提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但台湾方面不满意，于是我们做了很大调整，缓和地改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提出了对台关系的“老三句”：第一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三句，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但台湾方面仍然不接受。

我们又做了调整，将“老三句”改为“新三句”，第一句和第三句都没变，主要修改了第二句。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改成“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而中国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可能会感觉大陆要吃掉他，现在改成“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虽然台湾很小，但和大陆共同组成一个中国。我们继续给对岸台阶，但对方依然不为所动。

在台湾，除了那个胆大包天的李敖敢说“一国两制好，我同意”之外，很少有人敢公开同意“一国两制”了。因为谁同意谁就是卖台，谁同意谁就没有选票。长此以往，台湾人根本不屑于了解“一国两制”的内容，他们甚至将它视为一个政治标签：“‘一国两制’会导致我们被大陆吃掉，我们不同意。”

为什么前所未有的宽厚条件，到了台湾却谁都不敢碰了呢？是我们心肠不够善吗？有很多人讲，我们要继续让，甚至考虑使用联邦制。

认真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一国两制”比“联邦制”还要宽厚。美国的联邦制允许各州制定自己的法律。比如：这个州有死刑，那个州没有死刑；这个州同性恋可以结婚，那个州同性恋不能结婚。各州的法律体系都不一样，司法完全独立，但是有一点相同，美国联邦制绝不允许各州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如果单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一国两制”允许台湾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它完全超越了联邦制，那么台湾还有必要搞联邦制吗？

“一国两制”如此优越却仍被台湾嗤之以鼻，我认为这已经不是心肠太软和心意太善的问题了，核心在于力量不够硬。在对岸看来，“大陆根本没有力量来支撑他们的善意，他们太软弱了。大陆就像一块海绵，还能挤出水来，还能提出比这个更宽厚的条件”。

当然，作为一个政治政策，“一国两制”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谈判手段、一个过程、一个理想的解决地区纷争的方法，“一国两制”应该是谈判的最终结果，而不是谈判的起因。还没有谈判却先抛出了“一国两制”的结果，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还没有具体地谈判，先放话称国旗、国号、国歌都可以改，那还谈什么？我认为这点是我们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尼克松有句非常经典的话：“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永远不要期望在谈判桌上得到。你可以让步，你还可以让，你让到底，对方都不会理解。”我们一定要时刻谨记！

今天，台湾还有一种声音：“中国不能统一，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下台了，中国民主了，国家就统一了。”我认为这是一种极致，当然这种极致不可能出现。但这绝对是个借口。

台湾方面将分裂的方法硬说成民主的方法，目的就是以争取台湾民主为名，最终完成分裂国家之实。这种分裂统独是国家地缘利益之间的区别，这种所谓的“民主”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而社会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则是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别。今天的两岸关系已经完全超出这点。

“人民”整体走向误区，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我们应该看到，阻止台湾“独立”的有组织的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过去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结果国民党执政变成了民进党执政。后来我们又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结果台湾人民开始大牵手，我们还能寄希望于谁？很多政治理念都应该用来解释现实，当我们的政治理念解释不了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宁愿不要让大家看到这个现实。

台湾本岛有2300万人，不可能全都支持“独立”。即使出现了最极端现象，全部支持“独立”，也没有关系。大陆13亿人，全世界华人还有五六千万，台湾人只是沧海一粟。我们今天就应该跟台湾人讲清楚。

当台湾人没有认识到统一的好处时，他们就应该认识到不统一的坏处。所以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要让台湾的普通民众知道“独立”的坏处。当我们给你的胡萝卜不够吸引人时，就给你看看灾难可能带来的损失。不这样做，很难有效阻止台湾“独立”。

我们经常问：“你用什么政治理念来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全部人民整体走向历史误区，这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没什么奇怪和胆怯的。

我们举个例子，1973 年中日建交，周恩来总理当即宣布：“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因为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如果我们要求索赔，那么日本政府肯定把赔款强加到日本人民头上，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

中国展现出非常君子的一面，但是认真审视历史，我们不禁发问：日本人民真的是战争的受害者吗？发动对外侵略，发动“二战”的日本战犯，仅仅是 1946 年被东京国际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石原莞尔，或者板垣征四郎吗？历史不是这样的。

认真查看历史，我们发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日本报纸就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日本陆军部来了一个老太太，带着三个孙子，分别是 10 岁、8 岁、5 岁。每个孙子捧着一个泥巴做的钱罐。到了日本陆军部，他们就把钱罐全部砸碎了，把那些 1 文钱的、30 分钱的、80 分钱的零币全部捐给了日本的陆军部。

当天，东京还出现了另一件事：有 3 名电车女售票员要求参军，因没有得到批准，3 人全部跳车自杀。

之后，日本报纸陆续发布过类似的报道：当时，日本军队中，一位少佐夫人在送丈夫去满洲前线前，给丈夫准备好了所有的东西。第二天早晨送丈夫出征后，这位夫人把门锁好，翻身从楼上跳下，自杀身亡。她在给丈夫留的遗书上写着：“为了使你在前方毫无牵挂地杀敌，我今天自杀了。”

北海道 25 名青年要求参加日军，没有得到批准。于是，每一个青年都切掉了自己的左手食指，然后将这根手指头放在瓶子里，送给了日本陆军部。

这就是日本社会当时的狂热气氛。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间的对抗，绝不仅仅是几个坏人捣乱的结果。那些军阀只不过是走在狂热

的民众浪潮最前面的人物。

查看大量日本当时的报纸和纪录片，我们就会发现，日本占领上海、南京、杭州、武汉时，日本国内几乎万人空巷。白天游行，晚上打着灯笼，举着火把，一条一条火龙川流不息。老太太们在街上载歌载舞，欢呼雀跃，非常高兴。

日本这个民族，为了争取生存空间，所有的福利都来自压垮中国，然后把中国的财富全部占为己有，这已经不再是个人之间的争斗，而变成民族之间的战争了。

日本人从来不纪念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但他们每年都会纪念广岛、长崎被投原子弹的那一刻。所以每年我们也会派代表团去参加日本人的纪念活动，对美国人抗议。这些纪念活动搞得越多，就越能说明日本人是战争的受害者吗？那么美国人为什么投原子弹？

日本人当时被原子弹炸了十几万人，状况非常惨烈。所以我们才认为日本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跟他们一起纪念。但日本后来却开始公开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于是我们又开始抗议，认为他们应该对中国人悔罪，这就是我们政策的自相矛盾之处。

我们过去的一些标准理念认为 90% 甚至 95% 以上的人民都是好的。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中认识世界的一个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比如，曾竞选过俄罗斯总统的列别德就讲过：“我现在讲的话不是针对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民族，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一样。5% 的精英，5% 的败类，90% 的人或许跟着精英跑，或许跟着败类跑。”

只有用不同的认识方法来应对不同的历史问题，才能真正认识今天的台湾问题，才能不为台湾那种百万人，甚至是千万人大牵手所震慑，因为在历史中，那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我曾经对台湾来大陆的人士讲：“你们不要以为，在台湾绿旗一挥，底下一片绿海，就能代表台湾民意了。你到大陆来看一看，在建国门大街

上随便抓过来一个人，不管是白领老板还是蓝领工人，甚至无业人士，问问他们，谁同意台湾独立？没有。你再到海外的伦敦、巴黎、开罗、墨尔本，随便拦住一位华人问问，有几个同意台湾独立？同样没有。海外华人谁不在设想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甚至加上新加坡，能组成一个大中华圈？那是所有海内外华人的共同梦想，也是我们力量的本源。”

旧理论不再适用，则必须创造新理论

我们没有必要被台湾的趋势弄得胆战心惊，好像自己的政治理论无法自圆其说一样。如果我们过去的理论解释不了这些，那么今天就必须要建立坚强的新的理论。因为没有新的理论，在台湾岛内讲这些就会不得人心，就会使我们对待台湾问题的底气严重不足。

搞“独立”是少部分坏人的事，大多数人都不想“独立”。如果大多数人想“独立”，那么为什么一直到今天，支持“独立”的人都不过半呢？因为他们害怕。我们如果认识不到这个现实，那么要怎么面临陈水扁“3·19枪击案”和“3·20当选”等局面呢？

3·19枪击案我们不去评论，3·20当选我们也不说太多，但我们要认清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几年前，一位刚从台湾回来的社科院教授说，他在台湾淡江大学讲学的时候，那里的几个教授对他讲：“对‘3·19’枪击案，你们不要感到意外，陈水扁就是这样一个人。陈水扁第一次竞选台南县县长时，既没有名声也没有钱，怎么打败国民党的两个有钱有名的竞选者呢？”

翻开陈水扁的简历可以看到，他小学、中学、大学都是班里的第一名，县里第一，学校第一，头脑非常聪明。在竞选台南县县长的时候，他是怎么打败另外两个国民党候选人的呢？淡江大学的教授讲，陈水扁在台上发表竞选演说，没讲几句，就突然像木桩子一样，直挺挺地倒在了台上，顿时全场大惊。下面的人上去七手八脚把他抬去了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口吐白沫，说自己中毒了。

后来，此事被传为台南县的一个非常大的丑闻。很多人说，国民党人为了竞选成功，不通过民众支持，竟然给对方下毒，何其卑鄙。陈水扁自己也说，他喝的水杯子里有毒。他启动的悲情意识，让他躺在医院里，就当选了台南县县长。

虽然最后查实，他当天晚上演讲的杯子里没有毒，再查实他上一次演讲时的杯子里也没有毒，上上一次的杯子里也没有毒。最后陈水扁辩解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头天晚上吃了什么东西？反正当时肚子难受极了，真的站不住了，一下就倒了。”

在利用突发事件的能力上，连战都不是他的对手。如果没有“3·19”枪击案，他选票过半确实非常困难。枪击案发生之后，多数大陆人不知道这个消息，而台湾80%的舆论都说是大陆派人开的枪，另外20%则说是“泛蓝”阵营开的枪。台湾报纸号外全都是这种悲情意识。

“3·19”枪击案当晚，陈水扁就从南方的高雄赶回了台北，连战可怜地捧着一根人参，站在陈水扁的官邸外边等他，希望陈水扁收下他的这根人参。

连战的母亲是沈阳人，我当时还开玩笑：“我估计连战捧的是一根东北老参，在那儿等着陈水扁把参收下，以表明他的心意，他真的是希望陈水扁好，不是他们‘泛蓝’开的枪。”

3月20日18:00，陈水扁当选，他做出了胜利的手势，手举得非常高。他当时肚皮上缝了五六针，但似乎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而前一天晚上站在陈水扁官邸外边的连战则老泪纵横，他这才明白“3·19”枪击案是假的，自己上当了。

从这点来看，我认为这是一种利用流氓手段对历史时机的营造和利用，我们不能单纯地说陈水扁的品质如何卑劣，但他确实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人。

而从这个人的简历来看，他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由副科、正科、副处、正处一步步谨小慎微地升上去的，他处理事情的方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当我们用习惯思维来判断他“可能不会这样做”“不至于那样做”的

时候，他往往出其不意，招数屡屡令人始料不及。

未来我们该怎样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如果不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就无法对付这样的力量。

台湾的根本价值，涉及国家安全战略

台湾问题已经成为遏制中国的核心要素。有人认为我们应该等到强大之后，再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台湾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建设这个木桶上的一块短板，大量的战略资源会不可避免地流失掉。

今天，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会见外宾的时候，仍然要说：“感谢你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这绝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感谢，而是要通过政治上、经济上或者其他手段，还对方的人情。

长久以来，这样的局面对我们的外交形成了巨大的、无形的制约。在外交部的会议或讲座上，外交官们有多少精力是真正用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上的？又有多少精力是用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能够被称为强国的国家，没有一个是还处于分裂状态的。连自己国家的统一问题都不能解决，却说自己是个强国，史无前例。

的确，中国正在崛起，势头迅猛，尤其是经济增长速度非常惊人。但是，无论中央如何提倡开发西北、振兴东北，那些支撑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三大经济区，依然是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支撑，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但它们全部位于沿海。沿海有发展经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我们曾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中国的经济中心主要分布在沿海 200 公里以内地带，面对海洋，它几乎根本不设防。从东北沿海经过整个华东再到华南沿海，这个巨大的经济中心是在原来和美国关系友好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该经济带的命运决定了中国的生死存亡。”

这只是中央情报局的统计。我们自己统计的沿海 200 公里以内，就是

在对方海机巡航导弹的打击范围内。这里集中了全国 41% 的人口、50% 以上大中城市、70% 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84% 的外来资源投资和 90% 的出口产品生产。中国虽然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地域纵深广大，但是沿海这 200 公里以内的狭长地带，才真正集中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力量，才是我们的硬件。当然还有软件，这里大专院校密集，城镇人口密集，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密集，也是城市化和现代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些都证明了这里是中国的精华地带。

如果海峡两岸统一，我们以台湾北部的基隆为一点，以北海舰队的驻地青岛为一点，在这两点之间拉一条直线，这条空中防线长 1300 公里，既完全处在我们空军的作战半径以内，又完全可以保障东部沿海的海上安全。这条空中防线使整个东部地区都有了安全保障。

以台湾南部的高雄为一点，以南海舰队驻地榆林为另一点，可以再拉一条线，这条线长 1200 公里，以这两点之间的空中防线作为空中力量的防护，完全可以保护南部沿海地区的海上安全。

东部这条线的中心点正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南部这条线的中心点正是我国南部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两条线如果真正被建立起来，中国的战略防线不仅会向前推进 250 ~ 350 公里，国家的安全态势也将会出现总体性的改观。“小鹰号”航母动辄进入东北沿海地区的情况也将会得到遏制。

这就是台湾的根本价值，它已经牵扯到了国家的安全战略。如果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台湾能够统一，那么中国的安全态势将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仅仅因为台湾过去是统一的，所以今天也要统一吗？就像西方说的那样：“中国人就是爱面子，他们统一了，好像没有实质的事情，只不过把青天白日旗换成了另外的旗帜，他们就叫‘一国两制’的统一。”实际上，统一既是面子，也是里子。

当然，美国人炮制出更玄的理论。他们认为台湾如果在大陆手里，那么大陆海军一定要以台湾为基地，完成海军战略核潜艇的布防，而大陆的

海军战略核潜艇一旦进入菲律宾海，美国将会面临非常多的麻烦。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战略核潜艇活动区域非常小，主要在东海、黄海一带，因为周围的韩军、日军、美军、泰军把我们压缩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所以，我们的活动规律、活动区域都已经被美国人掌握了。

有人曾经讲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战略核潜艇消失在菲律宾海，那么外交部在联合国发言，在日内瓦会议发言的时候，美国人就不会中途退席了。他一定要听听中国代表到底都讲了些什么。当所有力量都被美国掌握的时候，它就会认为听不听两可，中国人这点东西我全都知道了。

一个国家在行使自己的国家力量和国家意志的时候，必须准备好大棒。今天台湾没有在我们手里，所以金门马祖地面的炮火才会对着我们，厦门经济特区才会完全处于金门地面的火力范围内，上海、武汉、广州这一带才会全部处在台军的航空火力威胁范围里。

台湾曾经搞过“汉光演习”。当时，陈水扁非常狂妄地说：“我们采取了一些美国人都不敢采取的大动作，就是‘先期反制’。我们不能等到大陆准备好了来打我们，我们应该趁着大陆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先打它。先期反制上海、武汉、广州、杭州、宁波、温州、福州一带，以及三大经济区中，在台湾火力覆盖内的长三角、珠三角这两大经济区。”

一个国家在筹划国家安全的时候，应该先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因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将面临的就会是安全问题、发展问题，或者其他一切问题。

日本人曾经非常高调地讲：“台湾牵扯到日本两条生命线：一条是巴士海峡运输线，另外一条是台湾海峡运输线。”日本80%以上能源都通过这两条运输线运出去。所以，一位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战略学者说：“对日本的安全来说，台湾是最后的生命线。”

如果台湾与中国合为一体，那么“尖阁诸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钓鱼岛，其周边将完全成为中国海。冲绳海域和东支那海也将成为中国军舰演习之域。到那时，日本的船舶和飞机终将被赶出这个区域。

此外，来自中东的石油也被视为日本的生命，而这些油轮和运粮船几

乎都要经过台湾的周边。如果台湾与大陆合体，就意味着日本的出入口将被北京完全堵死。彼时，日本只能对北京唯命是从，日本安保条约也将有名无实。

今天，每当与日本交涉的时候，我们都会明显感到自己的牌不够多，力量不够强。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化学物品索赔等等问题，我们都很难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但如果台湾回归大陆，那么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不仅在对日交涉中，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将处于强有力的地位。

对日本来说，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就像卡在日本咽喉里的一根骨刺。所以它也要阻止台湾和大陆统一。



有理无力，妄谈走遍天下

伊拉克军队的崩溃，从军官队伍的崩溃开始，这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启示。

军队的崛起和国家的崛起不是两层皮，不是两条道，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

近年来，关注伊拉克战争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分析伊拉克战争的特点、影响，对推动我军建设的启示显得尤为重要。

伊拉克战争对国际局势影响巨大。从伊拉克战争可以看出美国霸权态势的上升。俄罗斯地缘政治专家伊瓦绍夫讲：“现在的情况是‘国际生活的武力化’。”伊拉克战争恰好证明了这点。实际上，远不止伊拉克战争。

我在北京参加社科院、外交部的会议时，社科院一些老专家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们说：“20 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这种活法所有人都腻歪透了，21 世纪要换一种崭新的活法，就是战争应该退出国际政治舞台。人类应该通过和平的、谈判的、调解的、让步的方法解决所有问题，而不应该采取军事行动。”

我认为这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而不是客观现实。我所说的客观现实是能否换成一个新活法的客观现实。

世纪之交，从 1991 年的海湾战争，1993 年美军出兵索马里，1994 年出兵海地，1995 年轰炸波黑，1996 年空袭伊拉克，1998 年空袭伊拉克、突袭阿富汗和苏丹，1999 年科索沃战争，2001 年的阿富汗战争到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在这种战争态势下，大家都想换一种活法。但总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让我们换不成活法。

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三届美国总统战争行动非常多。有人说：“小布什这个西部牛仔，穷兵黩武。克林顿是富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总统，好像他好一些。”但实际情况是，从 1993 年到 1999 年间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克林顿下令实施的，克林顿的外交被西方称为“空袭外交”。

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美国空军战斗频繁，已经超过冷战时期400%。在这一点上，中美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大的观念差别，我们以为新世纪到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问题频出，战争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但美国人不这样认为。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有这样一道经久不衰的问题：“美国总统睡到半夜，突然间被人叫醒告知，美国在世界某处的利益受到了重大挑战，请问总统该作何回答？”

美国教授问学员，学员答不出来。实际上这个教授并不期待学员的答案，他自己回答：“不管他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的回答是唯一的：‘我的离出事地点最近的航空母舰在哪里？’”这就是美国人处理事情的方法。

当美国利益受损或受影响时，他首先想到的绝不是让国务院草拟抗议声明、让联合国通过谴责决议，而是：我的打击力量在哪里？我的报复力量在哪里？我的维护国家利益的力量在哪里？

当我们对21世纪怀着许多美妙设想的同时，一定要明白，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所证明的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理论推演出来的世界。

“国际生活的武力化”

2003年5月在美国访问期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请我们吃饭。裴怀亮校长对王英凡提出一个问题：“美国人已经取得了胜利，正在要求联合国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正在顶，中国也在顶，反对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能不能顶得住？”

美国占领伊拉克后，想出售伊拉克的石油，用以完成它所谓的战后重建。那么要联合国取消制裁，它才能出售伊拉克的石油。王英凡讲：“顶不住，早晚的事，只有追认，没办法，大国为了自己的面子撑一下。”

结果，我们访美还没有结束，提案就通过了——“有条件地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条件是什么？就是为了维持法国、德国、俄罗斯，还有中

国等大国的面子。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形势：“有理”走遍天下，还是“有力”走遍天下？当然，这种现实按照俄罗斯地缘政治学院院长伊瓦绍夫的说法是“国际生活的武力化”，武力正在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途径。

美国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广泛地使用武力，穷兵黩武，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我认为，也不像很多学术论文、报告所讲的那样，美国今天的力量主要来自新军事革命、新军事变革、高技术战争、信息化作战、远程精确打击……绝不仅仅如此。

美国人从来不是这样认识的，他们也不敢把他们所有的优势全部归结到新军事革命上去。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走过的霸势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第一场战争——朝鲜战争，美国人自己统计，54246个美国人死亡。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修正案，要求限制美国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因为美国国会的议员讲：“中美没有宣战，竟然能在一个半岛打3年，5万多美国人死亡，就是总统权力太大了。”

当然，这个修正案没有削弱和限制住总统的权力，因为紧接着美国又发动了越南战争。美国华盛顿越战纪念墙的黑色大理石墙面上，一个一个地刻了58209个死亡和失踪者的名字。

越战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案》对美国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进行了量化限制：

一周之内必须向国会做出明确的报告；一个月之内必须取得明确的战果；三个月之内必须完成撤兵的准备。

实际上把军事行动基本控制在100天以内必须完成。美国感到了极大的压力，此后再开战就变得非常谨慎。这是冷战给美国带来的沉痛教训。

冷战结束后，又出现了让美国猝不及防的转折点——海湾战争。美国人完全没有想到，死亡146个人。今天很多人讲起海湾战争，似乎美国打

了一场胸有成竹的战争。但真是这样的吗？海湾战争在预测战场伤亡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后勤局与国家战略研究所计算机的模拟是一致的，美军在海湾地区的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是 1.5 ~ 1.7 万。

当部队往前方开进的时候，国防部后勤局定做的 1.5 万个装尸袋同时前送，但只用了 146 个，这场战争就打完了。这 146 个人当中，还有 35 人死于友军火力误伤，因为这 35 名美军分乘 2 辆装甲车，被英军飞机误认为是伊拉克军队的装甲车，发射导弹击毁，35 名美军当场阵亡。除掉这 35 人，真正在海湾地区阵亡的美军人数只有 111 人，以这么小的代价打下这么大的战争，美国人自己也没有想到。

后来，为什么 100 个小时地面战斗马上终止，战斗没有打下去？很多美国人说，当初老布什就应该斩草除根，把萨达姆彻底推翻，那样就没有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了。这就是我们俗语讲的“站着说话不腰疼”。1991 年，美国人只记得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惨痛教训。在这种教训之下，他们特别害怕再次出现那种局面，所以见好就收，停止战争，然后宣布胜利。当时美国根本没有像今天这样大打出手的本钱，因为他们还没有从越战和朝鲜战争的噩梦中清醒过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从海湾战争开始，美国霸势的再度上升，每一步都是以战争作台阶。科索沃战争实现了“零伤亡”。北约、美国空军共给南联盟造成 2000 亿美元的损失，而美国人只损失了 2 架飞机，一架 F-117、一架 F-16。两架飞机的飞行员都被美国战地后方救护组织抢回来了，一个人没有丢。当然，后方有摔死的、病死的，但战斗死亡一个没有。

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的地面部队没有出动，后来的阿富汗战争，地面部队却出动了，而且以 22 个人的代价推翻了一个政权——塔利班政权。但是，国际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想换一个活法，而国际上一个非常强的力量就不让我们换这种活法。

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授予布什总统全权发动一场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决议内容是：“在你认为合适的时候，你可以采取恰当的力量，发动一场针对伊拉克的

战争。”这就是国际政治生态的重大转型。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之后，国会所通过的决议对总统产生限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国会正在给总统放权。美国国会在“9·11”之后，连续几年对国防部报上来的国防预算不断追加，由80亿美元追加到130亿美元。世界各国都是国防预算报上来，国会要砍一刀，而美国是特例——追加。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的国际形势。

冷战时期，通过战争行为解决政治问题，代价极其巨大。那么冷战之后，战争正在变成一把越来越锋利的快刀。政治问题是一团乱麻，战争能够非常快地斩断它。如果通过和平谈判的方法来解决，旷日持久，讨价还价，漫无边际，而一场战争却很利索。

对伊拉克经济封锁十多年都没有用，而一场战争20天就摧垮了一个政权。战争正在变得越来越便宜。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军事行动越来越成为美国政治家的首选，主要是代价很低，效果很大，解决问题很麻利，没有那么多拖泥带水的事情。

“有庇护的战争”不复存在

美国力量上升，军事行动变成了快刀。那它过去就不是快刀吗？

过去，所有战争都是有庇护的，非常难办。朝鲜战争时，朝鲜背后有中国，中国背后有苏联，互相庇护，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后一个都动不了；越战期间，中苏分裂了，但并不妨碍中苏两个大国并肩站在越南背后，美国毫无办法。

美国人总结自己今天拥有的优势，第一条，有庇护的战争不复存在；第二条，才是新军事革命带来的全新战争能量，两条因素相互作用。有庇护的战争曾经给美国人造成过非常大的困扰。以朝鲜战争为例，美军当时已接近鸭绿江边，解决朝鲜部队已无大碍。这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把美军压到了南方。

麦克阿瑟认为，要想打败朝鲜，首先要打败中国。他提出了对华作战

的三点方案：第一，以海军封锁中国沿海；第二，轰炸中国的东北、华北和华东的重工业基地；第三，不惜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动用核武器。

麦克阿瑟就是要解除这种庇护，中国庇护朝鲜，我就要攻击中国。他也正是因为这三点对华作战提案，而被杜鲁门撤销了远东美军总司令的职务。

杜鲁门说：“以海军封锁中国沿海，无法阻止中国内地工业对朝鲜前线源源不断的供应；轰炸中国的东北、华北和华东的重工业基地，无法阻止苏联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对中国、朝鲜前线源源不断地进行战争物资的输送；如果轰炸西伯利亚铁路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时美军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曾讲：“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爆发，我们也许有输的危险，因为美国人没有做好准备。”杜鲁门说：“如果按照麦克阿瑟的主意，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使用核武器，也会给斯大林在韩国和日本使用核武器、轰炸美国驻韩驻日基地提供口实，所以不行，麦克阿瑟必须解职。”

中苏分裂之后，中苏论战吵得一塌糊涂。当时我们说它是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我个人认为，这些话有些偏离历史事实。比如说，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后来我们还账还了很长时间，当时中国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以致中国的财政非常窘迫。

今天，实事求是地讲，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财政归还苏联的贷款从来没有超过3%，比例很低。况且苏联给我们志愿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要价不高，比我们今天购买俄罗斯或者以色列国家的武器都要便宜得多。

就庇护的问题，我列出以下三条：

第一条，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装备。走上朝鲜战场时，中国还是一支小米加步枪的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但走下朝鲜战场时，我们已经是一支陆海空军和炮、装、工、通、化诸军兵种齐全的现代化军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场上完成了整个军队的现代化改装。

64个陆军师中，有20个陆军师的装备是无偿赠送的；22个空军师装

备里，有8个空军师的装备是无偿赠送的。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斯大林一次性无偿赠送中国382架。这是中国能够在朝鲜战场上顶住美国人的首要因素。

第二条，朝鲜战争期间，13个苏军航空兵师进入中国的东北、华东工业区和首都担负防空任务，防止美国空军轰炸中国的东北、华东工业区和首都，一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具有了防御能力，苏联的空军才陆续撤出。

第三条，朝鲜战争期间，2个苏军航空兵师帮助我们在清川江以北建立了“米格走廊”，200多名飞行员牺牲于朝鲜战场，他们总共击落美国飞机1000多架。当时年轻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才飞了几十到一百多个小时，而对手美国空军飞行员已经飞行了几千个小时，我们的空军是在苏联空军带领之下打出来的。

没有中国的支持，金日成肯定不行。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没有苏联作中国的后盾，中国也极其困难。这就使当时的美国感觉到空前的艰难。

今天，美国也不是一直在耀武扬威，也有打掉牙齿和血吞的时候。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接受“有限战争”的概念。美国当时明明知道朝鲜上空作战的有苏联飞行员，但对国内舆论不敢公布。

因为苏联飞行员来了之后，中国要求他们脱下苏联的军装，换上志愿军或朝鲜人民军的服装，然后迅速学汉语或朝鲜语。在空中通信切忌使用俄语，一定要使用汉语或朝鲜语。

但在瞬息决定生死存亡的空战中，让一个外国飞行员去回忆他才学了几周的外语，来完成空中通信非常困难。在情急之下，他们大量使用俄语，被地面上美国远东空军全部监听到了。

美国知道了空中作战的都是苏联飞行员。但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不敢公布，因为一旦对国内舆论公布，国内就要压缩美军在亚洲多投入的兵力和兵器。杜鲁门说：“这么一来，我们就上了斯大林的当了。”

苏联的重点在欧洲，美国的重点也在欧洲。杜鲁门认为斯大林在远东

找了朝鲜，就是要把美国的兵力全部吸引过来，这样在欧洲美国就毫无办法，所以这个地区是个有限的战争，只能使用有限的力量，在有限的时空达到有限的目的。这就是后来美军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在国会作证，要把麦克阿瑟撤职的重要原因。

布莱德雷在国会上作证时说，因为麦克阿瑟要发动对华战争，而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共产党，就会把我们卷入“一个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之中”。这句话后来成了名言。

越南战争同样如此。越南人民苦打 14 年，终于取得抗美救国的胜利。当然中苏对越南的支持极其重要。“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1965 ~ 1975 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仍然援助越南相当于 200 亿美元的物资。

除了近 200 亿美元的物资外，还有枪支 184 万支、火炮 6 万余门、炮弹 10 亿发、炮弹 1600 余万发、坦克 500 余辆、舰艇 150 艘、飞机 140 架、装甲车 300 余辆、汽车 1.5 万辆、有线电话 4 万部、无线电台 3 万部、军服 1000 万套，大量的油料、被装、药品、卫生器材和食品。这就是越南战争期间，一个小国能够战胜一个大国的原因。

1972 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里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小国只要敢于掌握自己的命运，拿起武器来和大国斗争，最后的胜利就一定属于小国。

这是我们冷战期间一个标准性的结论，甚至是一个公式。冷战之后，我们哪一个也套不上去了。

大家都在盼望第二个越南，但从来没有出现。海湾战争时萨达姆曾讲

“要让伊拉克变成第二个越南”，没有变成；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米洛舍维奇讲“要把科索沃变成第二个越南”，没有变成；塔利班讲“要让阿富汗变成第二个越南”，也没有变成。他们都忽略了形成越南战场的基本条件——大国的支持。

苏联的支持比中国的支持还要慷慨。越南当时做了一个统计：

通过北方“胡志明小道”向南方运送战争物资，6吨物资送到前方只剩1吨，其中5吨要被炸毁或抛弃到路上，因为美国空中封锁相当严。

但不要说6吨炸毁5吨，就是10吨炸毁9吨，20吨炸毁19吨，中苏两国也能保证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前送，美国飞机炸都炸不完。

越南战争后期，中国军事代表团到了越南，看到越南的山洞里中国的粮食在发霉，武器弹药在生锈，因为物资量太大，美国炸都炸不完。这就是冷战时期，有庇护的战争对美国的巨大限制。

美国人在越南战争期间，规定北纬17°线以北绝不过线，中越边境40千米以内的范围绝不轰炸。当时美国总统约翰逊得意地跟他手下人讲：“中越边境40千米以内范围，没有我的命令他们连个厕所都不敢轰炸。”为什么要这么做？约翰逊讲：“绝不给中国人提供介入越南战争的口实。”不能再产生新的大量庇护。这就是冷战期间标准的对抗。

这种情况今天有没有？没有。我们说越南战争、朝鲜战争，表面看是朝鲜、越南这些小国的战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

美国人讲，有庇护的战争没有办法。现在是社会主义阵营作为一个总体崩溃了，中国“韬光养晦”了，我们今天也不会主动支持一个小国和另外一个大国完成对抗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获得一个全新的政治条件——所谓的有庇护的战争不复存在了，冷战时期戴在手上脚上的手铐脚镣解除

了，获得了一种空前的能量释放。

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这使同美国对立的阵营、集团一个也没有了。所以今天的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蹦得比以前更高，连续翻跟头翻得都比以前多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获得了一个全球动手的最有利的国际政治条件——有庇护的战争不复存在。

新军事革命产生全新战争能量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新军事革命突飞猛进地发展，它恰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契合在一起。一方面，美国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动武的政治条件；另外一方面，出现了技术条件，新军事革命给美国带来了非常多的技术条件。

新军事革命，简单地概括一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三大技术，即空间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和交融。它们全部运用到军事上，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军事革命。

1995年美军在波黑使用的实时数据链。8年以前，美国人准备轰炸波黑塞族的阵地，有数架无人机在上空盘旋、侦察和照相。无人机迅速把拍到的图像发给太空的中继卫星，再由中继卫星转发给在匈牙利的无人机地面站，无人机地面站计算机系统经过初级的处理以后，马上再把信号发给中继卫星，再转发给在英国的联合分析中心，联合分析中心对无人机信息做进一步深加工，然后再转发给中继卫星，由中继卫星转发给五角大楼的指挥所，五角大楼的指挥所指挥轰炸机、战斗机去轰炸波黑的阵地，把经过处理的图像转发给战斗机飞行员，战斗机飞行员雷达座舱屏幕所呈现的图像不是本机雷达的图像，而是波黑无人机的图像。

整个中转过程一般在2.5秒以内，非常复杂的图像也只要4秒。离目标几千米转过来时仍然清晰可见，所有的变化全部在屏幕上呈现。信息的流动不仅仅是情报的传递，连续的实时的高速的信息流动，已经变成巨大

的战争能量。

美国人讲，目前 95% 的信息侦察情报、90% 的军事通信、100% 的导航定位、100% 的气象信息来自太空的信息系统。俄军现在 70% 的战略情报、80% 的军事通信依赖于太空系统。这是今天作战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太空正在变成一个全新的制高点。

美国一个评论家讲，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成功动用武力，因为它有无可匹敌的卫星群，能够实现即时通信、强力监视和精确定位。今天某个地区要发生战争，一个非常简单的征候，就是该地区上空卫星云集。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总部调集海湾地区上空 33 颗卫星；1999 年科索沃战争时变为 50 颗；2003 年伊拉克战争时增至 90 颗。

1999 年 5 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美国派皮克林特使到中国来解释，向中国政府道歉。皮克林在报告中讲，格林威治时间 5 月 7 日 21 时 46 分，从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的一架美 B-2 轰炸机，奔袭 10000 千米，向中国驻南使馆这一错误目标，投下了 5 枚全天候全球定位系统制导、各重 2000 磅的联合直接攻击导弹。

中国使馆是一座半弧形的建筑，第一枚、第二枚炸弹从 5 楼贯穿到底，完成了美国袭击的主要目标——地下机要室。邵云环烈士在第二枚炸弹处牺牲，任宝凯武官在第一枚炸弹处重伤。第三枚炸中我国使馆的中部，也是从 5 楼楼顶贯穿到底，楼顶有个非常大的洞。第四枚炸中使馆弧形的另外一侧，《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在第四枚炸弹处牺牲。第五枚从楼顶一直砸到底，没有爆炸，是枚哑弹。

从高空看，半弧形建筑就这么小，五枚炸弹弧形分布在整个大使馆的上部，攻击重点两枚并行，炸掉我们的地下机要室。这就是今天美国所获得的全新战争能量。

有力量不使用，又有什么用？

科索沃战争期间，南联盟的总参谋部被全部炸毁，总参谋部旁边一侧的一所医院只有面临总参谋部的这侧窗户玻璃被震碎。这种战争能量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新军事技术革命带来的效应。这种能量致使美国人越来越经常地选用军事，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打击任何一个目标附带的伤亡正在变得越来越少，它可能引起舆论的反弹也会变得更低一些。那么军事行动就变得非常干净、非常利索了。这就是为什么战争行为正在变成美国政治家越来越经常的选择。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21 世纪不能再拿军事行动解决政治问题。

美军参联会副主席欧文斯对美国的这种能力做了这样的描述：“我认为美国已开始具备这样的能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战场，这个战场的边长可能有 300 千米，也可能是整个朝鲜、伊拉克的面积，我们可以了解里面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一天 24 小时实时监视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仅仅有 30 秒钟的延迟。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能够做到这一点。”

伊拉克战争之所以要发生，之所以谁也挡不住，是因为美国执意要打，而且单枪匹马也要打到底。拉姆斯菲尔德曾讲过：“英国人现在都犹豫了，那么美国人也要打。”就是这句话得罪了英国布莱尔首相。

后来，拉姆斯菲尔德还专门为此道歉，他说：“我们的盟友英国并没有犹豫。”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态度。美国今天使用力量的决心很大，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往往又低估了这种决心。

1993 年，美国内部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争论。当时参联会主席就是今天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发言，介绍美军的情况，正讲到兴头上，却被一个参加国家安全会议的老太太粗暴地打断了，这个老太太就是奥尔布赖特。当时她还没有当选美国的国务卿，只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说：“将军，你不要再讲了，你总是在讲美国的超级力量，如果这个力量我们不使用，它又有什么用！”一句话噎得鲍

威尔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1993年以来，美国追求的是什么？是力量的使用，而不是力量本身。如果这个力量不使用，它又有什么用呢？美国过去使用威慑战略，把原子弹、导弹放在那里，别人就不敢动，那叫威慑。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推出了预防性防御。它的典型事件就是1996年3月中国军队在台海演习，其间美军2支航母舰队到达中国台海演习地域附近，这就是美国的预防性防御。一味威慑不行，得有行动。于是，中国把军舰派去，要打台湾。

不管是伊拉克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小布什都追求先发制人。而这种先发制人在美国就叫预防性进攻。它的原则是：“我必须得打它，因为它很可能要打我。”美国的战略思维发生了很大转变，在今天它更加追求力量的使用，伊拉克战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实际上，伊拉克很难被称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十几年的经济封锁、武器禁运使它的国民经济衰退，连武器装备零部件都供应不足，非常困难。

北纬 33° 以南 36° 以北全部被划为禁飞区，国家从空中被肢解了。只有从北纬 33° 至北纬 36° 之间的 3° 空间，180千米的垂直距离，伊拉克空军能够自由飞行。

雷达站被摧毁，地面导弹发射架被摧毁，飞机起飞就会被打。所以战争之前，伊拉克已经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了。

一场战争开始之前，都要先动员国民，加紧武器生产，训练武装部队，准备迎敌。但伊拉克战争却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特殊在什么地方？一方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航母调集到海湾地区，数字化部队调集到这里。而伊拉克此时正在接受武器核查，正在被别人搜身。

当时，联合国规定的导弹射程是150千米，而伊拉克的萨姆德导弹射程是170千米。就因为超过了联合国规定射程的这20千米，伊拉克正在接

受联合国武器核查。结果，110多枚萨姆德导弹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被销毁了74枚。

战争马上就要打了，伊拉克却在销毁武器，这就是今天的“国际政治公平”。一方调集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另一方则困守十几年，连武器装备用的零部件都供应不足。石油没有，食品也没有，士气、装备、训练都成问题。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到处追，伊拉克军队四处藏，但凡有点好东西全部藏起来。

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刚刚撤出三天半，战争就开始了。伊拉克军队被打得猝不及防。连藏起来的所谓的“好东西”都来不及翻出来，战争就打响了。

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战争，一方全副武装到牙齿，四面合围要打你，另外一方正在给别人展示：“你看我这里，什么武器也没有。”伊拉克战争就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进行的特殊战争，是一次完全不对称的战争。

美国的兵力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少。这里是美军自己公布的数字：美国及其盟国总共部署兵力466985人，美军423998人。空军5万多，海军6万多，陆战队7万多，陆军23万多。空军总共出动飞机1801架，其中美国就出动了1663架。美国现在全部的作战飞机2000架，国内、海外基地都要分布，伊拉克战争就出动了1663架，全部的力量几乎倾巢而上，就打这么一个被困守了十几年、经济被封锁了十几年、空中被切成三块、正在接受武器核查的国家。

这是一种典型的杀鸡用牛刀，双方力量悬殊。美国精确制导武器比例：海湾战争是8%，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人自己公布的伊拉克战争精确制导武器上升到了68.3%，这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实际上根本不像我们想象的几乎全是高技术战争。

曾竞选过美国总统的北约前司令克拉克讲：“伊拉克战争从军事上说，交战双方的力量根本无法相比，我们占尽了优势，这是任何一支部队梦寐以求的交战方式。如今萨达姆的军事力虽不及1991年的一半，而我们却有新的侦察手段、通信和精确打击技术，美国军事技术用在中东贫瘠空旷的

地形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保守地说，我们的作战效率比海湾战争时提高了 23 倍。”美国就是在这种巨大的优势之下，倾全力压垮了伊拉克。

美军的作战特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点：

第一点，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第二点，创新战法，军事打击和心理作战紧密结合；第三点，长途奔袭，实施高速的并行作战。

过去军队作战都是串形作战，先空军轰炸，再地面炮火准备，再陆军的装甲机械化部队开进，然后摩托化部队开进，按照军兵种的作战顺序，串成一个顺型的串形序列。今天不一样，一天的空袭，各个军兵种蜂拥而上，并行作战，空军和陆军、装甲部队和后勤部队几乎并行开进。这正是美军作战的一些新特点。

伊拉克并非全无“胜算”

伊拉克军队在美军强大攻势之下，像雪崩一样，很快瓦解了。但客观地说，伊拉克军队长期被经济封锁，长时间的武器禁运，在这种情况下，空中被一分为三，国土被一分为三。伊拉克还有没有作战的条件？它还能不能打呢？答案是：有可能。

从客观因素上看：

第一，对方深入己方国土。伊拉克军队不需要长途机动，完全可以固守，以逸待劳。这是伊拉克作战的第一个有利条件。

第二，气候和地形。伊拉克一直很不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以至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萨达姆本人。萨达姆认为中国人帮不了他太多忙。中国大使递交的国书他根本不看，都由副总统代收。

先说气候，2003 年 2 月，伊拉克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会议，伊驻华大使在会上发言：“各国只要帮助顶过 3 月份，我们就有办法。”伊拉克 3 月之后，天气就热了。如果主要作战时间放在 4 ~ 5 月，美国人会很困难。这种气候条件对伊拉克非常有利。战争 3 月 20 日发生，距离 3 月份末只剩 10 天左右，但最后还是失败。

还有地形。过去空旷的沙漠条件确实是美军高技术作战的有利条件。但是现在伊拉克军队在城镇防守，这对美军非常不利。2002年年底，美军的第101空军突击师和第10山地师才开始仓促学习城市战战法。2002年10月到11月，美军才颁布了第一部城市作战纲要。这对美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因为地形和气候都对美军形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最后，周边地缘条件。周边地缘条件在伊拉克表现得很明显。美国过去打击一个国家，首先是战略孤立，其次是战略打击。美国攻打伊拉克，困难在于伊拉克周围全都是一些美国难以化解的明里暗中、称兄道弟的力量。

东面是伊朗，它是美国所规定的“三个邪恶轴心”之一。“三个邪恶轴心”分别是伊拉克、伊朗、朝鲜。美国打伊拉克，伊朗肯定不会给予任何支持，美国对伊朗不抱任何希望。

西面是叙利亚，美国人如果列出四个“邪恶轴心”，那么第四个就是叙利亚。西面还有一个约旦，胆小怕事，但美国人不敢惹，萨达姆也不敢惹。它绝不允许美国借用约旦的土地攻击伊拉克，这也是美军行动的禁区。

南面是沙特，1991年美军海湾战争大获全胜，就是得益于沙特的帮助。美军第7军团的“左钩拳”行动，全部是从沙特出发，大纵深地迂回巴士拉，合围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全部是从沙特出发攻入伊拉克，这是美军的大本营。但这次沙特的态度大改，不允许美军利用沙特任何基地作为攻击伊拉克的进攻出发阵地。

沙特和美国几乎闹翻，因为兰德公司曾发布一个报告：“美国人称沙特是未来美国在中东最大的潜在对手。”报告一出，沙特政府立即抗议，然后美国政府立刻道歉。兰德公司开除了写报告的研究员。“9·11”恐怖袭击，美国的19名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飞行器撞击了4个目标。3架撞成了，1架坠毁了，19名恐怖分子中15名来自沙特。所以沙特是美国最大的麻烦。

沙特不允许美国利用其任何阵地攻击伊拉克，这一点全在美国的预料之中。因此，美国把作战计划放在北面的土耳其。土耳其是北面的主攻方向，第3机步师从南向北，第4机步师从北向南。第4机步师装备的20多艘船

只，已经在土耳其的港口外待命准备卸船，然后在北部组织一个主攻方向。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当时的土耳其总理居尔曾多次向美国人保证，绝对没问题。他们会开放边境让美国人利用，攻击伊拉克的北部。在土耳其总理的保证下，美国人认为胜利在望，所以此后的作战计划完全是按照从北部主攻来做的。

但在最关键的时候，突然之间土耳其议会“翻船”。“翻船”的票数非常奇怪，同意美国利用土耳其边境进攻伊拉克的有 264 票，反对的有 250 票，乍一看提案通过了，美国国务院一片欢腾。但紧接着土耳其议长宣布：“这个票数证明没有通过。”把美国给否决了。

美国国务院当时死一般沉寂。国务卿鲍威尔立即让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查，到底怎么回事？264 票的多数为什么没有通过？土耳其议长解释，根据土耳其宪法，外围军队利用土耳其进攻其他的国家，需要土耳其议会绝对半数的票数通过。绝对半数是 267 票，264 票与 267 票只差了 3 票。这使美国非常生气，因为全部的作战计划就因为土耳其的一个民主程序给否定了。总理同意，议会大多数同意，但是缺了 3 票，整个作战计划全部泡汤。

幸亏美国打得比较顺，幸亏还有南部唯一的进攻出发阵地科威特。科威边境 150 千米，正面狭小，大部队云集在那里展不开，美军的后勤连续受到袭扰，和它正面狭小关系非常大。唯一的进攻出发阵地只剩下科威特，别的全部反水。这对美国影响非常大。

如果美国仗打得不顺，首先恐怕就要唯土耳其这个北约的盟友是问。其结果是第 4 机步师 20 多艘船在港口等了十多天，最后不得不绕道苏伊士运河、红海，绕过阿拉伯半岛，绕道波斯湾，赶到科威特时，仗基本都打完了。美国最好的朋友土耳其这次对美国形成了非常大的阻碍，所以美国全部力量都只能从科威特出发。

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一个非常难得的境遇。为什么说非常难得？在小国和大国抗衡的时候，非常难得地出现了对小国如此有利的优越条件。对伊拉克来说，周边这种地缘条件非常有利，而伊拉克人却没有加以充分利用。这是伊拉克自己的问题。

除了周边地缘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国际政治条件。俄罗斯已经料定，战争在6月份以前结束不了，法国和德国基本也都做了同样的判定。5月份以后，天气非常热，战争陷入胶着，这时大国就会出来调解，大家都主张不要打，停下来。美国有什么条件，伊拉克有什么条件，双方再想办法谈。国际上的调解力量特别强，它们都想主导这个局面，主导这场战争。只要伊拉克战场一胶着，调解力量马上就会出来。

伊拉克战争所形成的地缘条件和国际政治条件非常好。就连战前跟美国最“铁”的英国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反战游行，据英国BBC报道，英国政府称有90万人上街，实际上有130万人。跟美国非常“铁”的另外一个国家——澳大利亚，也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60万人反战游行。

内因导致雪崩式垮台

外部环境，周围环境，所有的力量都准备好了，就剩伊拉克、萨达姆一锤子定音，但最后伊拉克却没有顶住。它为什么会雪崩一样垮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起决定作用。在关键时刻，内因却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第一，在严重的战争态势面前，伊拉克领导层弥漫着躲避战争的幻想。原两伊战争时期的外长、副总理阿齐兹，是伊拉克复兴党内部，包括伊拉克领导层在内的对西方交往的头号人物。他也是萨达姆的亲信，西方有什么情况，由他来向萨达姆讲。

阿齐兹在战前讲：“绝不做美国关塔那摩战俘营的战俘，宁可战死，决不投降。”但战争结束后，阿齐兹却迅速投降了。投降之后，他的夫人对西方记者讲，阿齐兹一直没有想到战争会发生，他讲了很多硬话，他以为凭借世界强大的反战舆论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联合国也通不过，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全都是反战的态度，阿拉伯世界也是这种态度，还有英国、澳大利亚的反战游行，美国内部也吵起来了。但伊拉克小看了美国动武的决心，它的领导层躲避战争的幻想非常普遍。

第二，伊拉克这支军队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却从来没有产生出一个能够让对手记住名字的将领。伊拉克军队的崩溃从军官队伍的崩溃开始。我认为这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启示。

伊拉克的军队并不是没有打过仗，它经过两伊战争、海湾战争，长年累月不断打仗，包括跟库尔德人打。但打了那么多年仗的这支军队却没有产生出一个能够让对手记住名字的将领。一支军队没有一个让对手畏惧的将领，这支军队就不值一谈，纵有再先进的兵器也没有用。伊拉克军队就是这样，谁都记不住伊拉克军队有某个将领非常有名，一个都没有。

大国、小国同样如此。大国如苏联、中国有名的将领就不用列举了，就说以色列的达扬、沙龙、拉宾这些人物也是阿拉伯世界众所周知的战将。沙龙这个人物非常硬，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时候，他担任第3装甲师的师长，带领装甲师第一个突进占领非洲的领土，首先渡过运河，合围埃及的第3军团，将其围得严严实实。

基辛格从中调解斡旋，沙龙最后同意了一个条件。放开一个口子，可以让他们的后勤进来。什么样的后勤进来？淡水、血浆两种液体，其他一概不行。这些只能维持围困内的埃及军队奄奄一息的生存。美国军队也有一批这样的将领。而伊拉克军队打了那么多年仗，没有一个将领能够给别人留下一点印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西方曾经作过一个对比。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签署了停火协议，美国军队的代表是当时中央总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伊拉克军队的代表是共和国卫队的一个司令。

双方在一个帐篷里面签署了停火协议，西方记者全部云集，两面摄像机全部架好，帐篷中间一张桌子，帐篷留了两个口，施瓦茨科普夫从一边进来，伊军共和国卫队首领从另一边进来，双方到中间简单地握了一下手，坐下来签署停火协议。

有一个镜头给西方记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施瓦茨科普夫又高又胖，进来时满身灰尘，疲惫不堪，眼睛浮肿，而且军装肮脏不堪，狼狈透了。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司令进来时，军装笔挺，小胡子修剪得非常整齐，

一尘不染，而且是精神矍铄，容光焕发。西方记者一看，到底谁是败军之将？从外表一看，施瓦茨科普夫肯定是败军，伊拉克军队应该是胜军。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什么叫战争？施瓦茨科普夫指挥战争期间，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伊拉克军队，3000辆坦克有2000多辆被击毁。但伊军司令官小胡子修剪得却非常整齐，容光焕发，进来签字时跟没事一样，精神非常好。这是支军队吗？

伊拉克军队失败，它的整个军官队伍崩溃了。而看英美联军的技术动作，每到一地，不管是空降还是机载，一旦落地，第一件事就是挖战壕，战壕又大又深，然后躺在里面睡觉。

英美这些掌握高技术兵器的士兵和军官，土工作业（步兵五大技术之一）非常厉害。有人就问：“美军搞什么土工作业呢？制空权、地面炮火权全在你手里，想打哪打哪。”但他们还是搞土工作业，挖战壕，而且战壕挖得非常大。

从电视上看，伊军的防御工事在城市里，在村镇里。这些掩体建在房顶上，由沙包堆成，沙包又小又薄，就像荞麦皮做的枕头一样，电视记者一拍：“这就是工事。”说着一脚就把工事给踹塌了。

进攻纳吉夫的时候，美军感到非常奇怪，伊军的反坦克地雷就放在公路上，他们连坑都懒得挖。反坦克地雷放在柏油路上怎么可能反坦克？夺取幼发拉底河大桥时，美军和伊军争夺了36个小时。那个大桥很关键，不打下它，美军渡河困难，如果架设浮桥又影响美军进攻时间。

美军把大桥占领后，检查时被吓了一跳，大桥下面埋的全是炸药，但没有人引爆。美军迅速将炸药全部拆除了。外部条件全准备好时，就靠内因起作用了，但伊拉克的内因就是这样。

今天，在总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很多人把目光放在了美军的信息化作战力量和高技术武器上，主要从技术层面看这场战争的成败，我个人认为远不止如此。我们不能说美军对伊拉克的胜利，全是信息化作战对于机械化作战的胜利。完全不是这样，是整支军队内部的问题。

以色列军队前总长巴拉克，后来当过以色列的总理。以军是支什么军队？天天打高技术战争，天天信息化作战。它的信息化作战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直升机可以直接炸毁巴勒斯坦哈马斯各个组织头目坐的小汽车，非常精确。以军的这种高技术作战能力甚至比美军还强，它天天打，非常熟。

那么巴拉克是怎么规划以军质量构成的？一是战斗意志；二是牺牲精神；三是文化素养；四是技术能力；五是战斗效率；六是指挥能力。天天打高技术战争的人，他们的排序，我们以为可能过时的、可能不再起作用的这些东西，仍然在战场上扮演着主角。

战斗意志、牺牲精神，一个军人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精神状态？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长罗伯特中将说：“在高技术时代，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记住某些永恒的原则仍然指导着战争的过程。其中首要的是战争对意志的最终考验。”战争即使发展到了今天，即使在高技术条件下作战，也没有简单到双方在计算机屏幕上互相摧毁对方，战胜对方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在今天，美国人也讲，首要的是战争对意志的最终考验。

第三，伊拉克没有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的军官队伍。这是伊拉克军队致命的缺憾。战争检验每个走向战场的军人，更检验军人背后的军事制度。伊拉克军队的崩溃首先是从军官的崩溃开始的，军官的崩溃首先是从高级军官的崩溃开始的，从而导致整支军队的崩溃。

美军攻击乌姆盖茨尔港，占领这个深水港后，大量的作战物资可以由此登陆。攻击这个小港，美军作战的时间表计划为6~8小时，伊拉克守军的正规部队和准军事部队只有120人，但最后9天才打下来。这对美军产生了非常大的阻碍。伊拉克的正规军和我们的正规军不一样。伊拉克正规军有核心，因子很多，最核心因子是特别共和国卫队，外面的因子是共和国卫队，再外面的是正规部队，再外面的是准军事部队。

在伊拉克，所谓的正规部队就是装备比较差、待遇比较差、军官晋

升前景不看好的部队，都是萨达姆的一些外围力量。装备好、待遇好、军官晋升前景看好的，是特别共和国卫队和共和国卫队。前期美军所接触的伊拉克准军事部队、正规军，正面抵抗，后勤袭扰，给美军造成很大的阻碍，以致美军3月25日到26日召开作战会议，要求国内增兵10~12万。

当时，美军中央总部、国防部也同意了。因为刚刚接触伊拉克的准军事部队和正规部队这些伊拉克的外围力量，是鸡蛋的蛋壳，尚且能一战。27日以后要对付共和国卫队和特别共和国卫队，核心部位就会越来越硬了，现有兵力完成不了，要求增兵。

当然美军完全没有想到这回伊拉克出现的是“蛋壳现象”，蛋壳一击破蛋黄就全流出来了，没有了核心。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师长以上的军官全部是萨达姆亲手挑选的，是他最信任的人。可是最后到了什么地步？战后，美军中央总部司令弗兰克斯在国会作证时说：“当时攻击共和国卫队的时候，与我正面交手的共和国卫队有几个师的师长都不在位，指挥部是空的。”弗兰克斯还讲，他收到不少伊拉克军官的电子邮件，上面写道：“我愿意为您效劳。”

美军的心战手段非常厉害。伊拉克军队共和国卫队师长以上的人物，他们的家庭住址、私人电话、手机，还有电子邮件，美国人都掌握了。全部在私下里跟他们探讨，如果放弃抵抗有多么大的好处，这种心理攻势作用非常大。

当然心理攻势之所以奏效，那是因为你的对手已经一个个雪崩般崩溃了，以致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两个主要的装甲师到达了指定位置，却找不到指挥官。下边的上尉、少校、中校们到处喊：“我的部队部署在什么地方？巴格达城怎么设防？”没有人指挥。

萨达姆在4月9日下午发出了他指挥伊拉克战争的最后一封电报：“我被我的部下出卖了。”谁出卖了他？不是他的部下，而是他亲手缔造的军事制度出卖了他。当然排开政治腐败不讲，仅仅从军事制度来看，所有的人都是他选的，他只信得过自己的提克里特家乡和亲戚。

4月1日上午10点多，特别共和国卫队司令兼巴格达城防司令——萨

达姆的侄子和美国签署了全面停火协议。防守巴格达时，他谁都信不过，就信任他的侄子。萨达姆的圈子划得非常小，他判断的能够忠于他的人物纷纷出卖了他。他划为不信任的力量包括准军事部队、正规部队，反而尚能一战。

伊拉克军队出现的现象，连美国人都感到吃惊。往巴格达进军的过程中，美军连续缴获了大型军火库。如果我们仅仅认为是信息化武器与机械化武器的差别，才导致了战争的胜负，这远远无法说明这场战争。伊拉克的失败不是武器的问题，一个一个崭新的军火库全部被美军缴获时，各式武器都没有被开封过。

美国在占领巴格达之后，在巴格达3个军火库内发现了数十具崭新的陶式反坦克导弹，把美国人都吓了一跳。一方面，美军的坦克在巴格达市内横冲直撞；另一方面，军火库里是崭新的美制陶式反坦克导弹，打美国的M1A1和M1A2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很有效。这是机械化战争武器和信息化战争武器的差别？伊拉克败于武器？明显不是。

它有武器也没有用。防守一个城市你要什么武器？AK-47步枪、40枚火箭筒就可以了。炮兵都知道，在一个街口打巷战是最便利的，射击诸元测定对防守方最为有利，这个地方多少个夹角、垂直距离多少、斜射距离多少，拉皮尺都能拉出来。目标一出现，一打一个准，非常好布置交叉火力，让进攻一方居于一个非常狼狈的境地。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城市战曾经出现过三个典型：

第一个典型，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德两方军力差不多，双方殊死搏杀，非常惨烈。逐条街道、逐个楼房、逐间房屋拼杀。斯大林格勒战役，被列为城市战的典型。

第二个典型，车臣的格罗兹尼。一方是装备各式武器的强大俄军，另一方是装备简陋、五花八门、东拼西凑的来自各个地方的车臣匪徒。当时俄罗斯的国防部部长格拉乔夫就讲：“格罗兹尼算什么，我一个空降团一周内平定。”结果大量的俄军进入之后，打了一年多，近3000名俄军死亡，

没有打下来，巷战非常难办。

第三个典型，就是巴格达巷战，一个没有任何设防的巷战。

从这些战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伊拉克军队的问题。萨达姆选的人最后把他出卖了，而被他排斥在圈子外面的人表现得还不错。整个战争期间，准军事部队打得不错，他不再信任的人表现得也不错。

仅剩一张嘴在抵抗

这次伊拉克战争没有产生任何一个能让全世界记住的伊军将领，但是产生了一个让全世界都记住的伊拉克的新闻部长——萨哈夫。

萨哈夫是什么人？他就是失去萨达姆信任的人。萨哈夫原来是外交部部长，后来和萨达姆的儿子乌代吵翻，因此失去了信任，外交部部长的职务也很快丢掉了，当了一个不重要的新闻部长，结果萨哈夫却把新闻部长做到了花样翻新的地步。

2003年5月，我们在美国访问时，我们的大使招待我们吃饭，他讲萨哈夫是个知识分子，对萨哈夫以及萨哈夫现象要好好研究。他说小布什非常重视萨哈夫。

布什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规定：“凡是萨哈夫的记者招待会，不管我在从事什么事情，全部打断，一定告诉我，我要看，不能不通知我。”因此，每当萨哈夫在电视镜头上出来，身边的人马上会把布什叫过来。布什在看萨哈夫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不允许身边任何人说话，不能有任何评论，鸦雀无声，布什静静地坐着看，萨哈夫的记者招待会完了，他也不说话，就走了。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布什对身边的人说：“当时看萨哈夫的这种态度，心里真是没有底，不知道要打多长时间。”可以想象这种作用对对方的影响。

美国的布热津斯基曾对中国大使说：“当时看了萨哈夫的这种态度，以为后边肯定有非常严重、非常难的战斗。”美军第3机步师的师长布伦特少将，他自己讲第3机步师攻击巴格达的行动为什么推迟了将近20个小

时，因为当时太空侦察、高空无人驾驶机侦察、外围的无线台侦听和内部的线人、眼线的情报，都证实巴格达是个空城，能够长驱直入。

但是萨哈夫讲：“我们这是个陷阱，让他们进来吧，全部掉在陷阱里把他们全都烧死。”

当然，萨哈夫讲了很多不实的消息，但是西方最后的评论是整个伊拉克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毫无抵抗，就剩萨哈夫的一张嘴在抵抗着英美联军。这种现象是伊拉克军队的悲剧，萨达姆身边的人那么多，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一个人出来讲过一句能够鼓舞伊拉克人民抵抗意志的话。唯有圈子外的萨哈夫，他真是十八般武艺全都用上了。这说明伊拉克的这种制度已经不能辨认什么样的人有用，什么样的人没有用。

从伊拉克战争中，我们要看到美国佩服什么样的人，美国人最后给了萨哈夫一个较高的待遇。萨哈夫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得罪了很多，他还进行个人侮辱性的攻击，比如他说：“英国人连个烂靴子都不如。”还说：“布什这个杂种，他的英语还不如我好。”他这种大量的随便讲的话，得罪了很多。

战争结束后，据萨哈夫身边的人回忆，4月8日晚，萨哈夫开完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凌晨时分，把他的软帽摘下来别在肩章上，然后找了件阿拉伯的披巾披在肩上，消失在夜幕中，找地方藏起来了。萨哈夫东躲西藏了将近一个月，美军的搜查越来越严，越藏心里越不是滋味，最后他没有办法，也出来向第3机步师自首了。

萨哈夫自首时，带着全部的东西，连洗漱用具都带上了，他想自己肯定会被逮捕。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到了第3机步师，他只接受了简单的问话：“你叫什么名字？”“在战争期间任什么部长？”“整个战争期间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前后不到40分钟。萨哈夫填了个表格，签完字后，美军就告诉他：“你可以走了，你自由了，你回家吧。”他大吃一惊，他本以为美国人肯定要把他抓起来，但竟然放他回家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对什么人感到钦佩。

伊拉克叛徒很多，美国人用飞机把他们运到一个地方，给他们1000万、

2000万、3000万美元，包括很多共和国卫队的师长，现在都住在不为人知晓的地方，过着物质优越的生活。但美国人也知道，虽然他们是美国人的朋友，帮了美国人很大的忙，但他们永远是自己民族的败类。

美国人认为，萨哈夫在新闻部长的职务上做到了极致，世界上没有一个新闻部长能做到他这个水平。萨哈夫要求到阿联酋去避难，美国人迅速批准，于是他举家搬到了阿联酋，在阿布孔比电视台，他担任评论员，继续骂美国人。

美国人55张通缉扑克牌里面竟然没有萨哈夫。美国人对像萨哈夫这种战争中的强者表现出了力所能及的敬意。

当然美国这样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就是利用萨哈夫在全世界的影响。在阿拉伯世界，萨哈夫网站的出现，使萨哈夫的语录也非常多地传播出来。美国人想凭借萨哈夫的形象争取一部分阿拉伯人的人心。在战争期间，把美国人骂得狗血喷头的人物，美国人竟然给了他这样的待遇。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很多放下了武器投降美军队伍的伊拉克的军官，在5月底6月初上街游行，要求英美当局发工资，如果不发工资，他们要实施人体炸弹攻击。因为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军决定伊拉克军队中中校以上的军官不能任用全部遣散，中校以下的勉强考虑。于是这些丢掉饭碗的中校级以上的军官起来游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对他们服役的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根本无所谓，出卖就出卖了。这就是一支军队最致命的问题所在。

共和国卫队师长以上军官全部被美国人买通时，美国国会曾对此提出过质疑：“军队能像这样去作战吗？”一面带着精确制导武器，另外揣着美元买通对方的将领，没有战斗就被占领了。

美国国会质疑的时候，第3机步师和国防部都作了证。一枚巡航导弹100~200万美元，买通一个共和国卫队的师长不用一枚巡航导弹的价格就能达到几十枚巡航导弹达不到的目的。一个装甲师几十枚巡航导弹消灭不了，但是半枚巡航导弹就搞定了——师长被买通了。

国会曾经疑惑，这个军队能这么作战吗？后来国会也认同了，因为这

样节省了美军大量的作战费用，同时也节省了国会的大量作战费用。“为将之道”，提高军队素质，人才建设是当务之急。

军官培养，是最为艰巨的战争准备

伊拉克军队的军官文化素质基本上跟美军一样，共和国卫队师长以上基本上都是硕士以上的学历，军官全是本科以上的学历。我们过去仅仅把军队的素质建设作为学历水平建设，地方也搞学历水平建设，那么军人和地方干部之间的根本不同在哪里呢？

军人是要流血，要牺牲的。以色列讲，军人首要的是牺牲精神、战斗意志，这些是用文凭衡量不出来的。伊拉克军人的文凭和美军差不多，但他们的军队一触即溃。

张爱萍将军的座右铭是“将有三忘”：出家忘妻、出门忘乡、出阵忘身。一个军队的胜败之分，就在于此。这是很复杂的理论吗？这是很高深的学问吗？不是！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有句话讲得好：“真理往往朴素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于是乎不相信它是真理了。”

刘伯承元帅曾经讲过：“军官培养，是最为艰巨的战争准备。”我们从伊拉克战争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就是军官培养。我们反复练兵，但很少练将。一支军队的决定因素是军官队伍，特别是高级军官队伍。从伊拉克军队的溃败，更加印证了刘伯承所讲的话的正确性，我们一定要牢记！

2003年7月，一位军委老领导在国防大学结业的时候做总结，其中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我们军队的核心建设是人才培养。什么叫人才培养？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想打仗、能打仗、会打仗的干部选上来，要不然到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哭都没人听。

我们观察一场战争，不是看一场戏，而是要思索我们军队的未来建设，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布莱尔曾是美国太平洋总部的司令，是我们当时要面对的主要对手，

中美冲突一开，他指挥了太平洋战区。布莱尔 2002 年 7 月卸任以后，他在美国国会作证，因为他是美军中最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他始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假想敌。

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他这样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变化不是军事，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军队不再做生意，接受了更好的训练与教育。他们变化最大的是人，而并非增加了几艘军舰和舰艇，并非增加了多少架飞机。”

今天，我们一讲到新军事变革，就是机械化与信息化的差距，就是“撒手锏”，就是军舰、潜艇、飞机。当然这些东西是我们作战的基本利器，但是在美国人眼里，这些东西对他们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胁，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变化是“军队不再做生意，接受了更好的训练与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变化最大的是人。

锻造一支真正枕戈待旦的军队

伊拉克战争对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有三点启示：必须锻造自己的撒手锏；必须实现作战能力的综合集成；必须锻造一支真正枕戈待旦的军队。我只强调第三点启示。

一支军队物质条件是一方面，还有精神层面的问题。中国的军营里，军事斗争准备的标语不少，但美军是一支从来不讲军事斗争准备却每天磨刀霍霍的军队。美军的每一个军营里都有这样的标语“Always Ready”“Always Here”，时刻准备着，始终都站在这儿，随时待命出征。我认为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枕戈待旦”。

今天军队有了比较好的军费开支，并且还在继续增长，但锻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仅仅是要有强大的物质条件，更要有强大的精神条件，甚至在强大的物质条件没有形成之前，就要形成强大的精神条件。

2003 年 5 月，我们在美国访问，和美国一位著名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

戴维斯的会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中文名字叫沈大伟，他说：“我从来不认为中美之间的军事差距在于技术兵器，兵器差别不大，你们可以通过购买俄罗斯的武器迅速赶上来，甚至可以通过‘偷’我们的技术，比如通过以色列偷我们的技术，迅速赶上来。我认为中美军队最大的差距在于进取精神。”

我问他：“什么叫进取精神？”他说：“美国军队在不断地打仗，你们说我们的战争是不正义的，我们今天不谈政治问题，我们就谈它在不断地打仗，它的兵器在不断地更新，它的条令在不断地更新，它的作战思想、作战编组在不断地更新，这些你们军队没有。”

沈大伟一再强调，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在于进取精神，他还说：“坦率地说，我认为你们军队失去了你们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有过的那种咄咄逼人的进取精神。”这是2003年5月沈大伟对我们说的。我们仅仅是技术差距吗？我们仅仅是军费开支够了，高技术武器到位了，我们就是一支百战百胜的钢铁劲旅了吗？这些问题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思索。

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从1840年到现在，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向西方寻找真理，其核心就是四个字“富国强兵”。“富国”和“强兵”相辅相成。虽然有时候富裕了，我们容易忘记强兵，但是残酷的现实反复提示我们，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能跻身于世界强师劲旅之林，中华民族也不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国际生活武力化的今天，我们很多权益丢失了。我们要完成统一，我们要收回我们丢失的权益，在这么多严重的挑战面前，赋予我们军队的任务极其沉重。军队的崛起和国家的崛起不是两层皮，不是两条道，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今天给我们提出的严重的任务，我们每一个军人都面临这个任务。

中央台办的一位同志曾讲：如果出现台湾独立的事实，别人能够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得到解脱，军人不能，除非你迅速脱下这身军装，混迹于民间。只要你穿着这身军装，国家出现了分裂，军人就必须义无反顾。反之，

我们存在的地位，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都要受到极大动摇。

我认为这就是通过伊拉克战争，看到我们面临的严重任务。伊拉克战争的启示绝不仅仅在技术兵器的层面上，绝不仅仅是美军高技术武器如何，而是一支军队最根本的魂，军队如果抽掉了魂，那么你有再好的外界条件，也无法完成你应该完成的任务。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QyNzc5MTk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277919.zip",
  "filesize": 74918579,
  "md5": "d8ef419b8341fc53f256c3c8c13499be",
  "header_md5": "71cf7bb5222f606c2a0ccde493bc5105",
  "sha1": "5a12b4d061b0cd0e7ef4b7d0b8b9eebdea5ce1f8",
  "sha256": "ce1985147dc51370a4166364bf023582acdfb157171cce0fb454820f08526087",
  "crc32": 2240647336,
  "zip_password": "28zrs",
  "uncompressed_size": 83907182,
  "pdg_dir_name": "\u5fc3\u80dc 3_14277919",
  "pdg_main_pages_found": 217,
  "pdg_main_pages_max": 217,
  "total_pages": 224,
  "total_pixels": 1067714816,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